

· 开国领袖自传(自述)典藏 ·

朱 德 自述

The
Autobiography of
Zhu D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朱 德自述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朱 德

建议陈列类别：自传

ISBN 978-7-80173-918-6



9 787801 739186

定价：38.00元

朱

德自述

The
Autobiography of
Zhu De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自述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8

ISBN 978-7-80173-918-6

I. 朱… II. 中… III. 朱德 (1886~1976) - 自传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2941号

朱德自述

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责任编辑 李 璞

策划编辑 李治威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20 × 1000 16 开
22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918-6

定 价 3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 录

CONTENTS

开篇自述	1
附：关于朱德	8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3

诞生在琳琅寨下	15
开始读书	18
师从席聘三	20
参加科举考试	25
上新学堂	27
教书不是出路	31

第二章

投身军界 33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	35
参加云南重九起义	39
北上援川	44
滇南边界游击战	46
护国讨袁之役	48

目 录

CONTENTS

驻军泸州	51
护法战争	53
附：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	55
逃离云南	57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59
附：在启程赴欧之前	61

第三章

天涯寻正道	69
-------	----

去欧洲一路见闻	71
留学德国	73
附：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77
留学苏联	79

第四章

大革命中	83
------	----

策应北伐到万县	85
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87
附：致孙炳文夫人书	90

第五章

保存火种

南昌起义	91
南下受挫	93
在困境中与范石生合作	95
智取宜章	98
打垮许克祥	100
暴动烈火遍湘南	101

第六章

星火燎原

井冈山的斗争	107
进军赣南、闽西	109
第一次反“围剿”	116
附：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	121
第二次反“围剿”	123
附：横扫七百里	127
第三次反“围剿”	129
第四次反“围剿”	136
第五次反“围剿”	138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长征两年

141

开始长征

143

附：爱兵如子

146

同张国焘斗争

148

附：“临大节而不辱”

152

率军北上

163

从苏区到长征中的生活

165

到了保安、延安

168

附：朱老总和战士

170

第八章

跃马太行

173

复我山河，保我民族

175

太行前线寄家书（三封）

176

为母亲度饥荒求捐助信

179

《重逢》

180

华北抗战的总结（节选）

181

附：朱总司令在太行山时的一些情况

188

第九章

延安岁月

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	195
给女儿朱敏的信	197
回忆母亲	200
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	201
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两次发言	205
附：周恩来为朱德六十寿辰的贺词	206
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208
我相信可以亲自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210

第十章

走向胜利

关于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报告	215
关于军工生产等问题的报告	217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的信	220
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后的信	222
我把功劳往下面推	226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	229
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	230
附：亲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	232
附：军事工业的奠基人	241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心系祖国振兴

	257
对美帝侵朝战争的对策	259
关于新疆工作几个问题的答复	261
加快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	263
兵工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	265
提议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267
对农村办公食堂问题的意见	268
在七千人大会中的讲话	272
给儿子朱琦的信	276
揭发林彪的问题	277
附：最后十年	278
附：永记父亲的教诲	282
大事年表	295
编后记	341

开篇自述^①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马鞍庄。我家是穷苦佃农。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们租种了二十亩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姓丁的地主办的私塾。为了上他这个学，他要我交学费，还待我特别坏，就好像他是在办慈善事业似的。我食宿都在家里，每天要走三里地去上学。放学后，我还要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例如挑水放牛这类的事。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了三年。

后来，这个大家庭在地主的压迫下没法活下去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分了家。我过继给一个伯父，就跟着他到大湾去住了。我亲生的父亲对我很不好，可是这位伯父却像疼亲儿子那样疼爱我，送我去上学，学了六七年的古文。我是我们家惟一受过教育的，为了要上学，我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干各种活儿。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②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了六个月书，接着又在一所中学里读了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仪陇县，在县立高小教体育。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我才离开那里。我那时的志愿一直想当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严格，所以我能被录取，感到很高兴。

① 本文是朱德一九三七年五月与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续西行漫记》。

② 顺庆，今南充市。



马鞍山李家湾朱德故居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听到织布的以及其他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影响，那些人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了革命的想法，一九〇九年我进入讲武

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跟随有名的云南督军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以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同年，我被派往四川和清朝的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回到了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队长，在那里我教授战术、野战术、射击和步枪演习。

一九一三年，在蔡锷部队中我被任命为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去和袁世凯的部队作战。打了六个月的仗，我们胜利了。随后我升了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叙府和泸州。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部队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在当时是有些声望的。可是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作战中半个多旅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旧式军队作战。

一九二〇年年底，我回到云南府和反动派唐继尧作战，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我有很大影响。是他第一个举起反叛的旗帜，反对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保卫共和国的。

一九二一年九至十月，我当上了云南省警察厅厅长。那时，唐继尧卷土重来，他追了我二十天，我还是带了一连士兵逃了出来。另一个同伴也带了一连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受刑致死。我带领一连逃难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后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了

一下，然后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然后去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接待。一九二二年六月还和他们一道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军阀后来当然受到过红军的进攻。但是在当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我的人头，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军队逃兵纠合组织的流窜匪帮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认为对于指挥员和战士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这样，他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乘了长江的船顺流而下，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我感到非常泄气。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出来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药，一九二一年向西康进行第一次“长征”时开始戒烟，在去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已经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广慈医院又狠狠地治疗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完全根治了。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

其他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荒唐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遇到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旅行，他们的行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

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达柏林，当时我大约三十六岁。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

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学习



朱德元帅像

德文，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在德国期间，我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政党，当时，学生分成了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我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一九二五年，因与钱柯夫案件有牵连，被德国警察拘捕。钱柯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想在大教堂里炸死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人，其中有三四个人是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遭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在柏林，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的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三十小时。因此，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是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我就到欧洲各地游历，去了苏联，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派我去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我是杨将军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由于杨森态度仍然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虽然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始终和北方敌人有联系。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就在这时离开了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我帮着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任命为新九军的副军长，该军是起义过程中组成的，大约有三千人。国民党的第十一、第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

当时，我和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以及其他革命同志等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

到后来才见到他。

我接着率领部队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地区，我是革命军右翼的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和贺龙进攻潮州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地区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转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的第九军大部分弟兄都牺牲了。我只有总共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包括许多从贺龙和叶挺部队败下来的散兵。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和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子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井冈山，部队增加到一万人。就在这个我们准备建立第一个根据地的井冈山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会面。

在湘南起义之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以前，我和毛泽东的惟一的一次联系是我从广东东江地区撤退之后，他派他的弟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和我把我们的部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时期是我们的革命堡垒。我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军长，毛当政委。我们在井冈山上呆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想消灭我们的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之后也到达了井冈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驻守井冈山，毛和我率领部队去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经历只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

至于我的私生活问题：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过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一九三五年长征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了保全性命，已逃离住地——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这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有支持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十八岁，我二十五岁。我的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和我结合的，名叫伍若兰，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我现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

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是不确实的。在云南我是有些财产，但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但是，一九二一年我被迫逃走时，我的财产全部被唐继尧没收了。

.....

我很佩服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金森，后者是运动战专家。福煦将军在保卫法兰西方面也建立了赫赫功勋。当然，苏联的红军将领们现在都是有经验第一流的，例如加仑（布卢彻）。

在老派将军中拿破仑算是不错的。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他，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在中国，我一向钦佩云南的蔡锷，他是现代军事科学早期最优秀的专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孙逸仙。

.....

中国士兵并不坏，是军官坏，不称职。中国士兵只缺乏政治训练。如果中国士兵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能吃苦，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忍受极大困难，要是在别的国家，早就丧失战斗力了，可是他们却能保持士气，正如中国苦力在吃苦耐劳方面是举世无双的一样。

【附】

关于朱德^①

不像莎士比亚，孔夫子认为名字具有头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这个名字上是这样。这个名字叫起来很响亮，英文里应拼做 JuDeh，因为发音是如此。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许多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的。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

①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

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像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我，就他所记得而言，他每次总说五十六了。这好像是他爱说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李长林认为，他同现在这位夫人结婚后就不再记年龄了。这位夫人是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支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

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定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

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气，因为当他到达陕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幸运的是朱德马上就被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威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述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威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确的记载。它里边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威尔斯女士所说：“朱德决不会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个人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真实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

……^❶

朱德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他的自述。但这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像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记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

❶ 本文省略的《朱德自传》部分，即本书《开篇自述》的内容。——编者

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当这一时期的历史完全被写下的时候，上述这个简单的自传将长上血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历史的新页上涌现出一个人物——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经历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红军奋斗的原因。请容许我再引用威尔斯女士的话：

“红军是一支十分年轻的军队，为旧中国前所未有的。对这支军队来说，朱德是稳定的象征，是同传统和过去历史间的联系，因为他在内地亲身经历了清朝以来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缓慢和最根本的阶段。他曾经生活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沿海一带瞬息万变的变化传到这些一潭死水一样的地方的时候，这些变化必须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脚。朱德与中国新军的许多领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国的‘留学生’。他的经历是土生土长，扎根于中国的内地，他所以能获得弟兄们的信任和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内地从北到南的绝大部分地势，熟悉当地的民情风俗。

“朱德是在中国第一批新式军校里受到共和派名将蔡锷的训练的。他接着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和四川、云南和山间要塞担任卫戍任务时又学得特殊的游击战术，这后来对红军有很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接着加入了国民党，最后完全自发地寻找共产党，在一九二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从朱德远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寻共产党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后成为三次革命的领袖所具备的自发精神和坚定目标。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像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們看做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

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但是落入红军之手的人无疑把他认为是凶神化身。阶级战争不知慈悲为何物。关于红军暴行的许多传说现在已证明是不确的，但是，如果认为朱德不会由于“革命需要”而下枪决的命令，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必须完全忠于贫苦无依的人，在这个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予权力和服从的群众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认为群众也不能杀人，否则，朱德决不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这血看做是外科医生的血还是刽子手的血，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观、宗教、成见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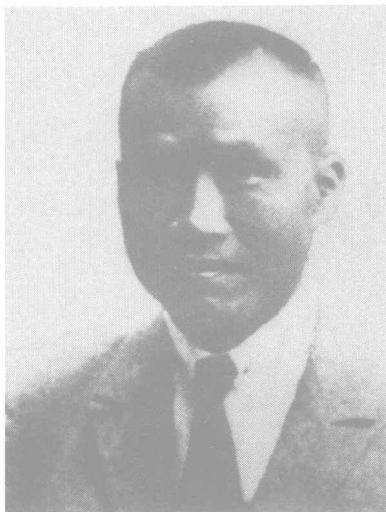
诞生在琳琅寨下^①

在嘉陵江东，仪陇——一个山地里的县城。于一八八六年（是产生了“五一”世界劳动节的这一年），我就出生在距县城东七十八里，距观音河四十里中间的马鞍场琳琅寨下。因为家里是佃户，种人家的田地，也就是在人家那里生长的。环境很好，有着幽美的风景。山、水沟、水田、树丛——好多地主住在附近。那是一家大户，差不多几十里路都是姓丁的。我们家种的田地，也是姓丁的。位于半山上，山窝里一处独立家屋。多数正房是瓦房，耳房都是茅草房。后山及两侧是树木，屋背后是一片竹林。前面是一片水田，对面是山林及深沟。

祖籍是客家，从遥远的广东韶关，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到这里来，已经是第七代了。一直就在耕田，家庭却始终保有客家风味，到现在还说广东话呢。财主丁家拥有很多土地，有钱，是个相当大的地主，收约五千担租——我们家租的田种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家里有十几口人，从我出世就有十一二个人，有三百吊钱本钱作为压头，种人家的田地是要压头的……幼年时，家里一般说来都很勤苦，很有规则。祖母是一个能干的人，管家很好。祖父是个老农民，有经验，很勤苦，处处以身作则。父亲这一辈是四兄弟，也都种地，有的读过书也不多，认识一点点字。家里一年四季的生活，都是忙着庄稼工作，总是天一亮就爬起来。农忙时，晚上八九点钟睡。不忙时，天一黑就睡觉了，从我稍微懂得事起就是这样。

祖母是家庭里的组织者，什么事都是在她的管理和督促之下进行

①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年轻时代的朱德

的。母亲很贤淑和气，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整天只是很有耐性地做着事——我们一共六弟兄，二姐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自己算老三。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生十多个小孩子。后来生下的女孩子，都没有要。她也从来不发气，不打人、骂人。这样多的孩子，没让人招呼过。同时，她还要种粮食，收拾东西，做饭……

人口的增多，要家里很节省才够吃，遇上好年成，有一件新衣服，不然就没有。都是吃粮食，从来没吃过白米，多半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十多二十个人，过年杀一口猪，管一年，只在过年过节吃一点，分起来不过一个人一块两块——我在小的时候是过房的，父亲是老二，我过给伯伯做儿子，我又成为一个独的了，以后也没分过家，在一块住，这样就是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了。过房这边很好，三叔么叔也都很好。

因为家庭的勤苦，没有一个人敢懒，这对我影响都好——母亲整天忙着，从没有工夫去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下爬着长大了的，大了身体很强壮，能背能挑，还要种地。有时读书回家，母亲在做饭，我就去挑水了。家里管束很紧，谁也不闹什么，舒舒服服的。过年的时候，便由祖母分下一年的工。春秋四季，天还没亮，做饭的就先爬起来，在灶边烧饭了。然后祖父起来，大家起来，哪一个没起就不得下台，不起来不行。起来后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做饭的做饭，各有各的任务，我们小孩子做帮手。有时上午去读书，下午去种地，农忙也有时半个月、一个月不去读书，先生也懂得答应我们。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什么都是自家做的。吃饭穿衣，纺棉花，织成布拿去染了，拿回来请裁缝缝了，油是自家种菜籽打的，还有鸦片叶子做的油，点灯是自己打的桐子油，什么都是自己做的。花钱就是花到买盐、纳

粮、成租和纳典。鞋子都是自己做的。假如谁街上买东西回来，那会挨骂的。

祖父真是中国标准的老农民，到八九十岁，他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后来一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是要种地。父亲、叔叔身体也都是健壮结实的。家里人很少害病。因为小时人多，劳苦分工，吃穿都有分派，不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心很少。对家里是惧怕的，不敢在大人面前……我小时喜欢捉鱼，门前池塘鱼很多，田里水沟头都有大鱼、小鱼，栽秧时，放鱼进去，我们家养的鱼很大，但田主不让我们捉，他却用网去打。家里照例是容忍的。我们小孩子就恨他们。

“为什么把我们的鱼捉去呢？”

还有那些果树，有很好的梨、胡桃、枣、李子。成熟了，老板要我们摘下送去；树林子柴很好，可是一根小树都不准砍，竹子也是一根也不许动的。

我们屋后生着斑竹、刺竹、贡竹、料叶竹。竹林里雀很多，有雀子、竹鸡……我和大哥、二哥常在那里玩。二哥是个怪人，会打枪打鸟，家里骂他，他也不管，那枪是防强盗用的土枪。他们还会拉胡琴、吹箫，搞得蛮好。我因为读书搞不好——他们因为我舅父家的影响，舅父是会吹唢呐拉弦子、给人抬媳妇的。他们家总是很快乐，也耕田。我们的快乐也有着这样的遗传的。外祖母穷得要死，可很舒服，不过我很少去，距离三四十里，叫柏林桥，我因过房给伯母，就有另一个外婆了，在新市场有四五十里路，去的次数倒多。

开始读书

家里从来没有人读过书，在这时，家里也还是富裕的中农时期，有吃有穿。除我们以外，还有人在做事，大哥、二哥，我们三个就读书了。那时才七岁——从前在四川读书，也不要多钱。四百个铜钱一年，白天跑着去，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来吃饭，是走读。头一年就读了一本《大学》，《中庸》、《论语》也读了，到了《孟子·公孙丑》那一章。

教书的先生第一个姓朱，教得不太行，蒙学还可以，对我很好。因为我最小，字又认得，又读得，这样读了一年。第二个先生，就是我们丁老板家的教书先生，更好一点，是个秀才。学校也很漂亮。有花园，有楼，在这里读书，就比较好了，读了两年，读完了《四书》、《诗经》到《书经》。先生对待我们还好。和那些地主儿子就不同。小孩子开了架就不得开交。我们体力强爱跳，但并不是乱闹。成天跳到黑，所以就是爱和人打架。这两年一般说，还得了一些益处，教一些字，讲点诗对子，就是这些事，认得字也可以马马虎虎对一些对子，对得起来。学校里有十多个人。大学生作文章，小学生就作对子，这头两三年，那些地主儿子，是一个成器的也没有。

地主对待我们家里就是不理，虽然不是农奴制度，总是差一层，不大来往。每年请一二次，他们是来的，我们来往的朋友，都是穷人，也不在附近。

父亲他们都爱吃烟吃酒，我就讨厌，根本不吃，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小孩子她都不让吃——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是家里自己做的沙胡豆腐、干腌菜。在丁先生那里读书不久，两个哥哥去种地了。因为自己小，而且是过房，便继续读书，生我的父亲相当的好打人，严

得很，两个哥都怕他。他喜欢我，我也不和他们在一堆。家里也都喜欢我，因为伯伯房里只我一个，都没人说什么。同时我的继续读书，也还有另外的原因——那时清朝政府腐败，苛税非常厉害，老百姓们都说：

“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三班八房之类差人，在仪陇县就有三四千人，都是吃老百姓，都是吃人脑髓的人。当小孩子时，家里都怕得要命。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那么家里还是叫我读书了。

读书读到第三、四年，到了十岁（一八九五年），家庭就发生了变迁。

原来我们种的地是两个主人的。这时一个主人就不要我们住下去了。我们就不得不搬家了。在那些时候，家中的人也多起来了，么叔又生下了两三个儿子，小孩子就上十个，一大群了。土地这样一搞，没办法，就搬一部分家，分开做两处，我跟着伯伯和么叔就搬到大湾去住了。

大湾那里是姓朱的老房和地，都是典当出去了的。——这时家里发展了一些。因为正是种鸦片烟的时候，鸦片之战以后，大家都在种了。这样家里比较富裕了一点。所以搬家才搬得开。这时存有百多吊钱，又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把大湾自己的田地赎回来。这样才住起来了。经过这个变动，家里又不大够吃了。也没有旁的办法想，搬了房以后，读书就不能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新的先生就糟糕了，不好，又打人，还要背书，我也背不透，他也搞不来，读了有大半年就走了，不读下去了。那时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书，怎么样能背呢？

家里也不懂这一套，什么先生的好坏，只知道在哪里住就在哪里读书算了。

大湾距离马鞍场又有五里路，十一岁这一年（一八九六年），我就又到一个姓席的先生那儿读书去了。

师从席聘三

一八九六年，我十一岁，开始在席先生那里读书。

席先生名字叫聘三，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人——他的思想是开展的，对于那些历史上的人物认为都是假的，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有着丰富的学问，可是他不肯考了，所以不是什么秀才，却真是好先生。中国历代各朝的事他都懂得，从二十几岁教书起，到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周围的一些秀才、举人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在那里读书，当时他很高兴，因为学生都很好。我读了四五年，很有益处。《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廿四史》，你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讲什么东西，到处都讲。那时候我比较聪明了些，又小，先生比较喜欢我。十一二岁，读书多，背到了一大串，读到了《左传》，讲也讲得来了大半。

这时国家也在由腐败中间变化着——从中日战争以后，大清的昏暗腐败，完全暴露了。那时“亡国”口号提得很高，“变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应在各处了。四川的情形呢？也一样腐败，做官的压榨老百姓是常事，剥削很厉害，卖官（又名捐官）也是常事。譬如：一个县知事，就要几十万块。那么他做上一任就要搞一两百万走。庚子^❶“八国联军”进京，清朝失败之后，更公开地卖官鬻爵，土豪劣绅都像小说书上写的那样，这时农民经济也起了变化。国外经济的侵略已经因为长江交通的便利，而深入到四川来了。

❶ 庚子，干支纪年，即一九〇〇年。

搬家到大湾来，因为人少，同时自己也长大了一点，花在种庄稼上的时间更多了。一年差不多三四个月在种庄稼。六七个月在读书。席先生那里离马鞍场很近，离大湾有八里路，一天要来回跑四次，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从前我就没上过街，现在从乡里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以前一到街上，人家会欺负你，在琳琅寨那处风俗还厚道，地主作恶的还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这时，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庚子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席先生也讲。就懂得四万万赔款。因为这些钱都是赔到地主农民头上来。他们就作为加租的理由，来加到我们身上了。戊戌、己亥、庚子，又连着几年都是天旱，简直天天吃小菜叶、大麦、高粱，那可可怜。

我在席先生那里读书，就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了。因为常常要一起上街——顶好的是吴绍伯，是很好的一个人，道德品行都不错，书读得多，年纪也比我大，是学校顶大的，先生也很喜欢他。我们还是爱跳，读书也没用过劲，毛毛草草的。他们读通夜，那我是不能干的，因为我晚上要睡觉，非睡不行，我就说：

“读通夜要命也不行！”

在这时进步相当快。先生好，抓得紧，文章、作诗要交卷时，一遍就一搞，拿得出来，很快。

戊戌变法后，就又讲究科学了，有钱的人买了些科学本子回来，如《五大洲》、《算学》都有，都是变法以后编的。还有两个地球仪器。一看，知识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

我开始学算学，我学的还不错——因为会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里就学会了。当时因为家里都不会挂账，算账家里很需要，先生教，就会了。加、减、乘、除都会了。所以算学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学到比例开方，我都觉得容易——以后慢慢读成大学生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脑筋里总有一个想头：

——是有一个世界，就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

可是没有盘缠也出不来。

那个同学吴绍伯，更有志愿，两个人打了很多主意，找办法。

当时我们也还受先生很好的影响。他爱喝酒，他佩服的是做事业的人，他说：

“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

他是那样洒脱的。认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便没有路，说神仙不是人做的，那是没有路的人，才去做。

……席先生又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他认为周朝是假的，他认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坏。他说做得好只是用人处事得当。他说历史上都是为了个人的……

这样思想慢慢开展了。那时对《四书》、《五经》、《史记》读得还不错，贯串得起来，有点本事。《廿四史》虽不能贯通，大致记得。那个同学吴绍伯更好，因为是个书香家庭，破了产的。我们没书，他家里书却很多。还有他们有个经常跑成都的人，带些书给他们的儿子。可是他们的儿子小，我们便吃了便宜了。凡是新书都买来了，都是头一批的，还有米达尺、三角板……那时成都有一个算学馆了，我们借了学，都看到了，就拼命的来学算术，没有人教就是自己看书。这样眼光放大了，老旧的东西不太看得起。这个时代（信息）也传到了那里，如戊戌变法等，都是地方上在外边跑的人带回去的……那时只是打主意怎样到成都，到外面，这是我和那个吴绍伯天天所打算的。

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对历史小说都看过，《三国》、《列国》都看过。先生还给批评，还带着去看戏——街上每年唱大戏，还有木脑壳戏，小时候爱看。那样难看，很吓人。还有“木脑壳加肉脑壳”，是把小孩子搁在肩膀上，同木脑壳人一齐耍……这样戏在有几家住房的山梁上，也可以唱。还唱青苗戏，那是在栽秧以后起，各山上都唱。还有还愿戏、皮搭搭戏……每年常常不断地唱上五六个月，个把月。那里有四个会馆，是西湖人的禹王宫、江西人的万寿宫、广东人的龙母宫，大家共有的关帝庙、张爷庙。这些会馆都有田地，绅士们再凑上钱，彼此竞赛似的接连着唱。三吊钱两吊钱，就唱上一天。这些戏给我印象很深，从中间得知识不少。上十岁后就懂得看了。席先生带着去看戏，在街上还一面批评着，像《封神》、《三国》、《聊斋》、《说岳》，一折一折的

唱。对于《聊斋》，他相信是假的，他不信神，他常常说：

“靠不住，靠不住。”

关于神，我家供的是观音菩萨，早晚是都要烧香的。家里都不太信，祖母比较信，其余都是马马虎虎，不过烧香却是读书人管的事情。小时候我就不得不烧了很久，每次在天地、祖宗灶位插上四根香。

在街上几年，世故人情都通了。从最下层到最高层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理都清楚了。那是十岁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是过着清苦的生活。整天上梁下梁的来回跑路。思想变得复杂得很。脑子里充满历史古书。民主思想有一些，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对于清朝皇帝官员不满意，因为宣传和事实都是很厉害。在社会上一般的不敢说，总之不满就是了。那时，听到说：读书可以进高小、中学、大学，再出洋，总是这样想着。至于出洋回来做什么呢？总有事做吧，考官费考不取，上小学、中学，又没钱读，不得不另外想办法了。

那时给我很深的的一个刺激是吃大户——当时四川经济很发展，相当富足。可是庚子的连年天旱，很多破产的农民，就只有吃大户了。我正在席先生那里读书的时候，有六七百人来了。我们都吓得跑了。那里面都像叫花子，穿得非常褴褛，破破烂烂，男男女女带着小孩，带着杆子枪，来要吃的，给他们米就走……有的地主去报告了官，前两天来的都规规矩矩走过去了。可是这两天来了百多个官兵都是红马褂，拖着辫子，用马枪。有戴着水晶顶子的官，打着大头包巾的，对襟盘花马褂，下罩着长裙。兵来了，绅士们去迎接，我们就跑了，不敢看，那种气焰真是势凶恶极。兵来了就把吃大户的打了，还杀了些。就都跑散了，很可怜，四五十里血水成河……

那时因为有长江交通，四川开通早一些，同时也是四川一般说来相当有钱，拿出去换东西。在乡下都开始看到打洋伞穿洋布衣服，用洋货，种鸦片，用外国染料了。

同时却有很多地主与苦力吃鸦片，弄得家败人亡。

老哥会（哥老会）流行起来——譬如有组织地吃大户，不管城市乡村都充斥了流氓、地痞。因为农民失业破产，流浪出来的人是整批

整批的。农民破产，变得贫富悬殊。稍微有钱的人，就如同做了皇帝，坐着轿子走来走去。四川苦力原有两种，就是挑子、背子。有句俗语是：

“背老二，挑老三，驮骡子就是大老官！”

现在在城市里却另外充满“烂巾巾”（乞丐），成都就还有几千“光冬冬”——这是一丝衣服不挂的穷人。如在成都各门找个石岩住下，生下来的后代小孩也还是“光冬冬”。还有河上、江上，还有几十万船拐子，没有衣服穿。自流井的挑水夫、搬水夫，几十万都是“光冬冬”之类。这些都是农民破产的情形，在四川穷困已经是这样露骨了。

参加科举考试

在席先生那里读了八九年书，家里的人都是混混沌沌，也不晓得我读得怎么样，先生却时时夸奖——这时就是预备去考试了。可是父亲伯父都没钱，还好，我三叔做点生意，有点钱，读书勉强对付得过去。

一九〇五年，去考试。那时我二十岁了——考了那回以后就停考了。因为那正是“变法”以后，下一年就废止了科举。这一考就考出了名。本来先生叫我们去考，家里没钱，还好只七十八里路，就拿了一吊钱，去考一下子，一考考得很好。那时我用朱健德的名字，在一千多人中间考在前二十名里面。家里还不相信，结果拿来一看，果然是。

一考得起，家里就叫读书了，也不要耕田了。从那时起脱离了耕作的事。一共考了县考和府考。

考了一年试，没干什么。见了大世面，进了城。大湾离城七十里路，可是祖辈三代，就没有进过城。那时农民们进城，除非是打官司才去呢！

戊戌变法的思潮传到乡下。乡下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变法的。孙中山在我考试时，才影响大起来。那时候脑筋里对外国印象很深，不知道人家是怎样好。中国太坏，出到外面去看看，是真的更坏。自己没钱，知识也不够，就是相信留学生、外来人，懂得科学的人。

一考试，听到的更多了，也看到一些。那时全县人才荟萃，起初一看，感到我们学校里的那些人不如人家——我们饭自己做，柴自己扒，作文章也不好。那些大学生，可是白白漂漂的。我们衣服没得穿，上街都和他们走不拢。



朱德就学的顺庆府高等小学

那时土包子出门，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初去时，家里怕出乱子，先生也托付大学生带着。可是一出来就相反。同行的那些“先生”都是草包，什么都不会做，我们土包子，结果成了洋包子，事情自己做，还得帮他们干，因

为他们这些土豪的儿子，不懂得人情世故，什么事都让人家做，我们包袱一背就走，打前站、买东西、开账，都做。人家都以为是个老手，不晓得来过几次了。

到顺庆那还是第一次看见大河。以前没见过，人家说河如何大，坐船得如何坐稳，弄得满脑子害怕。结果，老远看见河在山上，人家说是，我们不承认，走到跟前原来还在河沟头。

本来满心想着不如人家，等到一考，才知道“不过如此”，又有点骄傲了。认为以前席先生说我们不行的话，是不可信的。席先生有个儿子，也没考得好，平时考总是第一、第二，结果考得不能入学。人家说是命不好，实际是看功名太厉害，一考就写不出来了。

考试后思想发展了，不想回家，打主意哟！

上新学堂

考试也没考得成器，因为四川那时已开始废科举，开办中学、高小、师范学校了。考试回来的第二年，就到顺庆去上高等小学了。这是一九〇六年。

办这个小学的，是从日本回来的一些人，是和戊戌变法有关系的，在四川是很有名的。在这里念了有半年，原来有点底子，现在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英文、国文，还有一个日本人教日文。校长叫张澜，很热烈地鼓吹“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要牺牲身家性命救国家……”这半年思想更开展了。读科学也愿意读。

一九〇六年的下半年，就进了中学校。一般说来，科学成绩不大好，先生的学问也不大好，多少学了一点……这一年，从家里要了四五十块钱。这些钱家里是东凑西凑上来的，心里想这钱要还，是没办法的。又过了一年（一九〇七年），我搞了四五十块钱去成都。在顺庆这一年，思想是大大的开展了。那时候在四川也有了东洋人，也有了西洋人。

在政治上，这时已经是废科举办学校，选举咨议局。但是相反的压制还是很厉害。那时流行的几句话是：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成都当时在我们耳中听到的，那是第一个城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全国也是数第一第二了。在我们读书时，洋货输入了，教堂都相当的多了……练新兵，办劝业（即实业），提倡家庭业、手工业、搞机器，成都已设立机器局、造币厂、兵工厂、拉洋车，都开始了。办警察——正是我们到成都时办的。新政在这个时候，一起搞起来了。新派和旧派两派闹得很厉害。那时，皇帝提倡新政，一部分官员也提倡；另外一部分

想反对也不行，因为是官办，把房子一修一弄就行了。

巡防军是旧军队，驻防全省原地。新军是陆军，只在成都开始有。

当时商业资本发展了。外国人来卖布匹，买四川的绸缎（都很漂亮，比得上苏杭的），收牛羊皮、猪毛、雀子皮，向外赶牛羊，贩鸦片烟。工业方面，有了枪炮厂、兵工厂、铜元局（即造币厂）、机器局、银元局，当时还兼用银元和元宝。银元多是元宝收回改造的。农村中也有了织布、缫丝、织绸的小机器，改良棉业，用美国棉种，农民们把它叫做洋棉花，也有了蒸汽机……

这时算是从最腐败中间来整新了一下。成都街上的“光冬冬”都被警察拉去，看见乞丐就拉去关起来。弄了习艺所，做手工业，所以我们到成都时就没有看见“光冬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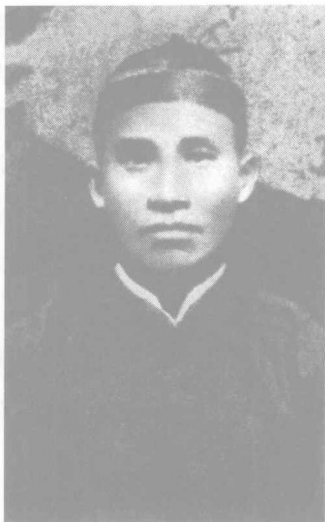
市面上一般说来发展很快，手工业发展，洋货也来了，市面打零工的人也多了。市面不是萧条的，而是畸形发展的，实业做出一些，可是卖不出，便弄花会——就是办展览会，极热闹。各县都设有劝工局，把出品弄来卖，都相当好，尤其是竹器很漂亮，是江安、泸州一带做的。把各种东西都拿到花会上来卖，这表示那时候各方面都在变迁。就拿废科举来说，那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做到了。

成都开始有了一种报纸，叫《四川日报》，鼓吹新法，还是官办的，铅印的。那时，一般说来，生活水平还低。苦力多得不得了，挑担的，抬轿的，推车的，拉洋车的。不过，官势还是很凶，仍然是压制老百姓的，各方面都是怕官，官大半也都是有钱的人用钱捐来的，所以每县的县官，都要苛捐杂税搞很多钱。官的势力是很大的，街上见到官，就要喊：“站起来！站起来！”没一个敢坐，头上戴白帽子的就得拿下来。官是坐着轿子的，一出来就是一大串，前面戴顶子的，打锣的，唱道的。成都的府官、道台很多，坐着拱杆的轿子，抬起来在街上飞跑，因为小官得避大官的道，碰上就要处罚，那真是下不得台，就得远远看着。大官一来，小官的轿子就得赶快抬到小巷子里去等等，回头再出来。小官早晚还得到大官那里去问安，初一、十五还要去参香。这些官对学堂就很客气，还看看望望。

锡良是满人，当制台，在凤凰山修营盘，练新兵，练得很好。赵

尔丰去打西藏，口号提得很高，是“开发西藏”，也花了很多钱，派了很多入。

在成都城圈里，当时还有一个皇城，西北角上，还有一个满城。这满城里住的都是满人，成天一点事不做，一生下来就有步粮、马粮，房子烂了，自己都不管，有公家给修，其懒不可比，就是学习操练棍棒，在街上男的提画眉笼子上茶馆，女的穿旗袍满街上走。五六十岁的老奶奶穿着花盘底的鞋，嘴里衔一根长烟袋。满城有个将军，初一、十五也得练一练操和比武，公家给他们发饷。他们都凶恶得



青少年时代的朱德

很，打人，哪一个人都不敢惹他们，所以满城里头老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敢进去。

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到处都操练，明火枪、前膛枪、耍杆子啊、耍刀子啊，遍处都是。乡里各处立了初等、两等、高等小学，也是一九〇七年前开始的。

我到成都那时，高等师范学校、武备学校都在招学生。武备学校是训练军官的，另有弁目训练军事的，我一考考上了——可是家里不准进去，晓得搞不成了，就没去。如果去了就搞成杨森这样的人了。我们在顺庆读书时候杨森也在，不过不在一个学校。这时我就入高等学校的体育专修科了，念了一年整的。

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先生也认为是这样。我们看来清朝时学校倒好些，郑重其事，认真搞，比民国以来的要好，只是内容不够。

街面上，穿新军制服、挂着洋刀和穿洋服的最摩登。其次是学生——被认为是先进分子，也的确说话比较激进的。师范学校、高等学校对于民主思想、科学思想，都认为是对的，主张痛改腐弊，对官家子弟都不大看得起，教员也都要说点新话，不怕官，也讲点自

由平等——不过官方的一般压制还是很厉害。学生一开始，还是进步的。豁然换了学生装，过起集体的生活，考得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拿官费的多。科学初到中国，算是相当堂皇的。那时候革命潮流在学校各方面，也相当的开展了。总而言之，谣言非常得多。有一点小事情就到处传播。康、梁这一派这时也不抓了，办学校这一批人，大半是这一派的。革命党办学校的也有，那是同盟会很少数的人，得秘密的。

当时，在成都的英、法教堂，也办了些学校，学生不很多，还没成为风气，只是办些英文短期班。可是那时民族思想很盛，去上课的都给骂做洋奴。

在成都的一年，有很大的进步。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革命思想也多了。这时就想：

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学生也都以革命者自居。有些人不敢说话，可是也少有人反对了……这一年把成都情形看到后，眼界更开阔了，心想：“成都也不过这样！”

开始进城的时候很惊讶，住了一年也就习惯了。我们练体操，练身体，讲究物理、生理、卫生，操得很好，普通体操会了很多套数，一年毕了业，就回仪陇县去了。第二年，就开始办高等小学校了。

读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由东借西借来的。用了二百多块，一直到我做旅长的时候才还清。

教书不是出路

我们开始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校，那一年（一九〇八年）只有五个人：张四维、李绍沆、刘寿川——就是到日本去过一年回来的，还有田玉如，是个拔贡，他当校长。都从成都毕业回去的。

当时正是改革的时候，新旧关系非常冲突。从前都是秀才举人，管理着书院，现在官家要办学校，要叫他们交出来，他们便不高兴。他们还聚集着那些顽固绅士——旧势力很大，来反对我们。这学校也是从很多斗争中间办起来的，我是既当庶务又当监学，又当教习，教体操。一年拿一百二十吊钱，差不多够一百二十块钱。还要拿钱回家。教了一年就吵了一年。

后来听说县里那一年出来的人才很多，现在有当团长旅长的。吴绍伯这时没有在一起，他去学蚕桑搞实业去了。这一年得到很大的经验与教训，是科学和封建的斗争，时时刻刻在暗中勾心斗角，一切龌龊事都来了。比以前听说到的多得多了。那时，那些封建的绅士们写了首打油诗毁谤我们说：

“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
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这一年也学得好多办事的本领，管经济、庶务，还管学生。别人挤得很凶，虽然钱少，可把别人的位置占了，在县里就成了面子上的人。过去是一个很下层的人，农民的儿子，现在当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已成为很上层的人了。

那时的潮流还是变法的，康、梁改良派与革命党二派并进的（当时的潮流是民主改良派康、梁变为保皇党，又名立宪党，主张君主立

宪；另一派是民主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环境变迁也很迅速：譬如由科举到办学校一般的人还不敢出来，只有进步的人敢出来，这些人的的确确是上了新的道，虽然说是没有完全成功。

不过变法在乡下、县里也还受到很多的阻碍。

我当了教员，因为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又没什么学问，就下台了，就是不能再做下去了。我走了后，那四个人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因为有的地位高一些，刘寿川、田玉如就去了顺庆府学校了。

从封建社会慢慢出来，再回去是不可能的。第一年（一九〇九年）便下了大的决心，要去干军队——那时候说国家将亡了。农民暴动相当多，不过不在那一块，像红灯教、白莲教与蛮子造反，反对洋人，都是一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也有教门组织的，是民主宣传得厉害的缘故……甲午之战，宣传得很厉害。以后八国联军，法国占安南，俄国占中东路，更是危险了。那些年，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清朝不得下台，喊得紧……当时，说铁路修通了，到云南，便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东三省太远。第二年便决心去云南，家里不知道，知道一定不叫出来。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我就绕道成都去云南了。在小时候，一面读书便想出外面去，等到了外面更想了，这样的决心现在就实行了。

第二章

投身军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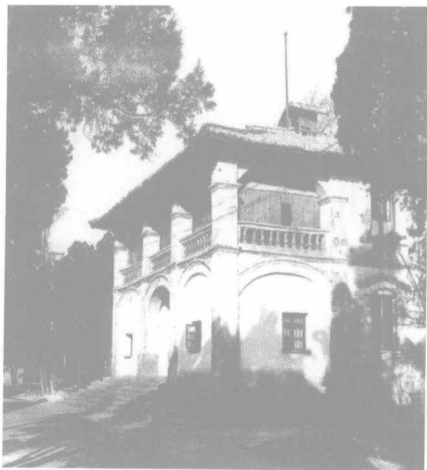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①

在教书这一年中间（一九〇八年）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于是下了决心到云南去。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那时清政府也看重这里，提倡治边了。当时就下了决心。那正是云南办新军的时候，多半是由四川调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家里是不知道的。我只告诉他们到成都去读书。等到后来到了云南，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知道我在成都和一些同学会合同路去云南。我走嘉定（乐山）、叙府（宜宾）、昭通、东川，到昆明，全是走路去的。到云南省城时，新军正开始成立一个混成旅，一面改编，一面招募。陈二安带着四川的武备学堂弁目队和一些军队过去。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到云南一看，与四川不同，文化经济发展得都较落后一些。社会上聚集着很多人，十分之三四都是四川人。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做工的，都有，他们由四川向云南流入。我到了昆明，开始在新军里找事情做。我什么事情也没找到，后来到一个连里去当司书录事，干了一两个月，就去进了学校——云南省城同四川差不多，设有学校，陆军学校、测量学校、师范、中学、小学。过了一两个月军队生活就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学校的，本来就是同盟会的一批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政府一面不敢用，怕他们，一面又不得不用。结果这班人才很艰苦地创办起来了。学校的

①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抄稿本。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规章与日本士官学校一样，生活很苦，同士兵一样起居，饭食、进操都是一样，只有上课不同。管束得也很严，完全是新军队生活，非常之严。头一个学期差不多是补习普通科学。每天上六钟点的课，下两钟点的操，学些普通科学。在这些方面，我都获有些新的心得。讲武堂很着重打靶唱军歌，打野外，完全是现代化的训练。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

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差不多六个月。普通科以后一年，是专门学军事，学的战术、兵器、筑垒、地形、交通、军制、卫生等科。

这一年学习得很有一个样子了。普通科学也有很大的进步。军事学也还不错，在一般同学中间，有很多连普通科学以前就没学过的。这时，在云南一般革命的动向更长大了一点，传播得厉害。对革命的思想，普通教习也好，军事教习也好，差不多都带有鼓动宣传的色彩。进步的学生在这时就比较团结了，一部分来做革命运动，其余的也无人反对。

第二年（一九一〇年）就专门学军事了，归正科（也叫特科）。我们是学习步兵的，就这样一直到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毕业。

学校也没什么学期，就是那样一天天地学。有时候是星期天出来，有时候也没得出来。经过这段学习，等毕业时，对一般国际问题，都有了相当常识。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同时这个学校还没有带有一种官僚腐化的习气。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李经羲^①等想把学校抓去解散归并，可都没做到。李根源当监督，对于学校帮助很大。学校

^① 李经羲，时任清朝云贵总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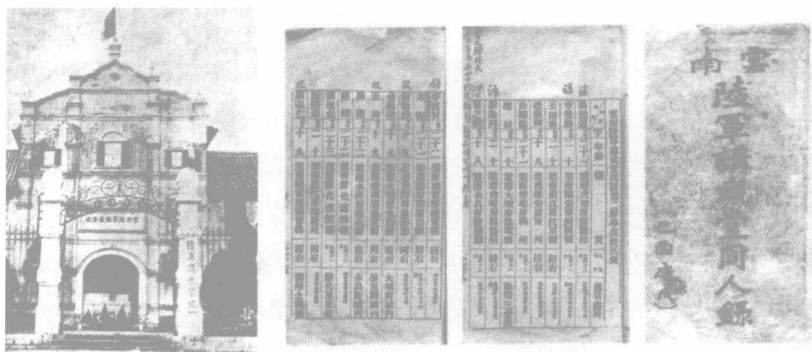
还有督办，校长是个只挂名的。开头是杨伯莼，以后是高尔登，高是一个道台，是日本士官学生。没多久，高去了。以后就没了校长。负责的就是李根源——这些人都是同情于同盟会的。整个差不多都是同盟会的人在那里办。好处就是肯实际干，一切动作都是实际化。拼命地练，很艰苦的……

我参加革命运动，是第一学期后。那时大家都在搞同盟会的小组，我们那一个小组的现在只有范石生了——学校里一般都是参加革命的。就是辛亥年，反对的也很少。两百人中间从前也只有七八十人。那时是秘密的，搞不好就给捉去杀头。不过，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是从来没有怎样严密过的。只要几个人感情好，就搞成一组。那时候三民主义已经出来了，主要是讲民族革命推翻清朝，民族独立。当时那些组织在各方面都有活动，都有一些联络与来往。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整个新军队伍，一般都倾向于革命，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一些官僚、地方巡防军。但是那时官僚是相当腐败，新的不和旧的来往，旧的也一个不到新的这边来。形成一种不同的隔绝。这时有一个好处，才创办新军。有一个师长，叫崔文良，一共换了三批，第一批是由四川锡良那里带来的，他们虽说不上同情，但一般是不反对我们的。后来他们被赶到东三省去了。第二批北洋派来的，新军成立了十九镇，这时我们也要毕业了。后来又来了一批新的，在北洋军阀中很有势力，很厉害的一批。云南的新军，第一批都是四川人，第二批是北方人，第三批也是北方人，变迁很多。军官换来换去的。在这时革命浪潮是很高涨的。外边官僚势力的防备、压迫也渐渐厉害了，道台们就造谣说：

“这讲武学堂养了一批小豹子，养成了出来，哪里能不吃人！”

从前拖根辫子的——我们学校却同外国的差不多，在清朝时，就把辫子剃光了。当时像这样干的还只是我们一个学校而已。

当时我最爱练体操，尤其器械搞得很熟练，在学校里算一个好手。一个老弟兄经常去教同学们，学也比旁人学得快一些，在那里，李烈钧、唐继尧还当过我们的教员呢。这时，也可以说是一个学习时期，也可以说是加入革命时期、运动的时期、当兵的时期。两年中间当兵背背包、跑步，比起现在“抗大”要苦得多。开始学校也还有点打人骂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左）；讲武堂同人录（右）

人，遭到学生反对，给反对掉了。那时在军队里，也还一样打人。我们那一班，是跟着大家一起毕业的。那时，学校分为甲、乙、丙三班，本应该甲乙班先毕业，他们是军官班，我们是学生班，他们比我们来的晚，去的早，搞到七月，双十节武汉起义前，我们就也抽出来跟着甲乙班一起毕业了。

参加云南重九起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我们由讲武堂毕业出来，也不过一两个星期就给分派到营盘里去。但是营盘里就不敢要，知道不好控制，结果还是每团要了九个人。我们那时学步、骑、炮的都有，不过一方面人家怕你革命，另一方面人家怕你把人家的地位拿去。开始以见习的资格去当副目（等于现在的下士班长，在学校时是正兵），我们毕业的还是最好的，算优等。副目没当几天就又当了司务长。那时候营长就是刘存厚，人很漂亮亮的，就是办事胆子小，也加入了同盟会。这家伙又要革命，但又怕得很，怕死。因为他是一个四川人，仰仗乡土关系，我们在那里还可以得到掩护。那个团的团长是罗佩金。可以说，在那里，除了第一营营长是一个反动的家伙，第三营营长也是蔡松坡^①的学生，所以我们这个团有把握，一方面向士兵运动一下，一方面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多。

当司务长就做士兵运动。那时兵权是操在北洋军阀手里，部队里也有一部分是讲武堂的人。做士兵运动多半以家乡关系、哥老会关系，从反对军阀、反对打人各方面来进行。一个革命党人，在当时捉住是会被杀头的，可是那些由北方来的士兵出身的军官，又怕这些人。这中间有一个矛盾，他们想不要这些人，同时又少不了这些人。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大官想不让我们接近士兵，一方面又必须得叫我们去上课，打野外。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

① 蔡松坡，即蔡锷。



朱德与参与云南起义的一部分同仁的合影

会，正是打秋操，上面要考，不得不干，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我们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后来，一下子反正起来。那时候做士兵运动也有一点味道，谁也不说，相互的只是心照不宣。碰上打人的官长我们就对士兵表同情，士兵就高兴；再帮他们写写家信，多上上课，感情好一点，士兵便听话了。运动的结果，只有卫队、巡防营、新兵在官僚一方面，看是靠不住的了。我的任务是运动制台李经羲的卫队和这一个团，其他部队不归我。到卫队活动是以四川人的关系，原来在里面有些熟人，不大被注意防备。我可以随便来往。因为多年不打仗，听说要“革命”有些害怕，话不说穿，但是大家都知道。

“反正要革命，要打了。”

在营里，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已被攻下。那真是“风声鹤唳”，清朝势力在动摇，谁都想到云南（起义）是必然的。这时，李经羲可靠的军官已不多，那里面运动可以说完全是成熟了。蔡锷当旅长，下级干部多是讲武堂的。士兵也都练习得很好。就拿大家单单对于官的仇恨，也要干起来。兵都是新兵，有些懂得的，知道要革命了，都要干，显然的划为两种势力，一面是新人物、新军、学生、教官；另一面是“叩头虫”派，就是那些旧社会的官僚，成天“叩头”，我们很鄙视他们。我们已经改变，只是敬礼就完了。清朝末年，虽然也添了一些侦探警察，他们要捉革命党人，可是侦探也是不行，警察也不认真

捉。总之，当时凡是新一点的人，都具有民族思想。

运动渐趋成熟了。武汉是八月十八日，云南便在九月九日^①也动手了。当时，李经羲看看（形势）严重起来，就要捕人。我们的团长罗佩金知道要被调走，果然调走了，派了另外一个人来。那时一般工作是愈下层愈好做。他们军官同下层隔离得很远，简直不通声息。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却经常来往，到处都是通的。他们虽然知道我们有计划暴动起义，反正也无多大的办法了。李经羲知道蔡锷靠不住，只有另外一个团长丁锦还比较靠得着。他们这些官僚，这时便也有计划地对对付了。在总督衙门里修筑了防御工事，调了机关枪二连，辎重营一营，工队一营。官兵一部分自觉得也靠不住了。他们要开始屠杀人了。秘密计划却被偷出来，是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株偷出来的。愈搞压力愈大，本来约定的阴历九月九日晚十一点开始，结果不到九点，刚刚黑就打起来了。但是子弹很少，因为（上面）怕暴动，不发子弹，我们只趁打靶的时候偷出一些子弹，每人也只是三颗、五颗便没了，枪倒还是蛮好的枪。那时我们驻南教场、巫家坝，结果北教场先干起来，一个营要干，两个营还在徘徊，要干又不要干，忽然团本部烧掉，团长跑了，整个团就乱了，就又有两个连跑掉了，其余的一个连集合起来，去攻城了。这里，蔡锷已来南教场指挥。北教场一动，那些官僚吓晕了头脑，制台就打电话来叫增援，实际他们也晓得无济于事。已布置好了，蔡锷就在电话里答应：

“就来增援！”

同时他却宣布了独立反正，讲了几句话。

在团里，立刻就把一切旧有的连排长赶掉了。有些好的让他们去办伙食，坏的就捉掉。我就同我们那个连长对换了一下，因为他人还不坏，他就当了司务长，等进了城打仗，他还是偷偷跑掉。在夜间九点钟打进了城。

本来在骑兵团里我们运动的工作做得不好，李经羲准备拿他防御

^①八月十八日和九月九日，都是农历。

我们，我们却有炮，因为炮兵团在我们一边，也有一些同志，团长不肯干，营长要干，就干了，多阔气，两个团起来进城。骑兵团模模糊糊接到命令来堵着城门口。可是他们上头也没给他们清楚的任务，他们也不知道要堵什么，我们部队一开到，那边喊着问：

“干什么？”

“打野操的——不要打枪！”我们喊。

我们这样一喊，后来他们过来几个人询问。我们说：“反正了！不要打！”

骑兵团长便拖了一部分队伍跑掉，其余都跟着我们来了。从城里面，讲武堂一部还没毕业的同学来开了城门，我们就进了城。这时天还没有亮，四面城墙都被我们占领了，正在围攻府衙门。他们集结一部部队，已退到城中间的五华山上。因为我事先已与卫队通好，有联系，所以我去打制台府。只一冲，卫队就交枪了。制台也跑了，不见了。我们进去，搞到很多贵重的东西。那时我们新军还是讲纪律，城里秩序很好。四处响着枪声，我们在府里架了枪，谁知我们架在城墙上的炮以为还没攻下总督衙门，就吊起炮“轰、轰”的两三炮，我们正在里头，把自己人打死了三个——慢慢镇定了人心。但是五华山和军械库还没有打开，便把炮拉去，几炮把墙打倒，进去。这时已是次日十二点。有了子弹，大家都高兴，觉得没有问题了。一直打到晚上，炮打五华山，把那个师长钟麟同打死了，山也打下来了。

这时，靳云鹏（是李经羲的总参议）装扮一个抬轿子的逃掉了。多数的军官被捉起来了，如藩台这些人。不过中间有些与我们通声气的，就没捉。只是不见制台李经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把他找到。因为他平常对于蔡松坡还好，蔡这时保护他，叫出来好好地讲，第三四天就送他到和安南交界的地方，放他走了。昆明攻城，一共是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就大致完结了。还有些散兵，还戒严，第三天完全清楚了。我们死的只是十几人。杀了些可恨的军官，骑兵跑了一些，慢慢又收回来了。

因为资粮不够，因为还有些老资格，我参加了这次打仗，我又去当排长了。这时云南的各类组织都焕然一新了。立刻组织了都督府，蔡

锷当了都督，李根源当了军政部长。省城昆明虽已肃清，但是在云南还有散在各地的巡防军，即刻出兵去解决。就在省城反正的时候，在大理、临安^❶两地的两个新军团，也同时反正了，搞乱了一些，跑了一些。因为纪律不好，还发现了抢劫的事情，很多商家给抢掉了。临安很混乱，在大理就好些——都是第一次。这震撼了全国而突破几世纪封建重压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在云南就是这样胜利的完成了。

❶ 临安，今建水。

北上援川

革命的热潮滂沱在各处。当我们云南起义胜利的完成了——为了要增援武汉起义，保卫云南，四川、贵州，便成为革命必争之地了。同时清政府也想以抢夺四川为进击云南革命势力的准备，端方便由湖北溯江而上，进入四川。这时滇军编成八个营两个梯团，出发去援助四川，去和总督赵尔丰打仗。

那时军队纪律蛮好。我还是当排长，蛮能干，差不多连司号长带连长的职务，都是我自己在搞。因为那些人都是新的，不会当。我们是学生出身，兵也搞得好。就这样从东川、昭通、叙府打进了四川，到处都很被人家欢迎。我们当排长，老百姓看着就很威风，可是我们又担心人家害怕，就到处给人家讲好话。人家还是说我们纪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东西要给钱……天天在出发，天天在走路，很远六七十里一走就到。人身体很健壮。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画一张地图，布置宿舍营地，感到很有趣。晚上查哨。那时候兵也算好带，可是你要没有一点本事，他就会欺负你。旁人带不下，我们就行。兵说不打人好，就好得要命。我们也觉得带兵有味道，一路走还唱点军歌。一直到四川，沿途就没打什么仗。那些队伍一打就跑了。从前老百姓管军队里的人都叫“老总”、“老爷”，现在我们一来就改做“先生”，到处都是如此叫。到处巡防军跑掉，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我们就占领了叙府，转向去打自流井。在自流井有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有端方的一个团，结果那一营被缴了枪，这儿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到自流井后，即升当连长。一当了连长就更行了，更阔气，道台、

县长这些人都来拜望你，不得下台。那时，自己预先还没感觉到，老百姓对于“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我们这一营，四个连，都蛮强。自流井一打开，端方被他部下杀掉，由湖北带来的团却又到重庆，向汉口自动回去了。

在成都，十月间赵尔丰就不得不让位给咨议局，但是却搞得稀烂，很多人只是打着革命的招牌，而没有实际做出什么。我们想由自流井去收拾这个局面，但又遭到他们拒绝——里面有些人也还是从云南跑过去的，像刘存厚他们就是。四川就这样由清朝统治转到这些一抓到地位就忘掉革命的人们手里去了。一下庞杂地组织了五个师。那当然是没有底子的。当时又因为云南内部发生了土匪兵变的事——如果那时，我们能好好把队伍整理一下，顺长江下武汉，则革命可以大大成功，更应该紧紧抓住四川军队，把稳，对武汉、江西都可有收获，变成有力的新政府。而当时只想成功了，没有事，就回到云南去。李协和（李烈钧）从成都来，我们以一排人给他，他就下了武汉，又添了十几个人，结果拿到了江西，可是我们就因为没有大计划，即没有去武汉，而坐失了控制赣皖等地发展革命势力的可能，回转云南了。

实际革命没有一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可是大家都嘴唱着“成功”，以为不得了了，四川也就没搞得好……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间，在自流井过了年后，就开拔回云南了。到达云南，已是四五月间了。到四川这一转，在我个人也变得经历不少，出长江未成，回云南创造了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前途。

滇南边界游击战

从做士兵运动到带兵，起义带着军队把敌人搞掉，一切都是归自己管的。在叙府、自流井都是这样——在这一时期里，云南军队系统还没有乱，军官换了革命者、同情者。云南的起义，一般说搞得还很好。纪律也维持着，军队没有乱，军阀给赶掉了，政府也加以改造。不过那时云南相当穷，军队回来也没有办法发饷。蔡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官一律是六十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所以省下来的钱很多，用来多养活一点军队。县知事旧的一套取消了，不是要做官的人去做，而是叫学生来做，是很好的事情。改造了县政，很好。他们每月三百五百块顶多了，一切开销都在内。当时财政收支还是统一，结果够吃穿了。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由四川回来后，有些退伍的，补充了些新的军官，重新又练了两个师，是将七零八落的改一改，只两个师，不管在政治、财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革命后在全中国还没有哪一处能这样真正创立一些基础，开办了银行，生产事业也办得较为宽广。另外一路唐继尧带的那个梯团，也顺利地占了贵州。贵州和云南毗连，不过原来也归另一制台管，现在把他们这一伙人赶走，仍然归云南管了，形成云、贵两省的巩固局面。

我们沿江一转回来，大概剩下了百八十块钱。我就用它买了一匹马——那时我倒是四十八元薪金，守纪律，不敢敲丁税，也拒绝人家的送礼……回来的时候，那匹马却一路给生病的士兵骑。还是自己走路。回来以后还是当连长，训练新兵两个月，手续搞清楚了，就被调

到讲武堂做学生队长去了。

讲武堂有五个区队，每队百十人。这时我教的学生中有去年未毕业的，原来本是一班的同学，现在又来教他们了。一面教军事，一面打野外，一面还要管理。有些学生是到过南京、上海，革命过来的，不大容易管。到民国二年，我在这里约十一个多月。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

一九一三年，我又调出来，到原来那一团里去当营长了。

头一年在当区队长的时候，在云南讨了一个老婆，是省城人，是半自由结合的。她叫萧菊芳，是高等小学生，一个新的人物。那时讲武堂的军纪很严，限定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三可以请假，这还是限于有家属的人呢。

就在当营长的这一年，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妥协，袁世凯团聚了封建势力来打革命党了，解散了国会，而成了分裂现象。云南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师去配合长江作战。这一次我没有出发，只剩下两个营管理整个云南全省。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继尧）那时是在我们一块的，只这两个营，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都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墙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就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在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什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了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都把它拿下来了。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做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

护国讨袁之役

在表面，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开始了与反革命的妥协了。

那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妥协，让去了南京，我们感觉是“不大好”。各方面都是可以打的，同时，新势力并未很大的完成，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只想快成功，拉拢拉拢。一妥协，旧势力反占了优势，而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间也发生着一种腐化。民国二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革命，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而且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认为不应该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的政策就是一种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就趁势一刀，把革命势力打退，清朝旧势力复了原。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解散了国会，解散了国民党——准备着把时代拉向后退，恢复帝制。在这一种低潮下，很多革命党人，从各处跑到云南、贵州——在这儿形成一个革命的根据地。但这时旧的势力占据着各处，如南京的张勋，广州的庞济光，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乡铭，势力都很大。在云南，当唐继尧从贵州回来，就日趋腐化了，把过去蔡松坡的作风，一下子改变了，政治也搞成自己的了，私人也还搞了一批军队，一天天朝着蜕化方面走。袁世凯收买过他，也不大注意到他，袁世凯他自己以为皇帝可做了。但是当时云南的革命者却非干不可，便开始布置。蔡松坡在北京时，袁世凯十分注意他，终于逃回来，就又来领导了第二次的云南起义。

在蒙自、个旧时的一团人，我已经带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干部整齐，也多，也听话。但是这一年，调回来以后，

唐继尧另外换了一个团长，让我去又弄一个新的团。那个换去的团长，却是一个急躁的人，全无战争经验，后来在泸州给张敬尧打破了。我在后面带着的新团，连夜赶才赶上。重新收拾了旧有的这一团队伍，马上继续作战，是四川纳溪有名的战役。

那时候已有点名气。蔡松坡当军长，我就带了两个团，当第三支队长。打了几个月，顶住了北洋军阀曹锟、张敬尧的号称十万大皇军，给了很大的锻炼。后来剩下



护国讨袁时期的朱德

这六个团打得真好，由腊月打到次一年的五月，袁世凯死。我们只有六千人，抵着敌人十几万人，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民众拥护，不完全搞阵地战。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连，有炮步兵连，敌人总进攻，我只在山顶上带了两连的新兵，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的炮弹，打退他们。那时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在讲武堂里练出来的，有了信心，便支持着。敌人也不凶，张敬尧的队伍算是最精锐的，气焰很盛，我们还是把他打垮了。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护国军这一次战役，它所负有重要的意义是不下于辛亥（革命）的。而今历史上却不注意。当时两湖、两广、北方，可以说都是袁世凯的势力。袁做了皇帝，民国被取消，洪宪元年做了半年。护国军则不足三师，云南两个，贵州一个，而起义，就把袁全国军队打垮了，实际就是东拉西扯，给拉垮了。可见革命的潜在势力还是极大。

起初（一九一六年），在四川与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打，陈宦那时带进四川的有四个旅。我们先打。只用两个团就打垮了他四个旅。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

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带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总在子弹射程范围以内。

此次战役是曹锟做大元帅，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做先锋，打来了。张那时很骄傲，上奏折，劝把败将处死，满以为自己可以一战而胜……这消息却被别人晓得了。这些人就向我们通声气，不打仗，假如我们要子弹，他们还可以供给。所以五六两团才得集中力量，一起打泸州的张敬尧，那一下却把他打下去了。刘存厚起初也响应了我们，把曹锟也打得差不多了。四川督军陈宦，袁世凯最亲信的人，也响应我们而独立了。

每一次总是垮了再来。

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二连来冲锋，曾经在一座棉花山坡上守了四五十日，不下火线，结果很困苦地拉下来，安全地撤退，赶了一天路到永宁河的山地里面。那外面就是扬子江边，隔了三四天，我们就反攻，一个夜袭，把敌人还是打败了。那些北洋军纪律很不好，拿老百姓的大蚊罩子挂在战场里，拖了许多女人去睡觉。我们打来，他们也不晓得，一下子杀死了敌人很多，都是赤条条的，他们就溃退了。

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我们的一个团只剩下六个连，攻进山窠里一间小小的房子。在里面，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炮弹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巴。围上来的敌人有十几个营，结果他们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四川的地形也很怪，是盆地，有小山坡、树木、田地，交叠错综的，还有很多沟沟。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后来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白天我们到下边田里去，兵士们装做下去捉鱼，其实是把稻田中的水放干了，预备晚间好走。这样到山地又去守了两个多月……

袁世凯就在一九一六年因为护国运动的展开，不得不在三月里下令撤销了帝制。不久他死了，护国军就算结束了。

驻军泸州

……当时，张敬尧、曹锟都来了电报，要求“讲和”。

我们军队里子弹也不多了，人牺牲掉很多了，疲乏了，就允许讲了和，蔡松坡做了四川的督军。可是有些四川的军队，因为不愿意蔡做督军，又来打，把这些部队打垮了，蔡才去做了督军。

蔡松坡因为生了肺病，在作战时，就拖得要死，三个月后去上海治疗，又到日本去医，几个月后，他就死在日本了。有些传说是日本人有意毒死了他。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三十五岁就死了。

在这一次维护革命力量的“护国军”的阶段，革命者已经懂得做统一战线，譬如和改良主义的合作……同时，也知道了要群众（这是辛亥革命时还没懂得的事）。同时，还保持了云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儿收容了多少革命的亡命者。就这个底子，积蓄了力量。这力量虽然小，还能终于得到了胜利。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镇压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本来他走以后，交代给罗佩金。那时罗正当护国军的参谋长，接了事不久，那些四川军阀得了北洋军阀利诱，便来攻打滇军了，想赶走我们。这样一来，乱子就又起来了，四川也得不到太平了。打的结果，统一战线被挑拨离间分裂了。贵州军也和人家勾结好了，结果也来赶我们——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其实，四川根本不是革命根据地，而是南北军抗衡的地方。

在这期间，我带了一团人，驻扎在泸州。

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两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滇军声威很大，北洋军到处看着。他们马刀背起来，样子很凶，滇军也

不怕，我们不驻在城里，后来他们搬走，泸州就归我们了，就驻在泸州，支队成了团。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了。

在自流井、叙府^❶、嘉定^❷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有半年。那时四川的督军就让给刘存厚了。

❶ 叙府，今宜宾。

❷ 嘉定，今乐山。

护法战争

……世界帝国主义的大战，已延长好几年了，在国内，北方政府，由袁世凯又转到段祺瑞一流人的手里去。一九一七年这一年，我们退到叙府、自流井、泸州，接着就是靖国军起来护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国会，而掀起倒段护法的运动来了。

这时段就派了吴光新到四川来，和四川军阀一起来打滇黔军，东打西打又打跑了北军，熊克武来做了督军。本来，我们护国军时，熊是四川人，随护国军人川，发动四川旧部，因为都是同盟会的人，就帮他成立了一个师。云南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不过在那时候，我们也蠢得很，总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帮人家一搞就成了个师，我们却抱定了精兵主义，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那时候如果能多多组织军队的话，那么革命前途会好些。不过实际我们一团却可抵着三四个团，可是后来人渐渐打得少了，最后只剩下五个混成旅、十个团，却打了百十个团。

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

结果我们把熊克武、刘湘、刘存厚、旦怒刚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宁。

那时知道回云南是没法的，非搞出一条路来不可。我们不肯回去，

大家都反对唐继尧，晓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没有饭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们讲，革命总要在外面发展才成功，主张打。我那个混成旅最强。他们怕，结果，他们这一师下来，我们一旅上来，就打垮了他们两个师——那时，刘伯承还在那边当连长。这样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杨森，他们都引退到保宁（阆中）去。大家不愿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吕超当了督军，但是顾品珍又不愿意，想自己做督军，不支持吕。结果，他们又从保宁来了一个反攻，我们又退向泸州，把我们的军长赵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们在一九二〇年就退回云南去了。

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有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幼年时的朋友吴绍伯在我在云南时，他也来了，后来就在旅里做事，现在就病死在泸州了。他还是思想很好、蛮新的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那时正苦于打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

自己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因为那时周围旧社会势力，逼得很厉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总甩不脱，天天总是官场那一套……其实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只有“不做工不吃饭”的才摆脱得开。我和孙炳文常常谈这个问题。

在那时，除《新青年》以外，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卢梭的《自由论》等很多革命书籍，而且在新学堂时自由、平等、义务、公德之类，已讲过，已充满了脑筋。

这次护法靖国军运动，具有充分的革命意义，一贯是反袁、反北洋军阀的。那时南北成了割据的势力，军阀混战，七八年间，革命是消沉了——同时，因为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而且革命只发展在南方，北方还是压迫的。在南方也只是滇军支持。湖南失败了，湖北军垮了，四川混乱着，只靠云南做着革命的种子。

【附】

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①

敬赠 映空大和尚 雅鉴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詎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班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



游昙华寺时朱德与友人合影

① 一九二二年春，朱德在云南赠诗文给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流露出对军阀混战的厌恶情绪。此信被刻成石碑存在昙华寺。

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洵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觐。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 西蜀朱德 敬赠

逃离云南

回到云南把唐继尧赶走了，顾品珍做了督军。他们有些不高兴，我就把兵交给唐佛川，自己只想在云南休息几个月。那时，已经想出洋，不想做了，虽然感到打来打去革命没有出路，却也没有怎么悲观失望。也有一些钱，也开始把花园修得很好。还在修洋房子。云南挨近法国铁路，欧战前我就想去，只是没有钱，现在更想去了。在泸州，父亲、母亲、兄弟都从四川的大湾家里出来过。到了云南，叔叔们经常有人来，来了就给三百五百带回去。

生我的父亲后来死在重庆，伯父也死在云南了。和我在云南结婚的萧菊芬也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她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在泸州时又讨了一个。我的洋房子还没修好——唐继尧打回云南来了。因为连年作战，都已疲乏……在省城结果并没打出个所以然来。唐拿些钱运动，就垮了些，又活动了些土匪，也不过三五千。人。这边二三万人却没人领导，兵都不打，那些指挥者都没有信仰。唐继尧将要来的时候，又让我去当警察厅长了。可是正在这时，我的父亲死了，棺材放在那里，我



朱德在云南时的留影

就不能走，否则早就从昆明出去了。结果出不去，就成为逃亡的人了。城里当时还有一连人，就带走，送我们到金沙江、会理州，同路的人有些被捉去杀了头。我们被掩护着回到四川，从嘉定到叙府又到南溪。在云南的家被唐继尧没收了，母亲携带小孩，后来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

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了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又转到重庆，杨森正在那里当镇守使。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就在他那里住了个把星期，还一齐看了龙舟。不久就下决心，沿长江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驶在长江上的航船，不管黑夜白天，“卜卜卜……”的把烟瘾抖脱了。

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在那儿很舒服，住着最上等房子，一天要八两银子，也没吃些什么药，就是滋养。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出了院，在上海住不下，都说我有钱，事实上就是穷光蛋了。这个来找那个来找，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

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一九二〇年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八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

从津浦路上，我一个人到北京去了，正逢上曹锟贿选，对于国会的印象很深，很不好。在北京到处都看了看，封建味道蛮浓厚，宣统还深居在皇宫里头，街上在初一、十五，还有穿戴着顶子褂子乘了轿子去上朝的，在什刹海还看到些中国的怪人，到处还充斥着王公大臣，街上弯腰请安的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在那参议院里，就豢养着一批新官僚。其实在曹锟贿选中，奔走的也还多是那些老官僚……

不久，我就往北，往张家口，到绥远去了。一路见了古战场，颇

生感慨。在归绥^①城外，还看了昭君墓，还到鸡鸣山参观了新式的炭洞^②，坐了那到洞里去的新式吊车。

在北京又会晤了孙炳文，不过共产党关系还未寻到。

再沿津浦路，我又回到了上海，仍然住到肇家浜路一个姓陆的名叫佛眼的广东同盟会同志的家里。我前后在上海停有个把月，中间到南京、西湖到处逛，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

第二次到上海曾经遇见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我对于孙先生的印象很好。他那时叫我回到广西的军队里去。我说要出国，他叫我去美国——这当然是他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关系。他说美国是新的国家，我却坚持要去德国，看欧洲的情形，还有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我们聚首谈了几个钟点。那时，正是孙中山刚在广东被陈炯明赶出来，滇军已经到广西，去广东打陈炯明了。所以他想拿钱叫我去打广东。结果金汉鼎去了。孙中山从前也很注意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总是响应他，打通电，举着革命招牌……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① 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② 炭洞，即煤矿。

【附】

在启程赴欧之前^❶

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顺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

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虽然他时常接触到，但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科学上的都市，无异于一棵摇钱树。

第三，他希望现在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

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已经戒烟，但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疗否？

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生平时，似乎仍是不自觉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

❶ 本节选自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的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的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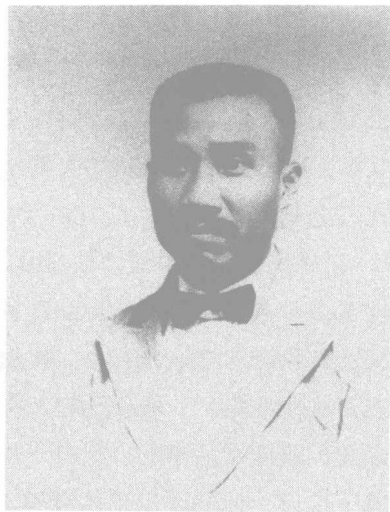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弱小，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不过它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从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新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轰动了全国。一九二二年一月，当朱德和他的同志们还在云南山区艰难行进的时候，香港中国海员已在要求增加工资，承认他们的地下海员工会为合法。当时，英国海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刚刚赢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重大胜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已经八年没有调整，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倍。

香港英国当局拒绝了中国海员的要求，并且监禁了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脱了大逮捕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的号召下，香港海员团结一致，举行了大罢工。二十四小时之内，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国雇主家里服务的仆役，都一律罢工。曾经被骄傲地称做英国权力堡垒的香港，整整瘫痪了五十天。罢工最终胜利结束。英国当局承认海员工会，同意增加工资，并向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工人赔礼道歉。

当朱德将军谈到这一激动全国人心的反帝斗争的首次胜利时，他的声音都发颤了。广州的孙中山政府曾为罢工提供二十万美元的基金，中国的军人们给了大量的捐献，而全中国的工人更是倾囊相助。苏联工人曾为中国海员募捐，而英国工党则在议会提出了香港大罢工问题。

朱德将军宣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在香港大罢



朱德在上海时的留影

工期间，京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天后，罢工结束。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一元，工人争得组织工人俱乐部（这是工会运动的萌芽）的权力。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以及香港大罢工的部分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达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①。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他酷刑对待工人。

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筋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

^① 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的。

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更多，工资则少得可怜，工人靠这种工资过活，至多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像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殮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

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过，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都有传闻，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当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社会上的重重灾难，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场白日梦。而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

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像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倾泻出来，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一支幻梦般的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跟随着他参加战斗。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冲去，杀死想像中的洋鬼子，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

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沮丧。他不像一般人，谈起白日幻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

“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人的时间太长了，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

离开上海，他到南京游览。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个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经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王朝。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

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

朱将军以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一十七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

“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始终渴望美国的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谈到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新政策是什么。直到两年后，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他当时是在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

和孙中山会谈之后，三个人又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这次会见的时间极其短促。朱将军毅然用这两句话否定了胡汉民：“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随后访问的是汪精卫，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领导人，享有盛誉，在国民党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孙中山。怀着素来尊敬知识分子之心，朱德在访问他时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顾这次会见以后的十五年，汪精卫的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表现，使他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不是想不起来就是不愿去想了。

即使不从政治上考虑，汪精卫在朱德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从头

到脚充满了大丈夫气概的朱德，对于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像的人物是毫无好感的。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以轻蔑的口吻说，“他努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几个钱。而他则是个穷光蛋。他夫人控制了钱，通过钱，也就控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于共产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终于会见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卓越的作家和编辑，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这时大约四十岁，面色黝黑，有些麻子，简朴地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他精力充沛而又果断，谨慎而又寡言，他就在这间屋内领导着共产党进行组织地下工会的工作。

对这次会见的回忆，显然引起朱德内心的很大矛盾，他对此也不愿多说。近年来围绕着陈独秀而展开的斗争也许能够解释这一情况，虽然这仅是部分的原因。朱德去会见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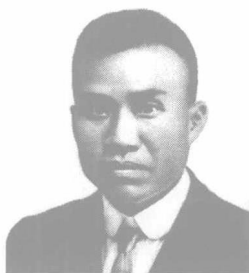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将军痛苦地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做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探寻解救他们的国家的秘密。

第三章

天涯寻正道



去欧洲一路见闻^①

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到法国上了岸。

我从幼年一直到革命时期，总觉得外国是了不起得很，一定各种关系都很好……一路上看到的却不如想像的那样好……一路最显著的是看到贫富的悬殊更厉害，阶级更明显。在那些热带地方，大洋房子、花园都很漂亮。但是就在那大马路的旁边，却伸出小破棚子，那里面的，都是衣不蔽体，那样子在中国也还是不容易看到，那一种压迫打骂的现象，真是差得天上地下去了。

在南洋一带有很多广东人、土人、安南、印度人，这些亡国灭种的现象，给人印象很深，过去，是没有这么确实的亲眼看见过的亡国奴的惨痛。

对于外国的轮船交通是感到便利。

同时感到海上的宽阔，一望无边……因为自己是陆地上长大的人，对于浩渺的海，实在是特别有趣味的，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

经印度洋之后，中国人就少见，多半是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在做着苦力。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不穿衣服，就是围个裙裙，多得很，住的房子更是说不上。看到世界上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了。一到地中海，情形就感到十分欧化了，是另外一个环境了。

刚刚是欧战^②以后，各处打得残破不堪，帝国主义的元气都是还

①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② 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没有恢复，一般的创痕很深……在马赛上了岸，到了巴黎，都没看出什么帝国主义兴旺的气象。只是颓丧，虽然机器已经在运转，而那还是带着一种修补欧战创伤的形式。法国也就是这样。

战争的恐怖还笼罩着一般人。

充斥着……孤儿寡妇的车站上，贴着身讨钱的乞丐非常之多。

另外一方面，远看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是很高的。我们上去一望，虽然巴黎是打得残缺破烂，旧的观瞻轮廓还是存在着。那时因为自己要做一个进步的共产党员，总是拿唯物史观的方法看世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是透开窗子的看法，帝国主义的表面好看，真看透它的内部，那就坏得很。是应该多着眼于穷人来看好一些。就在那时，法国还是满街上遛着悠然的绅士，晚上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衣服，每天都似过节一样。

这时期，在我思想行动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起初几个月里，物质条件、交通这些看来很好，一路上心情都很愉快，生活也有着变化。不过在国内，一般过着军队的生活，说来那是进步的生活，同国外的生活差不多，而且在从前当农民的时候，就过得很有规律，天一亮就爬起来。后来在军队里，也是这样，到国外去过生活，还是比较适应的。

沿路上没有学会外国语，英、德、法文都不会，很吃亏。事事得靠翻译，而那翻译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也没有怎样学得好，结果还是靠自己。以过去的军事经验看地图，凭记忆记着这个路那个路。那时反正是非旅行不可，还是大胆地去了。

到哪里就先花角把子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就照那上面的去走。

在路上也学了几句英文，数数目还是可以的。孙炳文会一点英文，也说不成。因为这样摸索，沿途对于地理了解倒是一个大的进步，虽然说是在船上、车上，可是经过都留有印象，而且也有兴趣，特别注意……

到巴黎那里，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几天，然后和同船的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到柏林去了。

留学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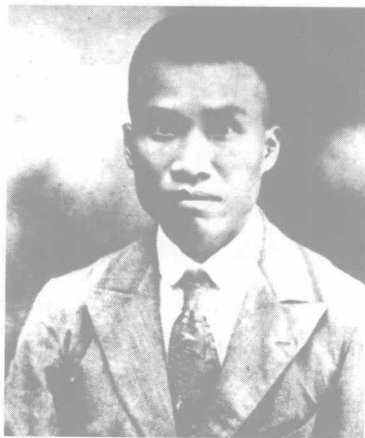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



朱德在柏林时的留影

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何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趣。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

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族，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族。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朱德在哥廷根时的寓所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他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

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附】

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①

季子、莘农^②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③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④，再入赤军^⑤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⑥为申送事，逼得治华^⑦出党。今岁法组^⑧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⑨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名，熊锐^⑩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

①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② 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③ 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④ 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

⑤ 赤军指苏联红军。

⑥ 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德小组。

⑦ 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

⑧ 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法小组。

⑨ 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组织负责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⑩ 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绝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①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此间数月来，为国民党^②工作及改组学生会^③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国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④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

朱德 顿首

三月七号

① 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② 民党即国民党。

③ 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

④ 《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

留学苏联

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在列宁格勒被很好的招待，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犯，被驱逐的人们，特别被约去各处讲演，宣传了帝国主义罪状，到处被欢迎着，还参观了很多地方。

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在巴黎、柏林那里，那么多人每日花了多少钱，做出了多少事？在列宁格勒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有很多人，对于苏联是带着浓厚的幻想。我对于苏联是认识比较透彻些。我把这样的意思，坚决地同那些到列宁格勒马上失望的人做了辩论，纠正了这样的现象。

在柏林的时候，对帝国主义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都有了相当认识，不仅看到了那种形势，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运动。对于德国从欧战中垮台下来，为什么到一九二四年，英国、美国又借款给它，把它救起来，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涨……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当地讨论了。而且从这环境中间，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连的，而且了解到革命绝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在德国，每星期我们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的多是这些理论问题。

在苏联又开始学习，进步就更大。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唯物论辩证法，在德国和李季他们也常常讨论过，多不很深刻。在苏联得到实际，参看了好些计划表册……这时我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学校里，中国经济地理这一门功课材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益处很多，其中统计表、数目字，都是很多。接着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经济地理，哪一国哪一国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是要记得清楚，因为我的数学搞得还算好，所以对科学、经济学、军事学、马列主义，都很好的注意了。

我先在东方大学念了几个月，随后我去避过暑，学习打野营，学习军事，野营归来以后，我就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去继续了六七月。

在那一年中间，除了广大的宣传会、劳动节以外，根本没到街上去过。一天都老是学习，关在小屋子里研究。指导我们的教员也好，都是特别请来的专家。另外就忙着参观，参观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学校、工厂，还做了军事学的实验，如毒气爆炸。

我深深感到以唯物史观来建立科学的教育，的确是进步的。可以根据数目字、画、表，一滴一点是有证据的，有计划的，推进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处处看到那样广大的运动，自己也投身在这广大的运动之中。那些大公无私献身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但坚决而且处处是实际行动。我在柏林那儿，就曾经说服了很多加入了共产党，也说服过很多反动派的反对。在莫斯科，一些调皮的同志，更很容易地说服了。一般，我在那时还具有着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劝告他的话后，给人的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那时，我也看清了整个世界的系统、各种组织，这对组织观点可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亲密爱护，都有着影响。

在莫斯科那些地方，城市没什么奇怪。我对于那深深的乡村、广大的森林、田野上的道路，以及热烈地进行着的大规模的耕种，很喜欢，因为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优秀的地方总想去看看。在苏联的确跑了不少，我顶高兴的是那大的森林。不大喜欢热闹的大城市，在那儿住久总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间就舒服。看那些动物园、展览会，还没有爬哈尔茨高峰那样有兴趣。我对巴



朱德在苏联时的留影

黎那样大的戏园都引不起很大兴味，这一点也许是残存的农民意识吧。

在中国，正是革命高涨的时候。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国了。在苏联这一时期是精神顶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身体也很好。脖颈上长的癣在莫斯科经过电烤也好了。那时我还想学习，如果再住年把，可以多学习很多东西。可是大革命起来，便被催起程了。

从莫斯科走了十四天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去。在西伯利亚沿途望见整片森林，是苏联很大的一笔财产。铁路修得很伟大、宽敞，很了不起。车窗外的旷野是那样广大辽阔，在中国是很少见的。有些地方还没有人烟，是很好开发的。

到了海参崴，船不通航。那正是暑天，我就到离海参崴十九里路的过去王公别墅去避暑。那时海边上，时常洗洗海水澡，很舒服地住了一个月。那会儿海参崴市内已修起电车。不久，我就搭船经过日本门司，一直到上海来了。

第四章

大革命中



策应北伐到万县^①

回国来了，到了上海。上海的市面比较从前我出国时，要萧条些，街道上很多店铺取消了，代替的是那些大公司、洋行。这时，除了先施、永安，又有了新立的大公司。我在上海开始做秘密工作，参加北伐运动，比较多的，还是上层的活动。这时北伐军正要出发，北伐中间极其需要了解北方军阀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布置和军队的情形。我为了调查这些情形，曾经去南京一次。在南京的军队，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调查清楚，就回来了。因为以前军队里的旧关系很多，我是十分顺利地就把孙传芳这些军阀情形弄熟悉了。回来后，党决定分派一部分人去工作，或者到广东，或者到四川，我是因为四川军队很多，又熟悉得很，就要我去四川。

到汉口时，北伐军已经打过汨罗，汉口戒严了。当时在汉口都是吴佩孚的军队，同时我就在那里又开始做调查吴的军队的工作，在武昌、汉阳、汉口，各方面都活动了一下。我们党的秘密活动，也很厉害，在那儿负责的是湖北省委陈潭秋同志……

过了个把星期，我就写信给杨森，他来电报欢迎，我就去四川了——那时杨正驻防在万县。他个人比较起来，还思想古一些，想做点事业。我到那里去活动，主要的就是告诉他们今天世界上整个的情形，讲解三民主义，劝他加入国民党。杨正在很困难中间，他势力很大，拥有十几万军队，但是军队都是不统一的。我的那里底下的青年，都很能接受我的宣传，很想加入革命，一般老军官则是

①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制造万县惨案的肇事公司英轮

惧怕革命的。在万县时，我们因万县惨案而发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当时万县打得很激烈。起初是英国商船碰沉了几只小船，死了几个人，我们扣了他们的商船，英政府就开兵舰来抢。没有抢

去，他们不敢上岸，就那样对打了几个钟头，把他们打跑了。我当时促成杨森惹了这个祸，是想惹乱了他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不得不搞起来了。四川在长江上，当时来往的洋船很多，一下把原来行驶的民船都挤下去了。这样惹起船夫对洋船很深厚的愤恨。四川局势是刘湘、刘存厚、杨森等各霸一方。四川是顶乱了，到处军队驻得满满的，一县就是几个团，搞得民不聊生。那时大批的失业工农都潮水一样涌到军队里来了。

杨森在国民党北伐军围攻武汉声势浩大时，他才下决心加入了国民党，把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我就到武汉去，为他活动交涉这个问题，那时在杨森那里的还有刘伯承、陈毅……

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时的行营主任是邓演达——他是我在德国很熟的朋友。我们谈了，有十几万人的力量加入革命军。当然，他们是赞成的，马上派了些政治工作人员，给我带去杨森那儿工作，委任杨为二十军军长，派我做党的代表，委任状也拿来了。可是杨看见当时武汉还未攻下，又动摇观望，要宣布又不宣布；要干，又说在旧道德上太对不起吴佩孚，一面同国民革命军拉在一起，但是一面又和在四川的北军于学忠他们来往。那些人，当然还是赞成他维持旧势力以孤立革命的势力。杨森把部队开到宜昌，而对外面没有一个明显的态度。

我劝他赶快宣布“国民革命军”……

不久唐生智以出重兵来威胁他。我又劝他不要同革命的队伍打仗，如果一打，那就更不好宣布了。结果他没有打，退兵回去宣布了。

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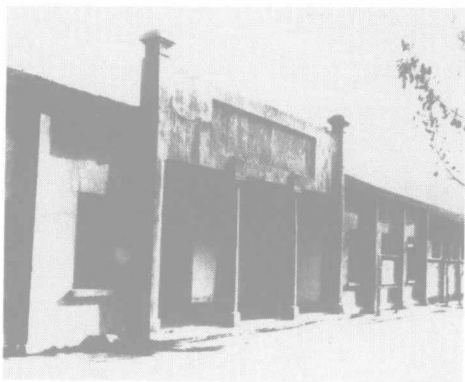
我在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离开杨森回到了武汉。党又派我到南昌的朱培德那里去。在武汉时，我第一次和蒋介石会晤，他正要出发到南昌去。他就匆匆地走了。不久我也就到南昌去。

朱培德当时在南昌当第五路军总指挥。他原本是云南时代的同学，又是同事。有很多在云南时是我的部下，现在都参加到他那里，所以我和这支队伍是历史关系很深的。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有很多苏联的顾问，一般人对我也十分欢迎的。

他们赞成我来办学校，教那些军官来受训练。我除了学校工作以外，参加了各种运动，譬如工会、各种训练班，我都深入到中间去，的确是在那里很活动。那时候可以说是革命盛极一时的时候。工作很顺利地开展着，上层下层革命的空气都是高涨的。那里的一般军官朱培德啊、王均啊，一般的对我还不错，一切教育工作，也在采取新的方法进行着。几个月工夫，除了训练队伍之外，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一大批——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一部分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同时在外面的各县里头，群众运动、工农运动，也都打下了基础。

我兼任了南昌的公安局长——是保护革命，恐怕群众被摧残。就在这保护中间，革命势力也扩大了。反动的势力也因而陆续地起来了，平常形成了一种两者的对立。朱培德在这中间就采取了中立态度。他对于革命不反对，可是对反革命者也不离开。

到六七月，各方面惧怕革命的心理聚集着，把教导团调到抚州去，驻了一个时期。在学校里三分之一对革命是很热烈的，其余也多是表



南昌军官教育团旧址

示同情者，最反动的还是很少。在这里面有些是招生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在这个工作上，有一个缺点，就是党没有大批大批送学生到学校里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

六月，从武汉已发出国共两党分裂的声音，不久武汉政府向不幸道路迈进，是

已经十分明显的事了。

七月，教育团有两个营毕业了，一个营还没有毕业。这时我被朱培德“欢送出境”了。反共空气澎湃着。很多地方赶走共产党员，捕捉共产党员。我因为平素与朱培德他们感情还好，而博得一个“欢送”。在唐生智、冯玉祥那里，大批左派分子也遭受了同样的“欢送”命运。在广东蒋介石下面，四川刘湘下面，则来了恐怖的手段，到处杀头，好多人逃跑……

南昌党的机关很多都立刻隐蔽起来了。

我到了武汉，那里也正在解散工会、农会，缴了自卫队的枪。这时工农组织已发展得相当大，相当多，组织的武装也不少。

那时革命空气一天天高涨，因而威胁了部队军官。开始，国民革命军口号是“打倒军阀……”三大政策，后来到处喊“工农运动过火”。事实上做得并没过火，好多地方还没搞起来。可是就这样，已经深深地威胁了中国的地主阶级，他们与那些老军官是有着血缘的密切关系的。这样，革命的右倾一天天搞起来了。

另一方面，因为武汉、九江租界的收回，外国人都只好撤走了。这样，就引起中国不革命的部分，像四川、广东、上海，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而开始向革命进攻了。

在我们党的本身上，也有着缺点，统一战线做得不怎么坚强，没有好好发展党。陈独秀说“民族运动大大发展”而采取了关门主义，不让新的党员进来。当时，在党领导下的工人有一二百万人，农民有几

千万人，接受几十万党员参加算什么，可是共产党员限在五万的数目上，中间还多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知识分子。工人就没有三分之一。党不能够抓紧时机大大地发展、强壮自己，在群众中建立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党当时不晓得要武装。在工农运动中，本来可能弄到武装，但是忽视了这一点，只是帮人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群众条件本来是很好，很热烈。就是在军队中的工作，也只做了上层的，而没有与下层很好联系起来……第三，怕群众运动高涨，视之为“过火”，恐怕吓退了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附】

致孙炳文^①夫人书



朱德与孙炳文的合影

炜坤^②：

鉴闻濬明凶耗传来，吾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濬明。于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 德

五月十号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① 孙炳文，字濬明，朱德的好友。一九二二年九月与朱德等赴德国留学，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冬回国。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

② 炜坤，即孙炳文夫人任锐。

第五章

保存火种



南昌起义^①

在武汉，党就决定了南昌暴动。

当时我们的部队力量太小。如果革命军力量大，那时向革命方面分化的还要多些，但是只有叶挺带的军队、张发奎的一部分。叶挺从广东出发时，只有一个独立团最可靠。叶挺在武汉成立了师。那一团因而发展为五个团，成立了两个师。就是叶带的二十五师、二十四师。这是主力，在二十四师中有一团靠不住，后来跑了。另外是贺龙的二十军，有三个师约八个团。最可靠的新编第三师，有一个教导团，团里多半是学生，有些还是临时编制的……这些武力，纷纷集中在九江、南昌。张发奎是想回广东，队伍还没撤下来，蔡廷锴带了一个师同叶挺一路……

我们开始布置了。从南昌被赶出来的人，以及在武汉的人都赶到南昌去集中。不过有很多地方，那时被隔断走不来。

南昌有朱培德一部分部队，做留守。我们部队从九江开往南昌，就有相当布置，一般的是我们人多，敌人兵少。我们有把握，在军事上是会顺利的。

这样多兵团集中南昌一地，街街缝缝就都住满了。就计划在七月三十一号晚上暴动，这时队伍到南昌也不过一天左右。到那天晚上，人们还不曾觉得我们在各方面都已布置好、计划好。主要是贺龙、叶挺在这里面领导。不过集中的人有很多，周恩来、刘伯承、林伯渠、徐

①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用的驳壳枪

特立、彭湃、恽代英、郭沫若，许许多多的人，张国焘、李立三，还有些左派的国民党……

计划晚上一点就开始解除朱培德部队的武装，我被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一直搞到夜晚九点，还拉在那里饮酒。可是因为发命令太早，一下走漏了消息。那是贺龙部队一个云南人的营长去报告的。他们得到消息，因为封建关系，立刻惊怕起来，马上派人来叫这些军官立刻回营。他们起来要走，我也不好拦挡。不过这时朱培德本人是到庐山去了。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去。此刻街道上已不通行了。我赶到贺龙的司令部告诉他消息已经走漏了。于是不得不提前两点钟暴动就开始了。

到天亮，一切已经完全解决了。

在军事上算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南昌的银行、机关都掌握起来了，就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坚持国民革命，但还没有宣布土地政策……张发奎马上就带队伍来追，我们就以二十五师的一部分在屠家铺堵着他们……但是，在暴动期间没有把赞成我们的广大群众、工会、农会号召起来，没有组织新的队伍、把枪支集中起来，过了两三天就准备走了。

南下受挫

八月一号二号，就准备出发，在南昌组织了政权，也宣布了些政纲……

这时决定去打潮汕，要争取广东根据地。

当时没有决定到湘鄂赣区域去创造根据地，而只看到广东。因此将主要的基干队伍都带回广东，在南昌参加暴动的队伍没整理好，就带走。天气又是暑天。这样没有健全的组织，新加上去一些队伍，不久就带垮了一些。当时，时间是不应该那样仓促，如果大大地组织一下，搞好，连队伍带群众组织二三十个团是可以的。但是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同时也不知道改造军队，譬如蔡廷锴的一师，是在革命势力威胁下同情的，没有改造，结果整师送给人家去了。

我们在五日出发，蔡廷锴另外走一路，预定在抚州会合，他却跑掉了。在他那里，我们带得动的有五个营，他自己只四个营，但是交给他一下都带走了。那时部队里充斥着家乡观念，而未能站在党的观念上领兵，还是依靠那些旧军官。平常没有决心，当时急着干，那还行？！出发时，又正是伏天，很热，行军又急迫，由江西走东江，都拖了一半了。

我被举做在暴动中组成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育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

五由南昌出发到了梅州，得到了蔡廷锴叛变的消息——这对于我们可以说是很大的教训与警觉。于是重新组织了一下队伍，把不大靠得住的清洗了一下。然后分二路推进，一路经宜黄、宁都；一路打广昌，走瑞金。沿途没什么大战，到瑞金和钱大钧的部队打了一个大

仗，追到会昌又打了一个大仗，敌人两个师一起被我们打垮了。我们就休息下来，整理。这时有一个计划却使自己吃了亏，那计划是沿汀州走上杭……实际上应该走会昌，出筠门岭，到梅县。这样可能占领梅县，条件稳当些，结果变更了这计划，而临时决定走汀州、上杭，吃了亏。结果又撤回一部分，贺龙带着到了瑞金。这时我们正面上，广西黄绍竑的五个旅来到会昌，又同叶挺打起来。虽然是打退了，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真的走筠门岭，则主力可以打破黄绍竑，而进入广东，就没阻碍了。

决定撤回来走汀州、打上杭。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在十月三十日与敌进行了很大的战斗，在三河坝连续打了五六天。

占潮汕的部队又折回头来打梅县。经过汤坑与广东主力军作战，却打了个败仗，而使主力受损失，潮汕又因之失守。

我们在三河坝也打得很厉害，得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下来了。这时潮安、汕头复被敌人抢去。我们陆续打了几天，收容了由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准备打游击战，不再打正规战……由福建上杭向江西。这时敌人来两个师追赶，一直到武平，打了一仗。从此，再退下去，就没有再打仗了。我们向筠门岭走信丰、大余。十一月间，一直退到崇义县上堡山上去。这是我们失败时做了有秩序的退却的第一步。

我从南昌出发，就是走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在瑞金就遭遇一师的敌人，就打起来了。损失很大，第二天大部才赶上，打壬田市的仗，以后就当追击队，追到会昌，一直到三河坝，都是打前头——办事的人都是临时组织的，但都是有经验的人，一到了地方，事情便都办起来了。群众很欢迎。当时，我们宣传的还是国民革命。

我那时走点路也骑点马……

周恩来、刘伯承都在参谋团，还有徐特立、林伯渠、李立三……

当时组织了政府设在潮汕，还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到主力失败，这些人都分散了。郭沫若他们和我在三河坝分手。叶挺、贺龙也都到香港去了。

在困境中与范石生合作

我们撤退向江西、湖南，一路上大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穿了阶级斗争，组织红军。这时还有一二千人，有陈毅、林彪。沿途逃跑的很多。到山上人就不太多了。编排，准备，休息，现在坚决地组织起来。在大余就组织成一个纵队，干部还都是大革命时的干部。组织了教导队，干部相当多，知识分子也不少，并且重新组织了党的教育机关。

我们组织起来，胆小的跑了些，人都很疲倦了。

范石生那时在广东东江、湘南一带当军长，原来我们打东江的时候，就和他通了声气。这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开始整顿。由各处筹到一点款子，由信丰、大余搞到了一些地图、药材，就在山上进行训练。敌人忙于军阀混战，也不来追，因为这时张发奎在打广东，两广事变起来了，另外唐生智也同广西打起来了。在这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及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不可，非组织红军不可。

以后我们同井冈山来的一营人会合，大家兴趣更高了，更热烈地开会，组织……范石生这时又派人来联合了。原来我们有人到他那里去，中间我们南昌暴动以及去广东，他都是表示同情的。当时我们正疲倦，又没子弹、服装、被盖……就立刻和他讲了统一战线。他接济我们十多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多块钱、医生、西药、被单……我们互相结合着。因为我和他有云南起义的老朋友关系，所以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我们始终心心相印。在红军的

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我们这时是以半公开的面目出现，我以王楷的化名出现。

山很大，有吃的，又有粮食有钱，民团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没去打他，落得休息一下。把干部弄成教导队，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政治部、支部书记……好好地搞起来，人手很齐，整有一千多人，编为两个团，一个团是王尔琢，一个团是伍中豪。

这时范石生去打广东，很多的东西留下来了。

在湖南汝城，我们同广西军队又打了一仗。然后我们在资兴、永兴又驻了一个时候，又从范石生那里领了五六十万发子弹，这样把湘南的党恢复了，而且开了党的大会，准备了以后的湘南暴动。

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发生了暴动。我们想去增援这一暴动，把队伍开到韶关。从各方面组织，到处组织农民协会，援助他们打土豪，打得稀烂。这样一来，范石生有点害怕背不着了。

广暴失败，范石生始同广东（军阀）有了勾结，不能再掩护我们。我们就离开他，走了。临走，他还送来一万块钱。走出来后，就占领了仁化，打乐昌，没有打进去，又转向湖南攻宜章，就在十二月底打进去过年了。

从范石生那儿出来，我们就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而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在宜章首先高举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国土上的红旗——镰刀斧头的红旗。我们捉了土豪，缴了好几百条枪。这时只剩下王尔琢的一个团，另外一个团押解子弹去井冈山。在范石生处临走时，我去信说：“应该好好建立统一战线，革命到底。”他来信说：“你们是会成功的，我劝你几件事，政治上‘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军事上多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把队伍搞掉……”那时，在宜章仍以我的真名出现，军阀们才知道南昌暴动的队伍又出现于湘南暴动了。

智取宜章

当我们攻宜章以前——我们涉渡了乐昌河，在一处很小的山上，一批贫穷的农民委员会干部被土豪赶逐到山上来了。我们收容他们到队伍里来，找他们做向导去打宜章。可是怎样打呢？我们想出一个计策——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叫胡少海的，他就是宜章人，他就写了一封信，到宜章去说：“我在那里当了团长，现在要带队伍回来保护地方……”

马上把队伍伪装起来，他一带就带进宜章去。

当地绅士都来欢迎他，县长就请他去吃饭，还坐了两桌陪客……

就这时，我们把城门一闭，统统都捉着了。县长、土豪一个没跑。就开始来了一个暴动，把城里重新组织起来了，马上分兵下乡去打仗——便着手组织起苏维埃来，完全依照广州暴动时宣布的组织方法一样。并且很迅速地组织了工会、农会。几天之内，在发动和影响之下，各处乡下都暴动起来了。这样一来，大家都很有兴趣了。因

为一下变为一个新的世界，红旗也高高地打起来了。我们“第一师”的番号是广东省委给我们的。就以宜章为根据地，地方党早有组织，扩大起来，又组织了第二团，由胡少海领着去坪石打土匪胡凤璋……



宜章县城旧址

打垮许克祥

有一个星期，各方面的“围剿”开始来了。那些部队是由各方面军阀派出来的，广东就派来许克祥一师，唐生智又一个教导团来，立刻就来了四路——我们知道在宜章蹲不行了，因为我们的兵很多是才暴动起来的，就把兵一拉，往宜章的西南角上退去。这时我们主力部队有三千多人。许克祥有五个团，算一算可以打的，子弹也还充足，就打。在西北角上有一个寨子，黄沙堡附近我们没有打开。那个寨子很厉害，群众都很革命，只是土豪也很厉害。我们想去消灭土豪，而去扶助起革命力量，随后我们到了黄沙铺，就把兵力集中于此，是很有把握的。许克祥又去调广东团防。我们在黄沙铺一带。当晚寨子也打开了，缴了民团的枪。这时我们仍然依靠着山和群众。这时，广东民团派队伍来增援。我们在早晨出发，去一打就打跑了——这一天，又行军四十里。刚刚宿营，去看看地形，好布置步哨，这时大队伍还没到齐。我们刚刚往山上爬，还没上去，距离山顶百把米远，许克祥的一连人却出乎意料之外地占据了山顶。这时我左右连参谋长等不到十个人。还好，那山是梯形，一级一级的，他从上面一打，我们就退下。恰好这时队伍将将赶到左面，我们一连步哨，从他们后面一插插上来，就打垮了，还捉到了俘虏，一问，知道是许克祥的部队，追出十里，再过二十里，到窠蟹洞，山势很险要，群众也好，我们在这儿整理一下，准备好了，就又打出来。许克祥很轻视我们，不曾把五个团兵力集齐，很快地追来了。我们也知道他是不会五个团一起来的。

我们就同他打了遭遇战，一个钟点解决了战斗，把两团人打得稀烂，乱跑了一顿，我们追了七八里，缴了枪。这时我们是打野战，地

形还不大熟悉。

第二天，得到消息，听说许克祥在宜章，就去打，准备给他各个击破。我们是早晨出发的——把部队的中心放置在大路左面，左面就是山。我们先头部队一下却走错了，到了大路上来，知道不对，就下命令停止。哪里知道这时敌人已经躲在路口上，刚刚派出两个营绕出前面就打响了。如果当时不停止，就一直走到敌人的窠里去了。

我们部队插出左面，从他屁股后头一打，又垮了。垮了就追。敌人跑得一塌糊涂。我们和许克祥的阶级仇恨是很深的。许那时正被资产阶级看做宝贝似的。我们没一个不奋勇地追赶……

在一条沟里，我们机关枪从山上打死了很多人马。

赶到坪石^①街上，那街上满满的塞满人和东西，因为许克祥的一团人通夜也没走出去。在街上一打，那些东西、人跟山一样，房子又矮，人就从东西上、人身上、房屋上踏着追过去，又追了一二十里，只剩下许克祥带七八个人跑掉。大家都想捉到他，我自己带了部队追赶，结果到河边上，他们摆着船过去了，向广东方向逃去，没有追上，如果当时先来抢船必定把他捉到了。

那些溃兵也乱塌塌地向湖南郴州跑，也追赶了个通夜。这样我们大发其财，五个团就这样一打便打垮了。在坪石街上的敌人还有两个团，就一下追到那里，大家都感到热闹有趣。那里也很富足，距离宜章只三十几里，但是那儿就是湖南以外了。到那里又搞了些山炮、迫击炮、子弹，把家伙都搬到宜章去了，把散兵军官也通通编起来，充实了自己的两个团，枪、马都多了，大家都看得宝贵得很。我们决心把许部搞光了，次日跟着又追，留下些人在坪石办事。在那儿挑盐的老百姓听说打垮了许克祥，都高兴得跳起来，因为许克祥在湖南“马日事变”后杀了很多的人。我们一来，宣传大家挑盐，盐贩子都不要钱，赈济了穷人。这样，我们收复了宜章，打到郴州。

^① 原文如此，可能笔录有误，似应为岩泉。

暴动烈火遍湘南

这时，主要的是我们利用了敌人的矛盾，同时是在群众比较好的地方，统治阶级比较薄弱的地方。那时正是唐生智和广东打仗，都不来注意红军了。许克祥一方面要打唐生智，唐也防备许。我们一下把许部打垮，许部就不敢往唐部的阵地跑，结果两面堵，就打散了。他们向郴州的西北边上插去，由那一个空隙上跑了。

我们进到唐部阵地，面前那些农民、地方党的同志都喜欢得跳起来说：

“去报仇，去报仇！”

又告诉说：那里唐生智的只有六连人枪，可好，都纷纷地劝我们赶紧打。我们依从了农民的话，赶快拿一支队伍一插，插到他们后面去，正面小小地一打，后面再一打，一下搞到沟里去了。六个连通通地缴了械。那一批全是汉阳造的新枪，兵也多半是湖南的小学生，都收编了。中间有些散兵逃回去一报告，说：“不得下台了。”等晚上，我们追到郴州，连团长都跑得没影了。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许的一部分到西北的山里去了。在那山顶上，当宜章暴动的时候，郴州有些同志领了枪，在那山里面做工作，等他们一到，这些人有一二十支枪，一围一吼，把枪炮缴下来了。这些农民也发了“财”。这时，我们占了郴州，又成立了两个团，宜章团就回去了，也自己成了局面。这一次把许克祥算打垮了，唐生智的一个团也被解决了一半，郴州团打仗是很有力量的。

个把星期以内，资兴各方面的同志都兴奋起来，要暴动。这情绪是压不下去的。不暴动是不行了，就带兵去。永兴来要兵，我们派一

个同志带了一班人去。到那里一夜工夫，缴了民团八十多支枪，因为那里的民团根本不大坚决，又组织了一个团。在耒阳，我们党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群众也好，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连一个月也没用，这一带地方通通暴动完了——这就是有名的“湘南暴动”。井冈山上，已由毛泽东同志在那儿建立了根据地，现在也下来人。把桂东、汝城两县又搞下来。这样完成整个湘南七八个大县。这儿的农民很好，组成了很大的湘南苏维埃，主席是陈毅同志。

这样一直到处打，永州蓝山，打得都很快，萧克就在这时出来。他是嘉禾人。这时，唐桂两系军阀还在那儿混战，我们就去打衡山，又到了安仁。唐天际同志，就在那里出来了。茶陵一带通通暴动起来……

打到衡山，那里有个地方叫罐子场，白崇禧派队伍来打，不过不多，结果被我们打垮了，就去收场子，恰好这时唐生智和白崇禧正在衡山方面打，唐部一下退到罐子场，白部逼近罐子场，我们也来打，彼此都莫名其妙。我们先到的，唐部来了，我们便一缩缩到后面的山上去。唐部也没敢进去。往后缩了一下。白部来了，也没进去。就这样在场外三面对峙起来，中间都空出个场子，大家都是看着。结果在第二天，三方面看都没法打，都退走了，唐生智从此就失败下去了。

不久大“会剿”来了，其中以桂军为主，有五个师，正是四五月间，田里要栽秧的时候，大小仗就这样打起来。我们一面打，一面收缩，在各处山上，布置好，留下一些游击队，其余的队伍都上井冈山去了。

湘南这一时期发展很快，搞了七八个县政府，群众也真的鼓起劲来了，打土豪打得很彻底。不过湘南党的负责人陈佑魁整个是个盲动主义，到处乱杀乱打……还好，那时军队里就没有执行盲动主义。一般缺点就是盲动主义相当浓厚，农民所以有报复主义现象，原因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所受的摧残太厉害了。于是在一个翻转来的暴动之下，盲动主义整个燎火般的发展起来。同时，这也是整个党在政策方面的影响，广大的群众运动起来了，可是没有很好地组织起他们来，武装起来。甚至因为盲动，把好多同情分子也都搞翻了，更因为没有认识清楚群众的力量，完全抱定精兵主义，不能放开手干，组织

新的力量。

但在好的方面，这次暴动是有组织的，有党的领导，也有群众的基础，军队的配合也好。正赶上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各方面都顾及不到，各种政策已经有在广州暴动时宣布的政策为基础，然后有它的行动组织，更因为在暴动前敌人在那一块残暴，是最厉害的。同时在大革命时，北伐军曾经从这儿经过，因而留下了组织、宣传种种运动的影响，在我们暴动中间组织了苏维埃，只有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代表在那里。但是这一暴动影响了全国各处暴动的兴奋，几个月中间，各处起来，有广大的运动。有红军的区域，有湘西、鄂豫皖……这次行动的确是大大革命失败之后给全国的一个大的兴奋。

开始以我们一个团为基础，发展成为七个团，都有战斗力，有的有几百条枪，有的千把人有枪。可是农民乡土观念重，耒阳、郴州、永兴的都送回去了，结果只剩下两个团。其余少年先锋队，十六七岁的一营，都怕麻烦，送回去了。

这个暴动结果是获得大批干部，继续了大革命的传统。

军队到井冈山以后，又派了几团人回去发展。当我们在湘南时，交通还是很便利，各乡村苏维埃送信一天可以走几百里，整个苏维埃区域，全部有五百里的路途——包括了安仁、攸县、耒阳、郴州、宜章、永兴、资兴、桂东、汝城为中心，沿着大路。那会儿马路还没完全修成。我们苏维埃组织是相当久，县城里有钱的跑掉了，杀的杀掉了。总之，策略上是有些过“左”的。水口山上曾经发生了煤工暴动，大余县的钨工也发生了暴动，这些工人很多都参加了红军，我们把水口山的工人同志组成了一个特务营……

第六章

星火燎原



井冈山的斗争^①

井冈山基础的建立是一九二七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暴动的部队去开始了的——那时我们正在湘南起事，我们是有过联系的。在湘南敌人没有大举“围剿”之前，我们计划打通安仁、茶陵，以便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结果，敌人来了“围剿”。那是几省进行的，有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川的，军队多得很。五月就开始进行战斗。不久我们退到酃县^②，把茶陵打开了。茶陵有着几百民团。当我们从安仁打下来，很快地给他们来了一个袭击。他们在离城五里地的地方，没有步哨，正趁他们的哨兵在打牌，我们一捕捉到了，就开始急袭进城去，城里还一点不知道，队伍还规规矩矩的。见我们来，还敬礼。就进去一下把他们的枪缴了。

然后队伍又退到酃县，同毛泽东同志会合了，他们正由南面桂东、汝城退下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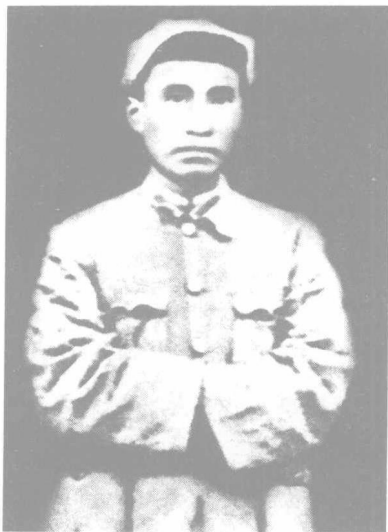
从在大余时，就派人同他们通声气，后来，由我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同志，把南昌暴动及东江战争经过报告。湘南暴动时，就找到了我，在一起了。

五月到了井冈山，编成“第四军”，我被举为军长，毛当政治委员——下面分成三个师，我兼带第十师，毛带第十一师，陈毅带第十二师。

敌人很快地分几路，打到酃县的边上来。我们一撤，把军属、工作人员安排在井冈山上，宁冈在山脚下，有敌人占据着。

① 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② 旧县名，今改名为火陵县，在湖南省东南部。



井冈山时期的朱德

山在酃县、宁冈中间为罗霄山脉，山上有村子，分大小五井。很多繁密的树林，掺杂着竹林，也有小松树，那真是山高水又深……据说山顶上有五石凹，为五井，可是没法到的。一下山，就有六十里路，再往南方走出村口，还有六十里路，就是一二〇里，山的周围就有五百多里，山路是很陡很险的。兵营和修械厂、医院都摆在山上。队伍来到山脚下，离宁冈只有几里路。城里驻有朱培德一团人。宁冈的四面都是山，中间是一块小小的盆地，只有两万人口，出产着很多果子，种一年可以供给两年吃的米粮，因为运出去困难，得一两天路，米一块钱买六七十斤。南瓜长得很好，一颗有四五十斤重……敌人向山上包围了。不过群众条件差，没有东西吃，到处都如此。这时，我们一缩缩到树林子里去。山上有笋，人口很稀少，五个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都是用树皮盖房屋。山上种地是不大好的，却有大量的果子，所以没有人种粮食，都是从山下面往上搬。山上水好得很，猴子非常之多，榛子树很多。这时我调动部队从山的北面爬到南面，把敌人先到山脚下的一营打垮了，就前进歇息下来。不久，敌人来反攻了，我们一下又打他们，他们拼命地往泰和逃去，我们却斜着一插插到永新。宁冈敌人恐怕我们占永新断了归路，也由宁冈撤下来。我们去早一个钟头，便占据了永新城。那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很困难，有一万多人，这时我们补充了一些。没有衣服穿的，同时也解决了粮食问题。这几个仗打得都很好，都是脚跟脚地打，二百多里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敌人。

主力马上折回宁冈，去打酃县。敌人在山口放炮，没有靠过来。我们因为不知道消息，就转往北面打宁冈、莲花中间的一个高陇镇，那个镇上有着谭延闿的家，是很富足的……占了高陇，这时，永新那面敌人又来袭击了，是五个团，由外刚刚调来的。我们驻守永新的一个

团便退出来，缩拢到宁冈附近，敌人主要的目标也就是打宁冈。这时我带着队伍刚在高陇打完，都很疲乏。毛泽东同志在宁冈军部政治部，司令部也还在那里。现在来信报告这样的消息，马上决定由高陇去打永新，只带了四个营……到距离永新一百里地方，我们准备一清早走，一天赶到永新。谁知那路又长又满是石头子，非常难走，整整的一天，才走到距离永新廿五里的地方，天已将黑了。

在那地方有一些驻守的团防被赶跑了，他们到城里去报告说：

“那儿来了些土匪！”

但是敌司令并没有理睬这回事。实际上，当时我们也不能再走了。就下命令睡觉，杀了猪吃饭，吃得很舒服，睡也睡得好。睡到第二天九十点钟才起床，准备休息好了去硬打永新。吃了饭已经是晌午了。

永新河不怎样大，但是有些地方也不易渡过。这时敌人在河西推进的有三个团，河东只有一团。那三个团已到了距离宁冈山脚几十里路的地方去了。恰好我们出发三里地，就遭遇上这河东的一个团。一接触就打，很迅速地把他个团长打死了，那一团就如此垮下去了。

在永新城里留守的敌人，有一个团。司令正坐在屋里“唱洋戏”。第一次报告来了说：“接触了。”他很简单地说：“打吧！”

隔了一个钟头又来报告说：

“被打垮了！”

司令还很镇静地说：“往上添兵。”

又一个钟头过去，报告说：“敌人已到城边了！”这时他才慌起来了。那留声机也不唱了。紧张地跑出来，刚一出门，迎面一排枪打过来。他被打倒了。他带在身边的一只洋狗被打死了。这个司令被打伤了手。他就一抽身又逃回去，后来跳城墙出去，逃向吉安去了。

在永新他却丢了几十挑“花边”，很多子弹。正因为有这些东西，我们的士兵只顾去抢，他才得以逃走了。在城里，敌人的一团还有骑兵炮兵都慌乱起来，马跑的跑枪炮丢的丢。天正是黄昏的时候，都乱糟糟向吉安方向溃败了。我们把兵撤出来，把东西搬出来，因为怕敌人返回来袭击。后来知道河西去打宁冈的三个团，也缩着退向吉安去了。我们知道他们得整理，就又进去占了永新。同时转移兵力去打鄱

县。在那一带的湖南军队是比较狡猾的，他们保存实力，不怎么同我们打，我们也就没怎样赶。另外有些江西队伍比较傻，欺负我们没力量，结果却上了当，被赶跑了。

不久，在端午节时，第二次“围剿”又来了。那五个团回去了，又换了一个司令。一个师长又率五个团到宁冈附近来了。就在宁冈后面东北的山上七溪岭打起来了。那山是又高又险要，修有相当工事，敌人偏偏由这一路来进攻。我们一部分在正面守着七溪岭——在敌人左翼打出去。这时，我们正是居高临下，把敌人后面一打就打垮了。然后一个迂回就到了七溪岭敌人的后面，也把他威胁垮了。五个团一下从半山上垮下来了。这一次如果天若不黑，可以缴到更多的枪，天一黑垮下去却乱了。我们又一气追到永新，占领了永新。这一回是打得顶好的。边界上的群众有那样的民谣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羊”就是指两次“进剿”的指挥者，一个杨如轩，一个杨池生。他们在护国军时，本在我那一团下当连长。在四川时期，我当旅长，他俩当团长。

这一时期存在的盲动主义没有完全解除掉……湖南省委这时来了叫我们吃亏的命令，叫我们去打湖南的郴州。如果去打郴州，先必须打下酃县。他们只听说我们打了多少胜仗，可是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打的，也不知道红军究竟有多少人，多大力量。结果在七月间，我就带了两个团去打酃县，结果只缴获了很多衣服、西药。

几个月中间，人都没得休息，总是打来打去……

五月间曾经把三个团送回湘南，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十二师就是这样垮了的……当时，主要干部的地方观念很重，一方面吵着要回去，一方面也准备要回去。那时克服农民意识成为很重要的一件事。等到打开酃县，队伍都要回湘南去，上下都一致这样主张，多糟糕！

八月很远地去袭击郴州，那样远，又那样热，真是好冒险。由酃县到郴州三百里地，走了一个星期。在郴州的是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上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

当时上面是盲动，下面农民意识那样浓厚，也是没法克服的。这时具体环境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敌人有些队伍调到北方，去进行军阀战争了。我们给范石生部队一个袭击。在军事上说，这一次是胜利了。白天他们约一团人正在出操，结果一打就垮了。赶进城去，在里面有很多西药、子弹、地图、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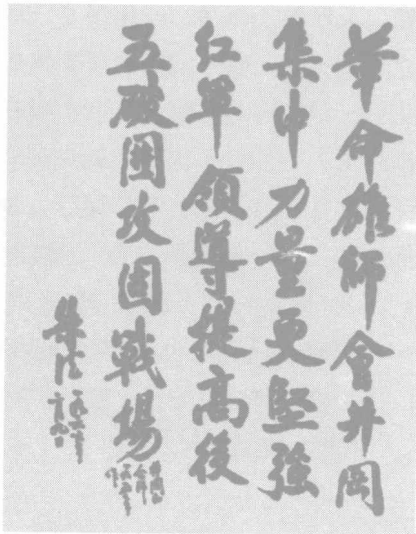
他们跑了。但我们原来就有同志在那部队里面，知道一定会“反攻”，东西一收齐，就准备退。十一点进城，到晚上八九点钟，敌人果然分两路来会攻了。我们就撤退出来了。这一次是个大胜利，枪也缴了。不过还不能说不是冒险办法，袭击是袭击进去了，但也没有什么结果。

黑夜走出来，一个团想去打宜章。结果有两营去了，只是干部回来了。这样只剩下四个营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队伍本来很好，就是农民意识重，说“想回家乡去，回到家乡附近去打仗”。

一撤出来，队伍相当疲劳，取道资兴、桂东，到汝城去打游击。这时却出了个乱子，就是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当时他带了四个连和迫击炮连任前卫，他却带着逃跑了。就派人去追。下面连知道跟着他跑不对，就自动带回来，他只带了一个连跑。我们的追击部队还是拼命地追到江西崇义，追到了，围上也没打枪，那一连回来了。只剩三四个叛徒狡猾地跑掉了。

在比较困难的环境中间，这种事是容易发生的。不过队伍经过了很久的训练，是一个人带不跑的。不过这次去追的一个很好的团长王尔琢同志牺牲了，在黑夜中叛徒急逃时受反击而死了，他是南昌暴动及湘南暴动最有力者之一。编了编，还有四五个营，很强的队伍。

在井冈山敌人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了。不久，毛泽东同志带了一



朱德手迹《井冈山会师》

个营下山来赶到桂东，与我们会合了。在湘南，敌人又来打一次，我们有些损失。就退到江西，回占了遂川，在那里消灭了熊式辉部刘士毅旅的五个营。这样一来又算打出几路来了。人员、子弹、给养都得到补充了。我们捉到一个营长，又被他跑掉了。这样打了遂川，一搞起来，就在万安一带驻了一个时候，发动群众运动。

不久，江西军队又来了。我们在九月间又回到井冈山上。由西南一下反到东北，又来打宁冈。那时蒋介石由上海调来了周浑元旅来打我们。在井冈山角的茅坪下，正当八月十五中秋节，好大月亮。我们从井冈山翻过下山来，天还没有亮，就打下来了。一下六个连完全缴了械，连指挥员也捉到了，这又是一次大胜利。兵也有得补充了，官也放的放了留的留了。那个指挥员团副是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我们那时在井冈山上已办有红军学校，就强迫他，利用俘虏当教官，不过他后来终于得到一个机会跑掉了。

那一夜进到宁冈，次日把六连人赶跑，跟着脚就去打永新。不过没有打下来。第二天又转去打莲花，却一下打开了。

九月十月敌人不来攻打，专门围上不动，说是“久困穷追”，这是王均^①干出来的新政策。

我们在这些地方打来打去，发动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建立了政权，工作做了很多。一年多了，敌人想包围是困难，我们就在这儿创立了根据地。原来就布置了罗霄山脉的政权，到处组织了苏维埃少先队……敌人占领了城市，我们就在乡下搞，占有六县。各方面敌人封锁起来，我们打不出去，就训练队伍，积极整顿。在七八月间，彭德怀同志在平江暴动。我们尽管发展地方工作，不大打仗。战士的生活都变得很苦，都是单衣，天天吃的南瓜，都叫着这样的口号：

“打倒军阀，天天吃的红米南瓜，敌人来进攻，努力消灭他！”

这时士兵运动也有相当的收获。反动派军心相当动摇了，朱培德的一个营，湖南军的一个营，都叛变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收集起来，

^① 王均，时任国民党江西省警备司令。

增加了一些力量。在山上办教导队训练干部，一直搞到阳历年。这一年战争真是顶多了。以后想法子打了些小仗。到冬天十一月初，彭德怀同志也率所部由平江浏阳游击到宁冈附近，与我们会合到井冈山上。他除了留在平江浏阳一带以外还带有七八百人。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冲破“会剿”了。同时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案也传达到了。于是开了各种的讨论会，准备下山……

在罗霄山这一时期战争中，我们在群众中都是最艰苦地熬过来的。本来势力不大，“会剿”的也多，可是慢慢的军队也有力量了，政治也坚定了。我们曾经在井冈山顶存了很多粮食，寨子也修得蛮漂亮、很好。但是不能久守了。不过彭德怀同志他们打游击太辛苦了，想休息。我们就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下山，突破敌人半年所筑成的封锁线……

进军赣南、闽西^①

我们有计划地准备，做了“下山”的广大的动员工作。大家也都喜欢下山。就从罗霄山脉南岭支脉的左侧偏江西一面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路，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西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在这些地方都是来来去去很多次了，各方面都有了相当的组织，一打到大余便去占领了。

这时从广东、江西各方面调来八个师的兵力，向我们几方面截，几方面堵。原下山时只有四千多人，我们沿途却扩充了些，队伍已壮大。到了大余一带，就又舒服起来，生活也改善了，打了土豪……本来准备在那儿休息一天就走，谁知一停顿下来两三天……在一月二十八日，赣军三个团、广东几个团来围攻了。这时我们不该打，应急行撤走，结果又打了，又并没有集中力量打。死伤了二三百人，退下来更是比较困难，临时退出。幸亏队伍的团结性还强，便分成两路，一部分走梅岭关，一部分顺着梅岭山脉走山左边到乌迳集合。

在乌迳遇了很大的危险。我走江西一面赶到这里来会合。那是一处有广大树林的田坝子。一路上遭受着敌人的截堵，处处打仗，没有一点地方不是。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正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

① 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起出发，连号都没吹，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敌人来时平坝子已是空荡荡的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

从那里到一处，是广东、江西交界处，走拢去将将天亮。我们又到了信丰河岸上，河很宽，不知道能不能渡过去。这时一面派人到前面看河，因为已入山地；一面以强大部队放在后面。敌人追来，在一个山口上，一仗把他打垮了，就涉水过河，从此出了危险境界。

人都十分疲倦了。有一个第十师二十八团的政治委员何挺颖同志在大余作战负伤，抬下来到这儿就死掉了，那是很可惜的了。

我们集合跟着山走，山路很小，沿途土豪组织的团防也给了很多为难。不过还好，在路上个别的碰上了几个同志，替我们引路。敌人在这时不敢一定靠近，同时也不知道我们究竟在哪一块山里走。我们就跟着南岭山脉一下转到江西，一下转到广东，一下转到福建。那边一来，便又转到这边来，后来在江西的寻乌又打了一仗。

那一天，本来我们走得很早，谁知路上却迟了点把钟，到那里被敌人发现了。当时已经有一部分通过了，敌人追来一打，受了些危险。掩护部队非常之少，只好临时集合起来，掩护着走。敌人很快地迫近来，陈毅同志几乎被捉到。敌人一拼命抢毯子、抢东西，他才逃掉了。我便带了一个警卫班打后卫，一下十几里，一班打得只剩下三个人了，还掩护了十几里路。这时队伍在前面集合起来了，敌人顺着大路猛追了去。我们三个人一插，从一条侧路走去，跑到山里一个有组织的农村，那里很好，农民们又引路到前面去。我和毛泽东同志都和部队走散了。队伍都非常着急。我们到了，大家才放心集合到山上去休息。只休息了一天，整理了一下。

在这一次，和我同居不过几个月的伍若兰同志，让敌人捉去杀了头牺牲了。她是湖南人，一个师范学生。她在耒阳暴动中当妇女部长，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党的观念、政治、文化方面都很强……

到了罗浮山休息。在罗浮场有几所很好的房子，在困难中间得到这样舒服的休息一天，是很难得的。第二天又出发，想回头向会昌去。路上捉到几个敌人的侦探，一审讯知道敌人正在该处齐集，我们就向

福建武平一挥，后面追赶的敌人以为我们过福建去了，他们也犹豫了，因为他们跑得也很疲乏，谁知我们拐了一个弯，一下又折回头插到了江西瑞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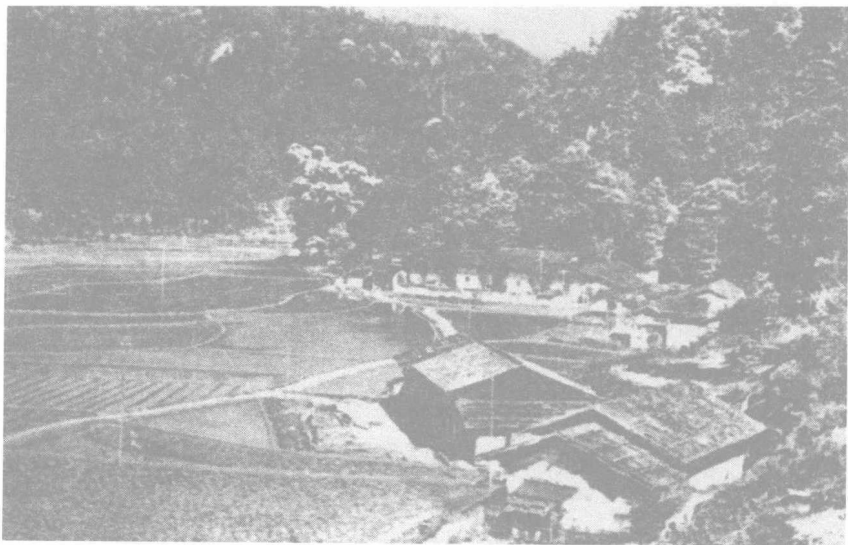
我们准备打开瑞金，想找点报纸看了，好分析时事问题。我派了一部去打瑞金城，另一部在山上预备。没有两点钟就打开城，报纸也搞到了。等敌人援军来，我们就退走了。下午，又打了一仗，一退到了大柏地。决心在这儿打击敌人，可是等了一天，敌人并没来。将将折回大柏地休息，他们又来了。正是过旧历年的晚上，老百姓都在过年，我们却没有钱用。这一夜没有到拂晓，便拼命地一打，就打开了。敌人有两个团的兵力，追了好久，不过一点钟光景，就把敌人包围在里面，枪也都缴到了。敌人一共有个旅，其余的人也打垮了。谁知缴到的净是一些烂棒棒枪。这些赣军遭受了打击，到处乱窜。另外在后面本有朱培德的五个团，一起来追。可是因为那里头有我们的同志，便鼓动不肯追了，士兵都吵着要饷要过年，就停止驻在瑞金了。

这边一个旅被打垮了，增援的也没来。我们就再走，下起大雨，路又滑，大家又得抬着伤兵……

到宁都，绅士、群众知道我们打了大胜仗，都开城来欢迎。我们进去休息一天，也是很规矩。商会在屋顶上高插着一面红旗欢迎，并且送了我们五千块钱。我们住了阔气的房子，有铜床、穿衣镜，西式房子。我在这里却生了病，发热热得不得了。第二天知道敌人又来追击，顶多隔着一天路程，便又开拔走。再看看敌人前头到离城四五里处，我们的后卫就动身了。总之我们要让他们追赶不上，要同他们隔离一天路程。这时，我们是想往有组织有游击队的地方走。从宁都到黄陂、小布、东固，一路都有党的支部，都没打什么仗。

敌人一开到宁都，士兵又不肯往前走，纠缠了有一个星期之久。这时从农民运动中，把一些地方红军又好好搞起来了。这些底子，还是南昌暴动时留下在那儿活动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势力又大了些。那里本有地方一个团，再加上我们两个团。追击的敌兵疲惫了，同时也知道我们会合，力量增强，不敢来打了。另外由南昌拨调队伍来打。

休息一个星期，等敌人靠拢，我们还是不打。这时部队除了伤亡



红四军向赣南进军时的集结出发地茆州村

有四千零几十个人。由江西一插到福建，又一个倒转折回横田，将将插到瑞金，只距离敌人三里路，我们趁夜晚十二点出发，瑞金驻有敌人不多。我们走到前面，不能前进了，因恐被敌人发现，乃由山上边插过去，路上碰到驻守的两连敌兵，解决之后，又插到福建去了。

这天晚上，到了一个地方，将将睡好——那是很黑的一晚，一个侦探很确实地来告诉说：“敌人来了！”我们却都不相信，把他说了一顿。谁知敌人在外面就打响了。他们是由汀州打了来的。这时，我们就下决心打。就趁晚上赶紧布置好，早些爬起来，就打起来了。一打打过去了。开头一枪打死敌人一个团长，没几枪敌人就乱着溃退下去啦！再向前一逼，把这个团整个的搞垮了。天亮了就走，追去了四五十里路，再休息就没有事了。我们决定去打汀州。那一天，出发很早，敌人迎头来打我们的也向我们走。还好，我们早一步先到山顶上。敌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在河沟里，一打打垮了，追到河边上。在那些死尸中间，打死了一个大胖子，这边看到他倒下去。那时，我们是不准士兵搜腰包的，有的士兵搜了，怕被人发现，就把他打死了。他身上戴着表，很阔气。后来知道是师长郭凤鸣……我们立刻脚跟脚地又追，就去打了汀州。这里是郭的老巢。



康克清穿着红军装的照片

在那里只有他的留守部队，他们也还不知道前面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我们一到，很容易地打下汀州，把兵工厂、被服厂、子弹等都搞来了。同时还收编了他的队伍。汀州城是很大的。我们也找到报纸，拿来一看，才知道原来在瑞金尾追我们的部队调到武汉去打仗了，才晓得这个郭凤鸣只是一个替死鬼。

我们一下把郭势力所据的几个州县都搞来了。在这次打汀州时，我同康克清同志开始了同居生活。

这以前敌人攻击我们的，广东有两个师，朱培德一个师，还有福建两个师……在这一段里有三个月，从阳

历年出发到大柏地过旧历年。那是顶紧张顶有趣的一段，到处都是小山，小仗天天有的打，团防常常向我们打两枪，那都是常事。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打破了朱培德所指挥的“久困穷追”的计划。

第一次反“围剿”^①

当阎冯的反蒋战争在一九三〇年十月间告了结束的时候，南京政府集中精力，做剿灭红军的特殊准备。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末，南京政府的第一次“围剿”开始了，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完全粉碎了这次“围剿”。为了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军队如谭道源师、王金钰部、十九路军等。那时红军虽然没有无线电设备，但我们的情报工作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估计白军的阵线非常正确。国民党人实在是很愚笨的，他们竟把自己的军队调动和军事计划登在报纸上，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此项报纸。我们那时的根据地是在东固。

我们当时的战略是诱敌深入，使其中伏。我们诱敌前进，突然包围他们，消灭他们。我们就这样把国民党军队诱入许多村庄，同时我们运用自己自由的时间在后方训练新兵。这是好机会，因为那时的红军实际上都是新兵。那时的敌军非常蠢笨，毫无应付游击战的经验。每个国民



反“围剿”时期的朱德

① 这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应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请求，给她的一份简单的关于红军发展的报告的一部分。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续西行漫记》。

党军的司令官都想获得蒋介石的欢心，他们贪心地深入苏区追踪红军。谭道源和张辉瓒就这样的追踪红军几乎追到我们在东固的根据地。我们于是突然攻击他们。红军很容易地消灭了这些军队，因为他们侵入了苏区的心脏，他们盲目地向前推进的时候，我们关于他们的情报又很确实。他们被高山所包围，我们很容易切断他们的后路。我们集中自己所有兵力攻击张部，我们以五万人攻击张部一万人，当然击败他们。这第一次“围剿”总指挥张辉瓒被杀，我们获得来福枪九千杆，无线电器具两套，张师士兵全部被俘。我们在这些俘虏中间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后来全部释放。我们同时又攻击谭部。谭不知道张部的遭遇。他只知道无线电交通被破坏了。他料到事情不妙，准备退却，但我们从他们后面赶了上去，实际上消灭了他的部队。谭“送”给我们四千支来福枪。敌军吃了这两次大败仗后，残部仓皇逃退。所以在第一次“围剿”中，我们完全获得胜利。我们又继续实践扩展苏区的纲领。

【附】

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①

朱将军再次来我这里叙述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建议他在一九三一年里挑选最典型的一天，跟我说一下他从早到晚都做些什么事。

思索了一阵之后，他说，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没有办法记起某一天的全部事情，不过不妨试一试。以下就是他所讲的：

“我一生有很早就起身的习惯。我要把工作都做完以后才睡觉，时间很晚——通常在十二点钟以后。我这一生是从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可是我的工作和学习却从来没有规律，因为我们的战斗决定了许多事直接听命于司令部。

“我时常——但不定期——给部队上军事课，也时常视察驻扎在附近的部队，看看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我按时参加定期的参谋会议，党的会议一星期有一两次，司令部也有党组会议。部队各部门首长之间经常有会，遇有特殊问题出现，也要开会解决。每次战斗之前，都要召开一两次战斗部队的动员会议，由军事指挥员报告我们的计划和敌情，政治委员讲解这次战斗或战役的意义，以及在战争中瓦解或争取敌人的政治战术。

“每一仗打完了，只要有时间——但通常都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总要开两个会：第一个是指挥员会议，第二个是指挥员和战士的联席会议，以便分析这次战斗或战役。我争取参加每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对于我们部队具有最大的技术和教育价值。在联席会议上，每一名战士和每一名指挥员都有充分发言的自由，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

①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部战斗计划和执行计划的得失。这样，我们就能够改正错误，发现能力不足的指挥员，提升有功的战士。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就消灭了封建遗风，保持了军队民主化，并且在战士之间发扬了自觉的纪律。任何人如果有畏缩不前或判断错误，或是在战斗中破坏命令，都必须说明原因，保证改正错误；任何指挥员如果打骂战士，或是违反军事规则，就必须在这公众舆论的法庭面前解答。罪名一经确立，就由司令部处分。这一类会议的结果都印成小册子，作为全军的学习资料。”

其他的工作也很多，他接着说道，每逢春耕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凡是没有军事任务的人，都要帮助农民。朱将军遇有机会就在地里干活儿，“觉得这是维持健康的好办法”。在那几年里，红军的文娱活动相当少，然而也有几个演剧队在苏区为部队和老百姓巡回演出，只要演戏的地方离着司令部不远，朱将军就会坐在地上或者前排的小凳上看戏。部队也唱歌，他说，可是还没有提高到像在延安时这样。

“每天也有许多情报和其他的报告需要研究、处理，”他接着说，“我只要拿得到报纸和书籍，一定不会放过，可是那些年找书籍杂志看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时从上海寄来几包书，然而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等我去拿，早就分光了。那时候，我决心增加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凡是我们能找得到的这类书，我都反复地研究。在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里，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朱将军继续说道，“我们的部队在广大地区里分散开来。彭德怀在北线指挥，我们刚在那里占领了两个县。彭德怀攻下了南丰城，这个地方一向由‘农民刽子手’许克祥占领，他在牵制我们，以便蒋介石准备第二次‘围剿’攻势。

“正因为敌军准备进攻，我们扩大了防区，在各战略据点建立军需站，训练部队。敌人的飞机这时经常来轰炸，A B^❶团到处加强活动。为了应付A B团的活动，我们有时彻夜开会。

“因为轰炸和我们的粮食问题，司令部在四个月内搬了四五次家。

❶ 当时把在革命根据地内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人或组织称为A B团。

粮食是个严重问题，那时候正是春播季节，我们的地方太小，资源也有限，我们必须节约粮食，才好应付敌军下一次攻势。我们的部队没收了地主的大米，但数量也有限，我们不但帮助农民耕种，还开垦荒地，不过这些地实在太贫瘠了。

“我们部队的每一个师都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管理军需，维持风纪，负责教育和娱乐活动。一九三一年整个春天，这些委员会领导着节约粮食运动。他们把大家的口粮减少，改吃两顿，十点钟一顿，四点钟一顿。吃得很差，一天到晚都觉得饿。只有伤病员才能吃饱。

“我们还在苏区内建立空袭警报制度。由矿工们组成的工兵则为部队和老百姓修筑起十分有效的空袭避弹所。这些矿工都是技艺高超的工人，样样精通，连炸药都会制造。他们有许多人当初在矿里工作，炸药用得多，连耳朵都聋了。就在参军之前，他们的政治水平已经很高，因为大部分是老党员，曾经组织过工人运动，从工人运动刚萌芽时就做工人领袖。我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以便总结新的防卫方法。

“我每天还要忙其他的工作。既然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力量，我们就要和所有的群众活动紧密相连。我们帮助重建老苏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没收地主的粮食和土地，协助分配，并建立群众组织和苏维埃，领导耕种，以增加生产。

“……党的决议指示我们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教育，在军队、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之间要有清楚的分工。还要求我们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四周年纪念日在赣南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我们根据决议召开了所有苏区的党代表会议，并且把司令部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山一个小村子向塘村，村里有一个大祠堂，可以安置司令部和会议代表。

“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除去其他问题之外，我们成立了几个委员会，筹备八月一日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然而敌军攻势不久又开始了，大会只好延期，先延到十一月七日，后来又延到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公社纪念日。

“在向塘会议上，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有时也担任主席。会后，我们的工作顺利了许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从此与军队分开。苏维埃

里的私人关系——不少地方有这种现象——也都取消了。这种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成了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处理财政、土地、交通、民兵、保健、教育、生产和妇幼等问题。苏维埃的组织呈金字塔形，从村到区，由区到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后，最高机构就是设在瑞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我们还在部队里订出了正规化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和政治科目，加强扫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从外边进来帮助我们，可是还不够分配，我们军医队伍也太薄弱。上海印刷工人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穿过敌人防线来参加我们。

“自从由国民党第十八师手里缴获了无线电报机，我们就办起电讯训练班，我也兼管。敌军电台台长王铮参加到我们这边，立刻就组织了电讯训练班。王铮到延安还负责我们的电讯工作。

“参加我们之后，王铮开始截抄敌军电报，我们从电报里知道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有一套新式无线电报机。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恨不得把它弄到手，我也跟他们说，一定可以到手。从截抄的电报里，我们也知道了敌军军需站的位置，他们为了准备第二次‘围剿’，修建了防御工事，军需站就在工事后面。我们对于这些工事了若指掌，因为那都是强拉农民修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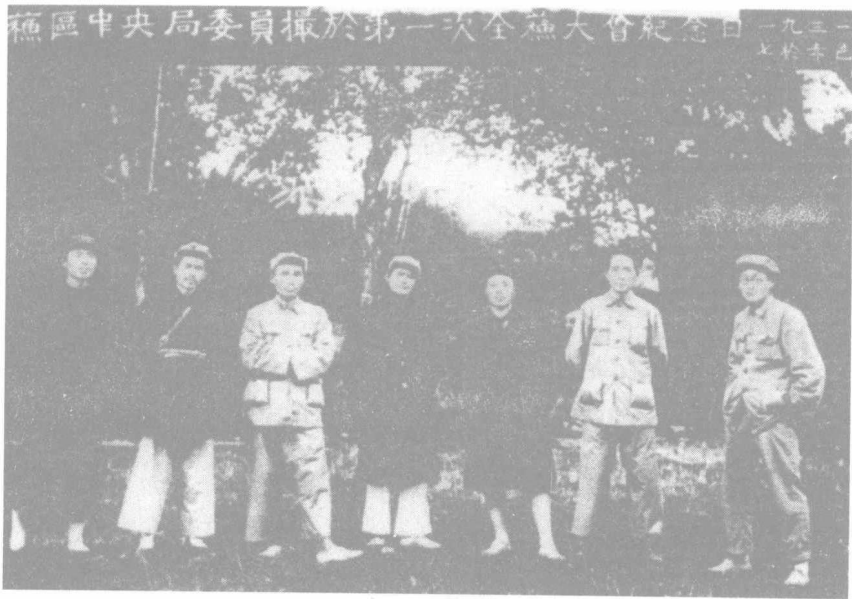
“到了四月，我们的粮食和军火情况非常严重。为了避免动用为第二次战役准备下的粮食，我们向农民借粮，说明日期，到时必还，农民问我，我们怎么能够订出日期来；我也反问道，有没有过答应还而还不出来的事。他们说没有过，我们都大笑起来。”朱将军骄傲地加上一句：“农民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到朱将军讲完的时候，午夜已经过了。他伸腰打个哈欠，洁白整齐的门牙在烛光下一闪，然后幽默地说道：

“这就是我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典型的一天！”

第二次反“围剿”^❶

第一次“围剿”的惨败使蒋介石吃了一惊，他于是改变他的战略。何应钦向他贡献意见，蒋接受了何氏的意见，并委任他为第二次“围剿”总指挥。何氏的新战术是稳打稳扎。从一月到五月，国民党集中精力准备新的“围剿”。我们也从事准备与训练，以应付第二次战役。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白军阵线从江西吉



朱德（左三）与苏区中央局的成员合影

❶ 这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应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请求，给她的一份简单的关于红军发展的报告的一部分，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续西行漫记》。

安直到福建建宁，长八百里。在此次战役中，白军动员了二百团军队，约二十万人。

然而我们从第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处。同时我们也有无线电交通的帮助。红军派队伍到白军后方攻击。在十五天内，我们扫过八百里战线，粉碎了白军的防线，夺获来福枪三万支。我们毁灭了王金钰和朱绍良的部队，第二次战役又是红军获胜。红军在这第二次战役中所运用的战术是现代突破敌人防线的最高明的战术。这次胜利大大提高了红军的自信，同时也激起苏区群众热烈的反应，大家都给红军大大的帮助。

【附】

横扫七百里^①

五月上旬，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下，进入阵地，部署攻势，这些阵地从江西吉安一直向东延伸到福建的建宁，共长七百里，约为二百五十英里。第二次“围剿”开始了。

朱将军坦然指出，红军对于敌军工事的情况已经了若指掌，因为被迫修建工事的农民不但说明了位置，甚至连工事有多深，每个堡垒有多少枪眼，一共用了多少砖瓦，都讲得清清楚楚，还在沙地上画出草图，指明通向工事的道路。

“我们决定运用第一次战役里运用过的战术，把敌人从工事里引出来，诱入苏区，我们的部队和老百姓就把他们攥在手掌里，然后两翼包抄，攻击敌后，解决他们。我们决定首先打垮东固和吉安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和另外两个师。我们急需敌军工事后面的粮站和军火库——我们的电讯训练班对于第二十八师的新式无线电台也心向往之。”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对红军和民兵辅助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之后，朱德和毛泽东把司令部搬到东固山区根据地，根据地里有医疗队建立起来的两个后方医院。群众满怀胜利信心，成千上万的人到各地集中，带着各式各样的担架准备抬运红军伤员，还带着扁担、箩筐准备挑运缴获的敌军物资。

朱将军不但不讳言农民头脑里的旧的封建思想，还特别提出这些思想来跟他们讨论。他说，农民拒绝接受把敌军伤兵送往红军医院的命令，不愿像对待自己的伤员一样来对待他们。为了解释这项命令，专

①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

门召开了群众大会，然而朱德发现，只谈近代战争规则是无济于事的。农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用人道主义来对待敌军，尤其是敌军的伤兵。归根结底，敌军是来“清剿”老百姓的。有一条道理他们还能听得入耳，觉得这些人可以争取过来参加革命事业，话虽如此，他们依然不是心甘情愿地去做，有些人还满腹怨言。

敌军攻势预定开始的三天以前——朱德知道敌方所订的日期，红军主力部队强行军至吉安地区，插到敌军的后方。因为敌机轰炸，他们只在夜间行军，在月色下作战。而夜晚如果昏暗，便改为拂晓进攻。

战斗预期在十七日夜晚开始，可是朱德和毛泽东没听到一声枪响。两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接到战斗报告，听不见枪炮声。黄公略的红军第三军奉令把守东固至吉安一线，彭德怀和林彪的部队则进攻敌后，然而黄公略这方面没有消息，对面山谷里也没有任何回声。

寂静得有些蹊跷，朱德便偕同参谋长带着两连卫队，下山西进，看个究竟。他刚刚来到山脚，正在两峰夹峙的山谷里，突然迎面来了第二十八师的前卫部队，正准备向山上行进。

“我们只有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分散开，边打边退，”朱将军说道，“可是我也看得出来，敌人摸不清我们有多大兵力，动作极为小心。打了三个钟头，我们已经靠近东固平原，等毛泽东准备好司令部、医院和老百姓撤退时，我发现敌军开始后撤。远处传来了炮声——我们红军第三军进攻第二十八师的后背了。到夜幕四垂的时候，第二十八师大部被解除武装，师长公秉藩也在被俘之列。他在第一次战役中学了乖：穿上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不带任何军章符号。混杂在士兵队伍里。我们发给每名俘虏三块现洋，让他们回家，公秉藩也排在队伍里领了三块钱——他在一生中只有这次拿钱最少。他骗过我们，可是我们缴获了他的枪炮物资，我们电讯训练班的学员围着新式无线电台和发电机高歌不止，这两样东西都完好无缺。”

……彭德怀的红军第三军团一连两天两夜强攻敌军第四十三师——北方军队的正面和后卫，占领了他们的山头工事，把他们赶进山谷，一半缴了械，另一半则投奔他们在遂安的兄弟部队第四十七师去了。

整个西线处于红军掌握之中，但是朱德在回忆这两次战斗时，还

颇表遗憾，因为他们“仅仅”缴获了七千支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另有医药品、大批粮食、弹药和现款。他说，这一仗成绩欠佳，是因为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三师也不过仅有上次战役中被打垮的第十八师的一半兵力。

留下民兵和几连红军固守解放区，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司令部和电讯训练班返回主力部队，又发动了红军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攻势。

几千名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带着箩筐、扁担，有如潮水般随军前进，攻打遂安镇，守军乃是第四十七师和残余的第四十三师。这些北方军队有一个团被缴了械，其余的便扔下仓廩充实的军需站不管，一路东奔。红军提起“白军运输大队”，个个笑逐颜开。

朱德检查了农民群众早已清理过的军需站。他说：“我不是早就说过订个日期保准还粮吗？”这时大家都笑了。

回想起农民做事的敏捷彻底，朱将军的声音都带有几分敬畏之情。他们一拥而至，把箩筐和牛车装满，节俭的妇女和儿童用手扒扒拢拢，把最后几颗粮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人、妇女和儿童排成整齐的队伍，走向苏区。青年人则组成几个大队，跟着红军东征，他们担着粮食和弹药，对于哗啦啦的春雨，和红军一样，毫不在乎。

朱将军提到这次战役，好像又身临其境了。

“我们的攻势连绵不断，部队打完了睡，睡完了打，一直干了十五天。战斗部队躺在地上就睡着了，其他的人爬起身来接着打，在敌后展开了扫荡战。遂安之役两天以后，我们在白沙解除了第四十七师残余部队和第四十三师的武装。那些高个子北方大汉频频摇头，抱怨说不能在山地、在雨里作战。他们被民兵解到我们的俘虏收容站，我们的伤员和敌人的伤兵则运送到后方医院。

“我一向不需要很多睡眠。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几乎记不起有睡觉的事。我们决定教训敌人一次，让他们毕生难忘。部队像洪水一样漫山遍野地前进，边打边唱、边呼口号，大家怀着愤怒的心情，争夺每一寸土地，所向披靡。大雨倾盆而下，敌机无法出动轰炸，我们把敌人赶到水田里，再把他们浑身泥浆的一个个拉出来。他们穿的是国民党军全套军服，裹腿、皮鞋或草鞋俱全；我们的部队只穿短裤短褂，

还打赤脚。我记得我有双草鞋穿，不过也记不太清了。是的，毛泽东和我跟战士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敌军人人背包沉重，装满了从我们村里打劫去的东西。

“在敌军侵扰过的苏区，我们发现村子被烧为灰烬，横尸遍野，有的枪决，有的砍头。连儿童、老汉都没放过。妇女四肢伸开地躺在地上，在被杀以前或被杀以后都遭到淫辱。自从看了这幅浩劫图以后，只有那些重伤的战士才能勉强被劝离战场，部队日夜不停地唱起一首坚定有力的歌曲：

‘哪怕枪林弹雨，
前进啊！杀啊！
活捉败将何应钦！’

“大路小径，到处可以看到农民运送我们的伤员和敌军的伤兵到后方去。有些担架是用门板改做的，前后系好绳索，还有许多人就把伤员背在背后。我们虽然一再命令，对待敌我伤员要一视同仁，农民却自有执行命令的办法，用以表示他们对白军的愤恨。走累了，他们就把白军伤兵放在地上，又骂又踢，甚至捡起树枝抽打，不断地骂道：

“‘白匪！杀人奸淫！地主走狗！’

“然后，他们又抬起伤兵上路，等走累了，又把他们放在地上，问道：‘我为什么要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说着又打。也有些人劝阻他们，我没有时间管，因为我们边打边进，不容稍停。

“在北线宁都地区，我们又遇到第二十六路军的好几师人，他们是北方军队，刚由蒋介石调到江西。蒋介石并不信任这批原属冯玉祥的部队。这些部队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全军一片不满现状的空气。我们刚一交手，三团人未发一枪便投降过来，其他的也就后撤了。我们让他们去，以便他们多想想。我们则继续前进。”

这次战役的最后一场战斗是五月二十九日在福建省的建宁进行的，建宁是敌军防御工事的终点。红军在这里与刘和鼎指挥下的国民党第六路军遭遇，刘和鼎这家伙多年来乃是福建省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之一，自从归顺国民党以后，自己做了国民党将领，一万名土匪也就改编成第六路军。

“就在我们开始进攻的一刹那，”朱将军痛恨地说，“刘和鼎逃出了建宁城里的司令部，他的部队也跟着跑。我们一直穿城穷追，直到闽江桥上。我们有一批部队已经过了江，早在对岸等候了。

“那座桥转眼间就挤满了匪军，又是马匹，又是行李，谁也不能动弹一步。西岸上的我军机关枪向人群中扫射了几梭子，他们立刻抛掉枪支，跳到江里，我们部队把他们一一打捞起来，凡是已经逃过桥的，对岸的我们部队也都将他们缴械。”

红军占领建宁之后，把战斗部队留在后面，倒转回头，沿着敌军所构筑的防御工事巡绕一圈，把全线工事悉数毁掉。在工事两旁，他们占领了许多新区，政治工作人员便着手“巩固”，并入苏区。

把敌军全部工事毁掉之后，红军急速向南，穿过苏区，直扑从广东开上来的第十九路军。这支军队同样精于撤退，一直撤到老家广东之后，才敢站住脚步。朱将军说，他们之所以后撤是因为两广将领和蒋介石又发生了新的矛盾。红军已经把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变成举世闻名的笑柄，外国人和中国统治阶级对蒋介石深表不满，两广将领便力图说服外国驻华的外交代表，表示蒋介石这一败仗如果由他们来打是可以取胜的，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支持。

朱德将军把第二次反“围剿”总结如下：

“这次战役一共打了二十个日夜。在这期间，我军纵横八、九百里，日夜作战，在大雨倾盆之下，头枕步枪躺在地上休息。我们一共打败了白军十三个师，至少打死一万人，活捉二万人。我们的战利品多得都难记清楚：包括二万支步枪和其他武器；现款、军毯、药品、被服、收发报机和发电机、望远镜、掷弹器、自动手枪、手榴弹和大批的米、面和弹药。俘虏里有许多军医，我们命令他们到医院去工作，后来有一些人入了党，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这里。但也有些人与反革命有关系，谋杀了我们的一些受伤的指挥员。我们枪毙了他们。”

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朱将军说，“给千万户农家带来了悲伤和痛苦”。除了农民被屠杀之外，红军也损失了四千人，赤卫团和其他民兵伤亡更重。可是死亡和悲痛压不下人民的革命热忱，在大捷以后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出现了很多动人的情景。

由于反革命的间谍活动，红军不再把白军俘虏一股脑儿收容过来，而是要逐一仔细甄别，才能接受入伍。

“我们对志愿参军的人说得很坦率，”朱将军说道，“不说别的，只说明在我们胜利以前还要经过艰难困苦和长时期的斗争。我们现在只能吸收那些愿意放弃家庭甚至牺牲生命的人，或是那些已经家破人亡除了革命别无希望的人。我们把这些入编入红军，其余的则再留两三个星期，给他们讲解中国革命历史，我们的党和军队的方针和政策。然后，我们发给旅费，准许他们前往愿意去的地方。

“敌军第二次‘围剿’证明，国民党军官曾鼓励他们的士兵为非作歹，命令他们强奸、焚烧、劫掠、屠杀，好让他们不敢向我们投降。这种办法也有一些成效。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让部队不受我们的宣传，让他们尽力作战，避免被俘。”

尽管使用了这些野蛮战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皇军在中国为着同一原因也采用了这种战术，国民党军队几乎每一个团或师总有些人派农民来给红军送信，或是设法留字给红军。这些报告和消息是谁写的，无从知晓，朱将军因此更为感动。有些报告写得歪七扭八，不成字样；可是也有一些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执笔，写得非常工整，文理通顺，字迹端正，把他们那部分白军的计划、位置和武器数量都写得清清楚楚。

“拿这些报告与我们的情报相比较，我们发现都是正确的，”朱将军特别指出，“每占领一处地方，我们常在桌子或门板上发现粉笔字，告诉我们敌军开往何处。”

朱将军又说道，红军的情报工作当时已经组织得很好，不但满布苏区，而且深入国民党区域。红军开设了特别训练班来训练情报人员，内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串村子的手艺人，他们的工作便于在国民党区域内广泛活动，可以到有钱人家或穷人家做工或卖东西，也可以混入敌军营盘内活动。

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的电码、公报、出版物，并且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再有一组人专搞历史工作——仔细研究敌方每一个军，把军官和士兵的背景都调查清楚：这个军是从

哪一省来的，军里有什么变化，过去的历史和组织，它的战斗力，等等。根据这些研究，朱将军解释道：“我们最后可以决定应付某一个军的最好办法。”

朱将军从他收集并保存多年的历史性文献里，拿出那个时期他的战地司令员提供给他报告让我看。许多材料的曲折变幻，就是擅于写小说的作家也无从想象。例如彭德怀将军的报告就是上乘之作，里面详细叙述了军事和社会情况，行文简练，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我看到他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第二次“围剿”开始时写的报告。一张黄色明信片，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在叙述了那天晚上开始的战斗后，彭德怀写道：

“敌军在此遗下大批米、面。群众深恨白匪，对我军作战帮助极大。伤员已转移到杨梅岭苏区。敌军士兵系北方人，尚未受到我们的影响，他们封建观念很深，不伤不投降。我军前进过远，战斗前已行军八十里。部队甚觉疲劳。”

在报告他的一师人占领敌军山头工事后，彭德怀写道：

“我方指战员伤亡达全师三分之一。有的部队干部伤亡过半。”

“朱总司令”，报告的开始总是这样写：“朱总司令”、“毛政委”，结尾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彭德怀”。

彭德怀和其他指挥员写的报告都扼要地叙述了包括敌我情况，双方伤亡，俘虏，战利品，转移伤员，当前问题等项，最后大都写道：“请指示。”

第三次反“围剿”^①

蒋对第二次“围剿”的惨败非常愤怒，亲自组织第三次“围剿”，从南昌指挥军队。蒋的计划又是迅速进攻，就于七月间开始了第三次“围剿”。红军在这里估计错了，以为蒋不能如此迅速进攻。然而在另一方面，蒋因激于愤怒，也打算错了，他的准备过于匆促。蒋氏分平行的四路进攻。我们立刻占领了四条平行线中间的隙地，不断地困扰他们，牵制他们。天气热得可怕，对方士兵们不惯于那样迅速的进军，都感觉到非常疲倦，因此我们的战术获得大大的成功。郝梦麟是第三路司令。他的部队力量最弱，所以我们首先击溃他，夺获许多来福枪和给养品。我们于是击溃毛炳文等师。蒋氏对此更加愤怒，于是改变原来的战略，把所有部队集中起来。我们到处搬开了所有食粮，把空空的村庄留给白军。因此国民党军的给养非常困难，特别因为他们的队伍集中在一起。我们于是把自己所有兵力集中在东固，让游击队到处扰乱白军，牵制白军，使白军猜不到我们主力集中在哪里，往往猜错了方向。白军四面都被游击队包围起来，困顿不堪。我们就这样消灭了白军许多部队。

那时候，我们攻击共有二十四团的十九路军。这是一种盲动，因为十九路军并不是真要打我们，他们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支持蒋氏，把他救出险境。然而我们因打了许多次胜仗，过于骄傲和高兴，并不慎重将事，于是就愚蠢地攻击十九路军。十九路军是生力军，刚刚开到

① 这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应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请求，给她的一份简单的关于红军发展的报告的一部分，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续西行漫记》。

前线。我们的战争又跟一年前一样，陷于胶着状态，两军不分胜负。他们终于退却，我们也跟着退却。

我们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广州公社”纪念日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产生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各处苏维埃都有很大的发展，而正规红军也组成了，我担任红军总司令。在一九三一年间，闽赣边界、湘赣边界、湘鄂赣边界，以及闽浙赣边界的苏区都有发展，而这些苏区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络。一九三一年我们到处都有无线电交通。

一九三二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赤化”新的区域，换句话说，就是推进和巩固苏维埃运动。我们使各区的苏维埃运动相互间取得联系，使各部红军联合起来，创立许多小学，此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

那时候，贺龙部队跟中央苏区没有密切联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每一不同的苏区当然有它特殊的处境。例如湘鄂区的苏区和鄂豫皖边界的苏区都有强固的群众基础，因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已经唤起了那些区域的民众，而这些革命的群众组织了自己的红军。然而在江西，红军还有开辟苏区、发动民众运动的特殊任务。那些苏区发展得很快，很强固。如果湘鄂赣三省的红军和苏区能取得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则我们在苏维埃运动中一定要获得更大的成就，这就是说，我们有领导全中国的可能。

第四次反“围剿”^①

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第四次“围剿”开始了。当时江西红军的经济情形不很好，因为我们已经把所有地主的财产都没收光了，我们经济来源断绝了。同时我们的战略也不大好。我们先进攻粤军，再进攻蒋部，这是错误。我们先进攻粤军阵线上的南乡，为的是要减少我们后方的威胁，于是向北行进，穿过江西苏区东北部，与第十军会合。

当时蒋氏还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封锁线。他急要“消灭赤祸”，派遣部下最有力的部队参加作战，这就是陈诚所部三个师。这十一师、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是蒋氏最精锐的部队。他想很快地切断红军的防线，而我们则企图在他们未发动前突破他们的阵线。此次战争是很激烈的战争。我们击溃了国民党军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俘虏白军一万三千名。我们获得十二个团的来福枪，许多挺轻机关枪和三百万发子弹。我们又把第十一师缴了械，把他们逐出战场。

① 这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应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请求，给她的一份简单的关于红军发展的报告的一部分，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续西行漫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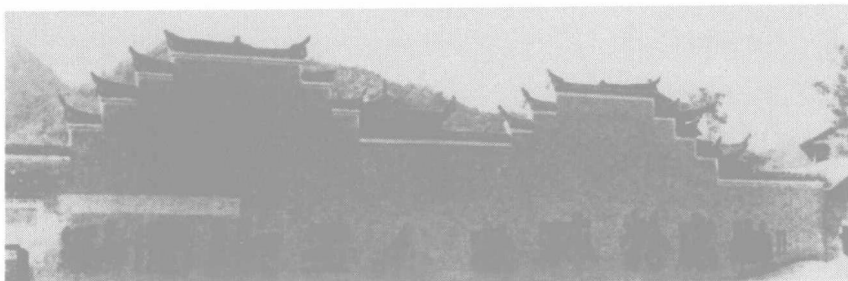
第五次反“围剿”^①

蒋氏对于我们的胜利感到绝大的惊骇。他停止了长城抗日战争，跟日军订立何梅协定。他亲自赶到南昌，准备新的“围剿”。陈诚部队失败以后，蒋氏知道自己必须改变整个战略。他聘请了许多外国顾问，凭借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来实践进攻和防御的战略。他同时改组了自己的军队。在新战略下，他只能攻击我们的外围，不能攻击我们的中心部队。他攻击湘鄂皖的红军，红军被逼退却。我们因此失去了一个分散敌军、牵制白军的主要力量。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没有发生过主力战，因为蒋氏调动了所有部队做大规模的五次“围剿”的准备。那时候，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大好，这是对方封锁我们的结果。于是蒋氏调动了三百团人进攻红军，而第五次“围剿”的大战就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间开始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闽省反蒋事变发生。我们应付闽变的手段并不高明。我们本来可以帮助十九路军，但结果没有。他们也不十分信任我们，因为这事变的发生刚在我们两军交战过以后，而我们统一战线的战术也没有很好运用起来。同时我们也料不到十九路军会毁灭得这么快。

在一九三四年的七、八、九、十四个月间，战事非常激烈，双方损失惨重。蒋氏对于部下军官给以法西斯训练，获得了很大效果。因为这些军官更加坚决地奔赴战场——然而结果使我们能够俘获和斩杀

① 这是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应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请求，给她的一份简单的关于红军发展的报告的一部分，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〇年版《续西行漫记》。



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标语

大批军官，其中包括许多旅长。

蒋氏在第五次“围剿”中所以能击败红军的主要理由是他获得国外许多帮助。他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都从外国帝国主义者获得充分的帮助，使他能够组织成这次大规模的“围剿”。例如改组军队事宜都是由德国将军西克特和其他外籍顾问主持的，他们所运用的战术是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时所运用的战术。

共产党决定红军退出南方的苏区，于十月间开始长征。红军首先冲破华南粤军的防线，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中部。我们原来的计划是要跟红第二方面军联合起来，但国民党军队在两湖封锁了我们的路线，我们于是决定回到云南，再向四川行进。在四川，我们碰到红第四方面军，于是继续向西北进发。

第七章

长征两年



开始长征^①

……三军团几个仗打得很坚决，每次都打了胜仗，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就计划突围了。但是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准备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些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能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保护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厂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人，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



长征时期的朱德

十月十日晚上，我们开始由瑞金开动，留下项英、陈毅，大约有一两万人在中央苏区。我们分两路渡过信丰江。这时广东军队同我们已经有了来往。我们也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搞得不妥当，打也打了一下，就在十月廿一日突破了江西第一道封锁线，广东军打通，我们就插向大余，到了湖南的汝城。

①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很快，又在十一月八日突破湘南汝城、桂东的第二道封锁线。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进占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汽车线，十五日占领了第三道封锁线。以后便一路经临武、蓝山，一路出嘉禾继续西进。在天堂圩打垮了湘军李云杰部队，然后一出江华、永明，一出道州，渡过了潇水。又突破了在湘江沿岸的第四道封锁线。那是最后一道封锁线。

我们即顺西延山脉经全县、龙胜附近，向湘黔边境西进——这时集结了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直属队，名义很大很多。主要打仗的，还是仗着一、三、五军团——由湘南通道又折入贵州的黎平。

……黔军侯子担部扼守着乌江北岸堵截我们。我们终于趁一天拂晓抢过乌江天险，打退侯部，进击团溪，在第三天的下午就逼近了遵义，而且占领了。另一路打下了湄潭、绥阳，另一路打下了桐梓，进到松坎。当时都以为我们直接入川，我们却在这一带休息一下。

在这中间，击溃了五师敌军，在遵义占了王家烈西洋式的宫殿，休息十二天，在各处召集了群众大会。在青年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在进遵义城时，是在放炮竹、群众欢迎声中进了城的。在那里没收了王家烈经营的盐行几万元，还没收了他从上海买来的价值五万块钱的白金龙香烟……

十二天后，就又经过桐梓，在土城场渡过赤水河，突进川南向古蔺以南前进，以后又沿了赤水河上游向西走，到了云南威信县。休息了一天，本拟继续西渡牛栏江入四川。

结果我们却折回黔西了。又占桐梓娄山关。

那天下午在娄山关与由遵义来的王家烈两师人作战，结果包围大部，缴了枪，赶紧追击，就在当夜三点占领了遵义城^❶。次早，敌吴奇伟部由南面来，在离城廿里处与彭德怀三军团接触。不久，林彪的一军团迂回到敌人后面，敌大部缴了枪。

四月上旬，我们重渡乌江向南转进。一部向东佯攻瓮安、黄平，主力换到贵阳以东四十里龙里、贵定之间的封锁线，折向西南去。经定番、长寨、紫云、贞丰，分一路向安龙经多别桥，到曲清、马龙，一

❶ 中央红军主力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二占领遵义。



泸定桥旧址

路由兴仁经保田堡、富源到沾益、寻甸，到了离昆明三十里处，这时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把部队都调到东面去，一下就落后了五天路，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占领昆明，而是引诱军队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这样引得大部敌军都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绞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沿会理向西川挺进，经会理、德昌、西昌、泸沽、冕宁，到了大渡河边，结果在安顺场抢渡。一部夹河西上，在其以西百里处有一座铁索子桥，叫泸定桥，抢过桥北去进占了泸定县。

我们向东北，到天全攻击了杨森的六个旅，又占领芦山，从此上山了。到芦山，向西走邛崃山脉，占宝兴、懋功，再由两河口，到卓克基，向毛儿盖，与四方面军徐向前他们会合，沿懋功、毛儿盖之线，那已是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二十日。而在这期间，得到长时期行军以来的一个休息。

【附】

爱兵如子^①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关乎革命成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之后，又同周恩来同志一道，积极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艰苦转战，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有这样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根据朱总司令电令，东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向南，直指乌江。蒋介石急忙调兵“围剿”。三月底，红军主力乘虚南渡乌江，把敌人甩在乌江北岸。当时，陈赓同志和我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即可拆桥。后来，我们得知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陈赓同志和我到宿营地后，即向中央军委首长汇报情况，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场。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陈赓同志和我以及在场的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当即表示接受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我们当场保证，天亮以前一定重新把浮桥

① 这是宋任穷《伟哉大宇宙，壮志充其间》一文的节选，摘自《回忆朱德》。

架好。接着，我们顾不得吃饭，由我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这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一夜突击，终于在天亮前又把浮桥架了起来，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七点，九军团还没有来，我们才按原定计划，把浮桥拆掉。部队在极端疲劳的情况下，又急行军追赶大部队去了。原来，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活动，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当时因作战频繁等原因，一度与中央军委失去了联系。后来，九军团几经转战，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惟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由此，也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敬仰之情。

同张国焘斗争

在毛儿盖，我们休息了三个星期。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也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他知道自己过去曾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想用一切方法来掩饰这些错误。结果便选择了拿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攻击中央的方法。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感情本来很好。他口头不讲什么，而实际在那里策动着拆离的把戏。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事情，同时谁也不会想到。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做，并且鼓动自己的下级打电报给中央，想当中央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些事可以说完全是那种军阀的老套，我们看了这电报，是十分诧异这个怪人的。

中央和一方面军干部很想帮助四方面军，可是张国焘却始终认为四方面军是他个人的，不但不感谢你好意的帮助，同时还拒绝，不高兴你好意的帮助呢。

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

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他一个人没办法反对，只得拼命去鼓动下面南下，讲话中间多讲北上的困难。共产党中讲实力派的只有他，还没有第二个人。中央决定他当总政委，并且决定红军分两路北上——因为当时还有一部分人在底下，总司令部决定怎样派人去接那一部分人，由阿坝上来。

那时一方面军有三万多人，四方面军有六万多人，我仍为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为参谋长，商议如何把那一部分带上来，但是张国焘已经下了决心来一下，便实施了他的阴谋办法，不执行这个命令。

在毛儿盖开会的争论当中，我们已经深知领导四方面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得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他对于红军、党、政权各方面，都采取了很多旧的方法来培养个人势力。我们为了好好培养这些工农分子，总是从正面宣传党、马克思主义和真正一些红军的办法、制度以及苏维埃制度与法令。

我们一路下去，做了很多正确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在群众中间讲共产主义多，反正起了影响，以致后来他不让我们去指挥队伍，接近队伍。但是他不从加紧党的工作这方面来搞，也难搞得好。他自己也没办法带，更因为是在艰苦的草地中间，更是需要。虽然他一方面反对，而经过我们陆续逐渐地整理到了某些程度，他也觉得这样好一点。没有办法不往这面转。我们也就抓紧进行了群众工作，譬如打骂现象……在路途上都渐渐改了。因为与一方面军的会合，他们这些弱点，都暴露了。过去张国焘是专门以打仗来掩饰这一切，过分夸张着战事，报告战事。现在逐渐对人民队伍同志的不爱惜都充分地暴露出

来了。

一转到阿坝，过一条噶曲河没有准备好。其实张国焘是根本没有准备，过不去好南下。他是更坚决地反对中央北上的决议了。中央带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在包座打了胜仗，他又极力把四军和三十军调回来。他个人主张坚决反对中央，对一方面军司令部都采取了监视的态度。

九月间，以第一军团做前锋，党中央、苏维埃政府，都继续沿岷山一带北上了。我还和四方面军留下来，一两个月中间斗争更激烈了。上层下层都展开了斗争。他一提出反对中央，就更需要他自己的团结，团结这一部分势力，好用来反对中央。他明知道不能反对，但也还是反对了。他公然成立了“第二中央”及军事组织，三位一体集中在他身上。留下来的一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团，第五、第九军团，约万把人。时时刻刻从此开展了更尖锐的斗争。以不正确的反对正确的路线，实无话可说。他们只有不讲道理，动不动要打，我们很困难。

张国焘说，中央苏区的向北走是退却逃跑。但那完全是没有理由的说法。

……因为张国焘那不正确的办法，扯上扯下损失了部队有三分之一以上，譬如四军、三十军一两万人，损失到剩下四五千。有些是打仗打死的，有些在困难中逃跑了……

渐渐他也感觉到没有办法了，没有出路了，要出四川又没办法。他由于悲观失望，想一个人躲避在绥靖去做土司了，有些人就把他叫做“张土司”了。

我们同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离开他了。是打到底的。一路打，一路改造部队，用中央苏区那一套办法，建设党、建设红军及群众工作，渐渐整理得相当有头绪了。打了四川军的十几个师，又在那里补充了兵额。辗转在芦山、天全、名山很多处，在这样条件下，驻了好几个月。“张土司”才又下来，到我们一起来了。这时在整体上的斗争，我们已经获得胜利了，虽然外表上还蒙着张国焘的伪中央，内部却实际变了质。

短期间整顿，为的是红军。党的内容，一般政治文化水准都设法

提高了。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在这些方面相当起了应有的模范作用,就开始准备北上了。

路线得改变了。由“八一宣言”起,告国民党书,一直朝着统一战线路线上去。

【附】

“临大节而不辱”^①

毛泽东同志在和陈毅同志谈到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时，曾深情地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这是对朱总司令崇高而真切的评价！

—

在长征途中，我一直是军委总部的警卫班长，在朱总司令身边负责警卫工作。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飞渡大渡河后，路经天全、芦山、宝兴时，就听说四方面军离我们不远了。同志们心情振奋，士气高昂，不顾体弱和疲劳，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川西的一个山区小镇懋功。在懋功我们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大家不知有多么高兴。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说：“去告诉管理排长，会个餐吧。”当天晚上在离镇子不远的一个小瓦房里，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同志一起会餐，欢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在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四方面军曾在川陕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张国焘却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来到了懋功一带同一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央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张国焘仗着他有七八万人，看不起中央红军，继续坚持错误路线，主张向

① 这是潘开文的一篇回忆文章，摘自《回忆朱德》。

青海、西藏地区退却，并狂妄要求改组中央，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两河口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经过坚决斗争和耐心的工作，张国焘表面上同意北上抗日，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分裂党中央、篡夺红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会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又出发，翻越了梦笔山、打鼓山、马唐山等大雪山，走了好多天，到达了松潘附近的毛



朱德与毛泽东的合影

儿盖。这时，一、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都已会合了。

在毛儿盖停留七八天，中央政治局又接着开会，就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了决议，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前敌指挥部在右路。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总司令部、红军大学、四川省委撤出机构都在左路，决定两路军在班佑会合。7月底，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翻过一座座大山，跨越茫茫的草地，走了二十几天，到达阿坝。在阿坝休息了一下，又走了三四天，来到黄河上游的嘎曲河。这时，听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已到班佑四五天了，正在等待左路军前去会合。

嘎曲河离班佑较近，只要走三五天的路程就可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嘎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站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点，但是，我骑马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

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中央一再来电报催促，并指出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张国焘却连发电报给中央，谎说河水上涨，部队过不去。许多同志气愤地说：我们连乌江天险都过去了，为什么这么条小河就过不去？

到了第三天，张国焘突然提出要部队南下，并给中央发了电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立刻来电拒绝了他南下的错误主张，严词责令他迅速北上。但是，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公开和中央闹分裂。夜晚，他擅自给前敌指挥部发了密电，说中央不同意南下，就用武力解决，企图加害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电文译出后，由参谋直接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看到这份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电报，立即冒着极大的危险，只身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过电报，连夜把政治局的同志找来开会，研究了紧急情况，并断然决定率领部队北上，致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央北上了，张国焘便引左路军从嘎曲河折回阿坝，在阿坝驻了约半个月。这时，张国焘公开进行反党活动，提出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口号，攻击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张国焘对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的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不让朱总司令参加会议，不给朱总司令看电报。在张国焘的策划下，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斗争朱总司令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离司令部半里路远的一个正方形屋子里开的。我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会场，一进门看到屋内气氛很紧张。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紧挨着坐了下来。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后，就大喊大叫地说，中央丢了根据地，损失了红军，执行的是退却逃跑路线。接着有的人就斗起朱总司令来了。但是，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坦然自若，他当时带了一本书去，不管怎么斗他，他一言不发，总是埋头看他的书。当主持会议的人硬要朱总司令表态，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并逼着他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时，朱总司令开始讲话了，他庄重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

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作出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的！”总司令刚一说完，会议室里吵闹得更凶了，斗争更加激烈。刘总参谋长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了一句：“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下又引起一阵狂叫：“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同志。后来，有人冲着朱总司令高声嚷着：“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很明显，张国焘他们是想逼走朱总司令，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朱总司令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一方面耐心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等待时机，争取和教育更多的同志。他说：“我是赞成中央的北上抗日决定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朱总司令这一番话，像一把利剑戳到张国焘他们的痛处，有的便暴跳起来说：“你既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的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在回驻地的路上，朱总司令跟刘总参谋长边走边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这充分表现了朱总司令崇高的革命气节。

二

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操纵会议围攻朱总司令以后，我们在阿坝的十几天中，张国焘还使用了许多险恶、卑鄙的手段，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分裂中央红军，迫害朱总司令。

就在那次围攻朱总司令的会后不久，一方面军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碰上了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梭镖和物资。在回阿坝的路上，下了一场大雨，当同志们要越过一条小河沟时，碰上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蛮不讲理地要夺五军团那个排缴获的梭镖。本来，当时大家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斗朱总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气，那连长又那样无理，战士们当然不答应，有的同志说：“缴获的梭镖和物资，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问得那个连长哑口无言，但

他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缴获的武器和物资抢了过去。同志们回到阿坝后，十分生气，向朱总司令报告了这件事。总司令听了汇报后，沉思了片刻，他向汇报的同志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要顾大局，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

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张国焘的布置下，他们用担架抬上昨天抢梭镖和物资的那个连长，把他摆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两间房子中间，张国焘的许多人就大声嚷道：“五军团的人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这时，张国焘便气势汹汹地从屋里走了出来，面色阴森，双手背在后面走来走去。本来是张国焘指使他的部下，抢了梭镖和物资，反而诬告别人打了他，还要朱总司令出来验伤、处理，这明明是在给朱总司令出难题。然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沉着冷静，他慢慢地走到担架旁边，亲切而关心地问那位连长：“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打，你现在讲一讲嘛。”这样一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用被子蒙上头，一句话没讲，很可能他的内心受到了责备。张国焘一看他整朱总司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哭丧着脸，垂着头，非常尴尬地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一次，五军团一个营，在阿坝西北约二十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个营不听指挥，甚至诬蔑这个营要叛变。张国焘就逼着朱总司令表态，派人去缴这个营的械，妄图把叛变的罪名嫁祸于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对张国焘严肃地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张国焘和他的部下被问得无言对答，面面相觑。朱总司令见他们这样，便更为严厉地对张国焘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有意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

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断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它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着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跑。不一会儿，就叫来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员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了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匹骡子给我留下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员硬要把总司令的牲口牵走，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后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三

在阿坝，张国焘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迫害朱德总司令，闹了十几天后，继续带着队伍过草地南下。这时，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朱德总司令看完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张国焘不干。朱德总司令只好自己向部队的同志宣传这个重大喜讯。这个好消息一传开，大家欢欣鼓舞，多么想赶到陕北去见毛主席！可是，张国焘见到这情景，惊慌失措，怀恨在心，暗地里继续采取阴谋手段，对朱总司令进行迫害。

从阿坝到松岗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总安排到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才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疙瘩吃。一到松岗，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会议，公然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向张国焘闹分裂、搞独立的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向红军干部们宣传党的正确路线。要大家团结起来，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过完草地，顺大金川南下，攻克绥靖县后，朱总司令到了前敌指挥部，在生活上才得到了总指挥徐向前等同志的关照。接着，第二次过夹金山雪山，经宝兴、天全到达芦山，驻扎在陈家窝。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向我们几路围攻，张国焘极力动员部队“打到成都吃大米”，与敌军在飞仙关对峙，仗打得很激烈。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又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俘虏政策，部队消耗得不到补充，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这时张国焘才被迫引军重翻夹金山，再经懋功、小金川、大金川，翻越挡岭大雪山，撤向道孚、炉霍、甘孜一带，但他仍不改弦易辙，而是企图向青海、西藏方向逃跑。

我们在甘孜驻了近半年。在这期间，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朱总司令听到二方面军来了，很高兴，骑着马到六十里外去迎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会合后，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同意朱总司令的意见。这时，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行不通了，他的分裂阴谋被戳穿了，不得已才宣布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走了二十多天草地到了阿坝。在离阿坝后的第

一天宿营时，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十几匹马，都拴在一个马棚里，第二天早上要出发了，却发现马棚的墙上打了个大洞，别的马都在，惟独朱总司令的马被偷走了。后来军部领导给朱总司令一匹马，走了几天又来到嘎曲河。这次部队一到就过河，晚上在河北宿营。次日天还未见亮，前卫部队走了，张国焘又不赶上来，当晚军部领导说，部队明天拂晓前出发，留下一个营给总司令担任警戒。第二天一早，我们派人去找部队联系，寻找半天，部队的影子也没看见。四周是茫茫草原，我们感到情况很危险。下午，朱总司令把身边三四十人都组织起来，研究和部署碰到敌情时的对付办法。夜幕降临，下起小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挤在一个帐篷里，十几匹马都拴在外面拉帐篷绳子的钉子上。凌晨三四点钟，大家正在睡觉，敌人来了，割断缰绳，放跑了四五匹马。当哨兵开了枪，大家才惊醒过来，马上离开帐篷，团团地把朱总司令掩护起来，持枪准备战斗。一直等到天蒙蒙亮，看见远处有四五匹马在游动，派骑兵去追击，才把马找了回来。这时，后面的部队还未来。一路上发生的这几桩事，都是与张国焘迫害朱总司令的阴谋有关的。可是，我们的朱总司令无所畏惧，仍然坚持在部队里做团结工作，坚持等后面部队到来后一起北上。当时，没有粮食，部队从草原上弄来许多野牛羊，管理员想杀几头给大家改善一下生活，但朱总司令不同意，他说后头大部队更困难，要留给后面来的同志吃。后来，死了几头羊，管理员又提出煮给大家吃，朱总还是不同意。他要大家把肉割成一块块挂在一些小柳树枝上晾干，留给后面的部队吃，我们只好熬骨头汤喝了。等到第三天晚上，张国焘才带队伍来到嘎曲河南岸。在黑夜中，虽然可以隔河相望，但他不过河来，自己在河南扎了营。

四

张国焘过嘎曲河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出发了，走了四五天草地到了班佑，接着，又出腊子口到了岷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叫哈达铺。司令部和直属机关在这里休整了十几天，而部队仍继续往前走。就在这

十几天中，朱总司令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陕北给朱总司令和张国焘发来了电报，并派一支部队来接应。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想到一、二、四方面军快会师了，都感到非常高兴。朱总司令就找张国焘研究行军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汇合等问题，整整商议了两天两夜。陈昌浩同志也从前敌指挥部赶来参加商谈。张国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极力宣扬逃跑主义，主张入青海。朱总司令就坚决地与他进行斗争，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违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的，是错误的，要他丢掉自己的主张，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朱总司令十分严肃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惟一正确的出路。”接着又谈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结果。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等渡过岷江，住在对岸的供给部里。朱总司令回到自己的屋里坚定地说：“张国焘说他辞职了，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向前线部队发出了继续向北行动的命令，而且决定总司令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北上。当时，司令部的每一个同志，心情都十分激动，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作好出发前的准备。

可是，就在这天黄昏的时候，张国焘从岷江对岸叫人送来了通知，说他要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岷州会议。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夜，斗争十分激烈。开始时，张国焘仍然端出他那一套反对北上、向西北逃跑的错误主张。朱总司令当场对张国焘进行批驳。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都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支持朱总司令的主张，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会合。张国焘一见形势不妙，又要了一个手腕，在会议结束时，他一本正经地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一夜的紧张斗争暂时结束了，当

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来到岷江边时，东方已开始发白。

朱总司令回到哈达铺后正准备出发，张国焘这个两面派，却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和骑兵，直奔前敌指挥部的所在地漳县。张国焘一到，就急急忙忙召开干部会议。当时，在前敌指挥部的同志，都不知道开过岷州会议，更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议是北上。张国焘就利用这个机会，欺骗前方部队的干部，煽动部队西进，企图推翻岷州会议的决议。接着，张国焘即向所有北上的部队发了电报，要部队立即停止北上，回头西进。

这时，朱总司令已带司令部出发北上，走了一天，宿营时，收到张国焘要队伍停止北上而南下西进的电报。朱总司令十分着急，马上又向前方的部队发了急电，要部队就地停止一切行动待命。但是，机要通讯员拿到这电稿去电台发报时，电台不发，说是张国焘总政委已有命令，没有他签字的电报一律无效，不准发出。当时，傅钟同志向朱德同志说他去送。傅回来后向朱总报告说：我对电台政委说，朱总司令是中央军委的主席，总司令部是在军委的领导之下，总政委也要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我是西北局组织部长，如果你不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就是违抗军令，我可以立即枪毙你。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才发出了这份电报。

电报发出后，我们又继续前进，一天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到了前敌指挥部后，朱总司令立即发电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并连夜在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又整整开了一夜，朱总司令再次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揭露了他的两面派丑恶嘴脸，清算了张国焘的反党罪恶阴谋。到会同志都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坚决表示要迅速北上。第二天早上，左路各部，在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的率领下，迎着灿烂的朝阳向北挺进，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来迎接的部队在甘肃的会宁会师。

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的团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优秀骨干，为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威武不屈的伟大革命精神，既坚持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一再挫败了张国焘对党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领导，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率军北上

张国焘是没有路了，到西藏去，非常不好走。在四川留下又蹲不住。就只有拼命北上一条路，便又改变为与一方面军靠拢。这时，中央已经进入陕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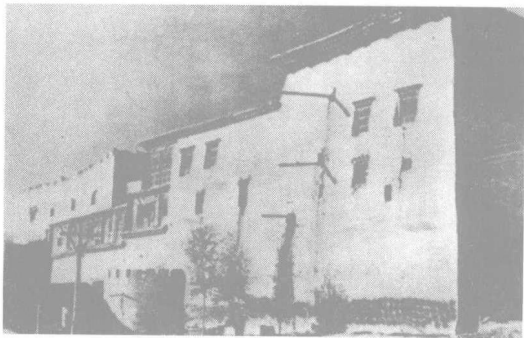
由宝兴到三江口、懋功，转入西康丹巴、道孚、炉霍，到了甘孜。

在道孚曾经整顿了一个时期，准备北上。在这中间，一般的进步还是有的。譬如提到一些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在那里我们仍然天天收到新闻、电报，大家展开来讨论这些问题。一切工作从政治出发，不一天光忙于事务。这一回转来，变得更艰苦了。到了西康地区，筹备北上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准备了帐篷、牛羊、粮食，训练了部队，各方面探听了道路，在政策上也采取了比较合理的一些办法。

在不幸中的大幸，是我们留在西康，去把二方面军接上来了。

他们千辛万苦从云南过来，一路经巴塘、白玉，到了甘孜，一路由定乡、理化、瞻化到了甘孜。他们还带有万多人，贺龙同志、萧克同志、任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都在这儿会合了。

这一班人一来，在那里三个方面军都有人在了，便开开会，讨论些问题，大家都愿意联合。关于张国焘反中央的问题，他们还都一点不知道，来了以后，才知道。就主张反对张国焘——



朱德在甘孜住过的孔萨大楼旧址

可是当二方面军还没有到甘孜，他就自动把他那一块“中央”的牌子摘下来了，另外组织了所谓“西北委员会”。

二方面军的贺、萧、关、任态度都很好，对问题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同时由于他们的二军团、六军团，对于中央的信仰很高，也就影响了四方面军的转变。

会合之后，准备北上。会合中间还开了很多会议，然后出发。又是一个多月艰苦地行走在草地中间。

由甘孜向东北，经东谷、尼马沟、牙陀，出了西康，到阿坝，又过噶曲河，很顺利就能过去，即由上坝子、下坝子，到了包座、巴西，到巴西以后走的就是一方面军北行的道路了。一路上也没有怎样打大仗，一直向岷山出甘肃……

当时正是广西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我们趁这空子，一钻就钻过甘肃来了。

在岷州一带和张国焘又扯了几个月的皮。二方面军来了一计划，中央也将就了这计划，并且派一方面军由彭德怀同志指挥向南来接。我们整个的计划，都归我指挥。张国焘当政治委员，他也承认了。四方面军集中在岷州，二方面军开到了天水。一方面军南下来接应。四方面军往北走，这些计划都搞好了。

突然他又变了卦，想把四方面军带到甘肃西部甘凉肃去，于是扯着就走。大家开会反对，西北委员会也全体反对。他仍坚持要跑，但是到了洮州，天落大雪，人们对于雪山、草地，已经怕伤了，都不情愿西行，完全同意折转来。从此张国焘在部队中的信仰大大减低下去了。

折回，由临潭向渭源、会宁……与一方面军陈赓、杨勇带的第一师在会宁会合了。

……一方面军由中卫来接应，我们也北进到会宁会合，已是一九三六年的十月九日。

从苏区到长征中的生活

在苏区，我是很习惯于接近群众的。尤其在游击队运动的时期里，那的确是接近群众。不是个别谈话，就是和群众开大会。有时候一天开几个会，有时候几天开一个会。那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就经常把我们当做宣传品，开会讲讲话。

所有苏区里面的人，很多都认识我。我也不躲避人家。

对于党内的同志，我是经常爱对他们讲列宁主义一些条文和苏联的事情、故事。他们也都听得很有味道，爱听。在这些问题上，也的确使一般人受了相当的影响。

……对于军队打仗，我们向来抱定民主作风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普遍都受了影响，打仗总是自己带着打。

随时这样一个主意，又那样一个主意是没有过的。不管对于部下，对于同事，都很能够采用人家的长处，哪一个主意对，不问他是谁的，就拿来用。我们是只要事情能成功，不管谁的，胆量相当大。人能一辈子成些事，对于用人是很大关键。你能采用人家长处，人家才乐意被你用，因为这样可以发挥他的才干。

读书，在我是一辈子最苦的，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感觉一天是够过。太不够了……也从未懒过，只要有工夫，就读，实在是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书，想读读不到的困苦的关系。

处世、对人也是乐观的。从清朝那时决定了革命起，已经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清楚。哪里晓得那样打仗却打不死。若死了，也就拉倒啦。对于经济财产观念也是这样。当我想读书、想出国的时候，都是没有钱，只想要有几千块钱才好呢！后来几千万在手里也反而感觉到很累



长征时期的朱德

赘。对于资本主义，兴趣根本就不大。要想做事业，就需要钱。但对于理财，自己是不情愿的。事实上却还是个好手，很懂得经济来源及发展。因为小时候对农民经济情形是很清楚的。大了读书时候更是自己想法搞钱。后来算学也就搞熟了。以后做事在数目的计算上，做了十年军官在手上经过的钱也总在几百万几千万……但始终认为公家是公家的，自己是自己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

看得非常清楚。后来再得机会，一研究经济学就更清楚了。对于经济问题，始终不乱用，一文钱也不乱用。一般说来都是很节省的。

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病过。多半是晚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夫，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每天走，每天都有新的地方发现。我觉得等于和从前我打游击的时候差不多。

我没有坐过担架，我一直到草地，才害了一次感冒病。坐了五里的担架，坐得不舒服，就下来骑马了。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的，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

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逢到极困难事情——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那么慌张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我感到曹操在他打了败仗的时候，笑也还笑得起来，那就是安慰群众的方法。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在草地上，生活上，那可以说是人生极大的最艰苦的阶段了。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雪山，草地，各种民族，很丰富了一些历史、地理的各种经验……

到了保安、延安

十一月底到了保安。

在保安不但得到了暂时的休息，而且得到了很宝贵的书籍，是我最大的安慰。沿途上，各处欢迎，我很舒服。天气已经冷了。一方面军同志见着我，觉得欢喜得要哭了的样子。

看了些书，新书都在屋里堆起来了。很多年在路上没得看书了，真是高兴。

得到苏联及世界上很多新的消息。可以说是个新的转换时期。没几天休息就去给“红大”上课了。四方面军很多同志，过去对党认识不够，便拼命学党的建设。等到“双十二”事变起来以后，我就移动到延安。

生活主要的还是看书上课。反张国焘问题就已经深入到群众中间去了。几个月过着顶舒适的生活，读书教书，做点斗争。住在延安城里头。身体还好，不过教书多，说话说得太多了，有点子气管咳——也许是因为住下久了就生病。若是天天打仗，再忙再苦，也是不会生病的。在那时有许多中国记者、外国记者，到延安来了相当多，我都会见了他们。

“七七”以前，我们在谈国共合作，一切问题也都朝着这方面做。国民党也派来了代表。但是一直谈判，谈判到“七七事变”，还没有谈判好。

正在那不即不离的中间，“七七事变”爆发了！

由保安到延安。这几个月可以说是平生最进步的一个时期。收集了所有的经验教训，看了书，集合起很多中国的问题来看革命的发展，

就更明显了。

事变后党决定我到前方部队来。到云阳一个时期去开了改编会议，不久到八月初就去南京了——十年始终过着苏区生活，在红军里。第一天出来到了西安，看看那真是别有风味了。一切生活都是两样，不同的。又看到了封建的社会，各种各色的老套。自己想了想，是有非常之大的感受的……新兴的资本主义也在发展着，公路、洋楼、汽车、飞机、工厂，均有新的发展，表面上更为西洋化。

【附】

朱老总和战士^①

记得一九二八年秋天，红军刚刚来到我的家乡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万千农民欢天喜地，迎接自己的子弟兵。可是没过几天，就听说国民党军队正从河西向我家乡逼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决定撤离。我们农民战士接到上级命令，除留下必要人员，其他同志一律随红军上井冈山。我们万安的一百多个农民战士，包括七名女同志，就这样上阵了。对我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话：“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俩会结成终身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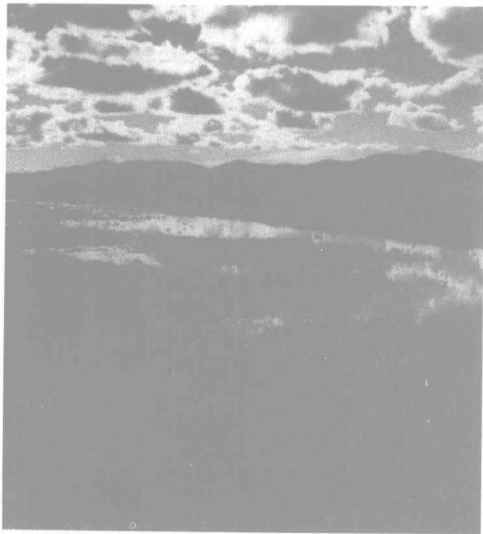
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到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

① 这是康克清《朱总风范永存我心》一文的节选。摘自《康克清文集》。

可说的……”每每部队一宿营，朱军长就去和老乡聊家常，帮他们扫地、干农活儿，就像是自家人。他的行动无形中影响了广大指战员，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在向赣南、闽西挺进，以及后来在苏区的那几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每次作战，朱老总总是先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研究兵力的部署，作战斗动员，认真细致地对待每项工作。即使碰到了挫折，他也镇定如常，告诉大家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所共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一九三四年，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直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改变了朱、毛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最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忍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回忆长征，最难忘怀的是和张国焯分裂主义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军经历千难万险，在川康边境的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大家高兴得跳啊，唱啊，以至热泪盈眶，像亲人久别重逢。岂知张国焯心怀叵测，在过草地前，他就煽动部队说前面有大河没法过，要部队折回西康。朱老总和刘伯承参谋长都不同意他的主张。当时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焯，敦促他北上抗日，他拒不受命，妄图另立中央，将带领部队南下的阴谋强加于人。他一再逼迫朱老总发表反对党中央北上的宣言。朱老总斩钉截铁地说：“我赞成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手只能举一次。”“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我们



红军经过的草地旧址

这个‘朱毛’，全国、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办不到……”张国焘恼羞成怒，就诡计多端地搞小动作，进行挑衅。张国焘的挑衅手段极其恶劣，明明是当时他有七匹马，可偏偏朱老总的那匹马找不到了。有人知道是张国焘的警卫牵去杀了。有天晚上，他们竟还撤了朱老总的卫兵。张国焘一伙就是这样肆无忌惮，不断制造事端。朱老总胸有成竹，以不变应万变，使张国焘的阴谋难以得逞，官兵们也逐渐看清了他的真面目。

张国焘连我也没放过，他派人监视我，给我另行分配工作。显然，这是为了限制我和朱老总的接触。我实在憋气，要去找党中央说理。朱老总耐心地劝导我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我觉得朱老总说得有理，心情也就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我们始终处于有理、有节的主动地位，团结了广大红军干部。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军心民意，充分暴露了他反党篡权的阴谋野心，最后只能落得身败名裂。

朱老总始终如一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使我深受教育。后来，毛主席称赞朱老总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第八章

跃马太行



复我山河，保我民族^①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东三省指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括号内均为编者注，后同），复图占外蒙（外蒙指现在的蒙古国，原是中国的一部分，称外蒙古。一九二一年宣布独立，一九二四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国



朱德正在提写抗日誓师词

国民党政府承认蒙古独立），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本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复我山河，保我民族！

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① 抗日战争开始后，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在同国民党当局尚未正式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前，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这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朱德为红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的题词。

太行前线寄家书（三封）

一九三七年给陈玉珍^①的信之一

玉珍：

别久念甚。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尚书、宝书^②等在何处？我两母亲^③是否在人间？你的母亲及家属如何？统望告。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我用。自别后了你了你，我的行动谅是你们知道的，不再说。此间近好。

刘 钟^④

九月五号

① 陈玉珍，四川省南溪县人，朱德的前妻。

② 理书，朱德二哥之子。尚书，朱德大哥之子。宝书，朱德的儿子朱琦。

③ 两母亲，朱德的生母和养母。

④ 朱德写信用的化名。

一九三七年给陈玉珍的信之二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二十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目。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望调查告知。庄弟及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①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好。昨二十四五两日，我们的八路军参加上打了几个小胜仗，夺得大炮一门，弹两千多发，战车七十四辆，打死敌人千多个，俘二百多，得军用品很多，全线士气为之一壮。如各军都同我们一样，那就不难打退敌人和消灭敌人。平南^②飞陕尚未见面，是否来山西还不知道。以后不宜花去无用之钱来看我，除了能作战报国的人外均不宜来。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并问亲友均好。

朱 德

九月二十七

^① 许明扬，即朱德大姐之子。

^② 平南，即陈玉珍之兄。

一九三七年给陈玉珍的信之三

玉珍：

由南溪来信数封均收到，悉一切情形，又家中朱礼书来信亦悉。许明扬近到我处，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地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当然后方，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累我革命。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亦不应以大革命时代看我。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专此布复。并望独立。

朱 德

十一月六号

山西昔阳县

为母亲度饥荒求捐助信^①

与龄^②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地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③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此候

近安

朱 德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于晋洪洞战地

①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德写给戴与龄的信。

② 戴与龄，朱德的四川省仪陇县同乡好友。

③ 朱德的亲属或朋友的后代。

《重逢》^①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别后十有一年，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抗日战酣，又在汉皋重见。你自敌国归来，敌情详细贡献。我自敌后归来，胜利也说不完。寇深入我腹地，我还需支持华北抗战，并须收复中原，你去支持南天。重逢又别，相见必期鸭绿江边。

① 这首诗摘自一九五九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的《沫若自传》第四卷。据郭沫若《洪波曲》载，此诗前朱德写有一小序：“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即汉口沦陷前一日，与郭沫若先生相遇，互相写了几句重逢的话，以志纪念。”

华北抗战的总结（节选）^①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

（丁）坚持华北抗战将近三年来的总结

将近三年来，我们坚持华北抗战，虽然不无弱点，但是，在客观上，我们的方针，至少已经取得了以下的一些成绩：

一、我们发动了华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参加了抗战。他们不但已组织起来，而且在近三年的斗争中已锻炼成为独立的伟大力量，成为华北一切抗战工作之基础。

这个伟大的力量，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克服的，也是顽固分子千方百计不能压倒的。谁要用脚踏踏他们，谁脚就要粉碎。

二、我们在广大群众参战的基础上，大大地消耗了敌人。同时，在战斗中发展了人民的武装。

我们现在单在华北就牵制了敌人十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守备队、铁道队、伪军和“皇协军”都还不在于内。我们截至现在已与敌人进行了一万余次较著名的战斗，打死打伤了十万以上敌人，打死了敌酋阿部中将^②以下高、中级将领多人，争取了伪军十余万人反正。虽然还有人在这铁的事实面前，说八路军“游而不击”，难道这些人脑子里是空的吗？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原载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一百一十二期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八期。

② 阿部中将指阿部规秀，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击毙。

我们不但消耗了敌人，而且还发展了自己。同志们都知道，红军改编时是三个师，现在已发展到正规部队二十二万人。游击队还不在于内，而且，还锻炼出千万个坚决勇敢，超群拔萃的干部。无论敌人如何恨我们，要歼灭我们，甚至于提出和实行“专打八路军”，但老的打不完，新的又打出来了。现在，河北、山西的子弟兵团，便是伟大的新的力量。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的专事反八路军、反共，我们的成绩将要更大。

三、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恢复了国土，树立了抗日政权，打击和瓦解了汉奸傀儡政权。这些根据地有：晋冀察、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年余反“扫荡”的战争中，它们已一天比一天更巩固起来，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的堡垒。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从各方面来破坏、捣乱根据地，则这些地方将比现在更好。

四、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了民主政治，把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真正用到了敌后方。给予了民众抗日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民众不但自选村、区、县长、专员，而且在冀南还民选了行政公署主任。

五、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下，适当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实行了五一减租、分半减息，改善了雇工生活，提高了人民抗战的积极性。在晋察冀，因为荒年，我们曾颁布了人民有权自由吃树叶的法令，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抗战热忱。在那里虽然在艰苦的斗争中，但是人民都说：“现在抗战比不抗战生活要好。”

如果不是顽固分子效法敌寇摧残剥削人民，则华北根据地内的人民生活将更要好得多。

六、我们也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和敌人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斗争。敌人用一切方法来封锁我们，我们则在广大人民和军队中发动了广泛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大家都去发展手工业，举办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晋察冀发动每三人喂猪一口，军队不杀母鸡，前年一年就收了鸡蛋出口税五十万元。河北某一县，妇女组织的生产小组每三天能

织出五百匹布……我们曾像这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封锁,逐渐求得自给自足。

如果没有顽固分子企图从经济上来摧毁我们,则这方面的成绩更要伟大。

七、我们实行了抗战文化教育政策,一般地揭破了敌寇、汉奸、汪派、托派^❶的无耻宣传。敌人的一切宣传都是集中在造成和平空气,拼命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和宣传复古运动,什么“东亚新秩序”^❷呀,“东亚和平”呀,“大亚细亚主义”呀,伪造刊物、文件、电报来破坏团结呀,天天报纸上登着“国共分裂”的大字,尊孔、祀孟、祀舜,^❸提倡中国固有文化道德,宣传迷信呀……都是为这个目的。

我们则尽力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持抗战到底。我们指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指出团结的重要、可能与必然。我们坚持宣传和执行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来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但必须承认,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❶ 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这种观点事实上取消了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❷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❸ 孔指孔子,名丘,春秋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孟指孟子,名轲,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舜指虞舜,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后将帝位禅让于治水有功的禹。日本帝国主义借祭祀这些人物来提倡复古思潮,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如果不是顽固分子的许多理论和敌相同，帮助敌人施放投降、妥协的烟幕，则我们成绩更好。

八、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以上的成绩，取得不断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以下的十个原因：

1. 由于我们真正做到了“军民一致”，和群众结成了如鱼似水、血肉相关的亲密关系。
2. 由于我们做到了“官民一致”，在我们军队中都有坚强的政治上的团结。
3. 由于我们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部队和前方领导中坚。
4. 由于八路军有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传统和精神。
5. 由于八路军有许多出色的新老干部，他们都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军队的核心。
6. 由于八路军创造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7. 由于我们有灵活的战略战术。
8. 由于人民对于敌军的仇视和敌军内部厌战思想的存在，并逐渐发展了反战运动。
9. 由于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
10. 由于我们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

（戊）关于华北的磨擦问题

一、为什么会发生磨擦呢？第一是汉奸、托派的破坏和挑拨离间，企图使我国内部分裂，特别是使国共两党互相水火，进行内战，因而便于日寇灭亡中国。第二则是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要投降。他们一方面害怕强大的日寇和为日寇的诱降政策所迷醉；另一方面又害怕群众，为自私自利的利益所迷醉。因此，他们企图中止抗战，要投降。但是，有共产党与八路军存在，投降是困难的。所以，他们投降就首先必须反共、反八路军，所以，才产生了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政策，才产生了一切对付“异党”的方案和办法。第三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不愿意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帝国主义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在有一时

期，英、法、美帝国主义曾经企图与日本妥协，因此，也更迫切地要牺牲中国以迁就日寇，而用多种方法促使中国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努力在中国内部鼓励反共阴谋。

二、在华北磨擦的经过是怎样呢？

1. 关于军事方面。

我们收复河北后，鹿主席^①来了。他最初同意我们的纲领，但后来又取消民运及抗日政权，要赶八路军出河北。正好敌人“扫荡”来了，八路军未走，他倒走了。八路军打走敌人，他又来解决八路军，并不惜下委任状给皇协军，以之作为反八路军之力量。我们能不自卫吗？

张荫梧^②杀死、活理了一〇四七个共产党员与八路军指战员，我们能不自卫吗？

朱怀冰、石友三^③的防线不向敌而向八路军，到处修堡垒，杀我们的人，后来甚至连着解决我们三个营，我们能不自卫吗？

山东的八路军是人民自动组织的武装，抗日功绩卓著，但顽固分子要缴他们的械，结果反被人民缴械了。

程主任^④的天水行营政治部出了一个小册子，叫《中共的不法行为》，附表一张说八路军打死了友军整整一千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捏造者之用心良苦，但其计甚拙。现在，我们退一步说，即令所说数目是实，我们总共死伤了一万多人，算起来还不过十命抵一命，总抵得过吧！

总之，坚持敌后抗战须人民帮助，不然不能生存。有些部队，不能与民众合作，自己垮了，如何怪得八路军？

① 鹿钟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间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间兼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② 张荫梧，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民军总指挥。

③ 朱怀冰，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长。石友三，曾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朱怀冰、石友三两部向八路军在太行和冀南的部队发动了进攻。

④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

2. 关于政治方面。

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他们所作所为无一不遵照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这样历史上少见的民族英雄义士，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们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鹿主席到南宫，就在南宫另来一套。结果，这一套就成为日寇便利工作之基础，竟成为河北敌人的模范县。诸如此类的办法，我们自然不赞成，自然要坚持人民原来的工作基础。于是，自然又发生磨擦。

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即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

3. 其他关于经济、文化各方面。也都发生磨擦。最重要的，就是顽固分子一切都要取消群众运动，而我们则一切都要群众运动。一万万人民起来了，如何压得下去？被民众遗弃了，自己不能立足，又如何怪得我们？

4.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团结，尽一切努力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但是，如果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就要为保卫抗战力量而自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即便“犯人”也是为了团结。

经证明，党中央的英明指示完全是正确的。

（己）我们今后的行动方针

我们今后坚持华北抗战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呢？

一、抗战将近三年的事实，证明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证明了这一路线之下，我们的各种办法，也是正确的。因此，今后应本着这一贯的正确的方针与办法，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实行三民主义，坚持进步，适应着今后华北形势，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和各方面的办法，坚持抗战到底。

二、在汪逆傀儡政权成立，敌寇、汉奸的政治的新进攻更形加紧，“以华制华”的毒计愈加毒辣的时候，我们更应当做以下的工作：

1. 广泛开展反汪、反投降，拥蒋坚持抗战的运动，肃清暗藏在华北抗日阵营中的汪派汉奸，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2. 广泛开展宪政运动，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并在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更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方面，华北也须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去做，以达到成为全国的真正的模范。

三、正因为华北抗战有着决定中日战争的胜负的伟大意义，所以我希望：全国各党、各阶层、各民众团体和全国的人民，加紧对于华北抗战的援助。如果我们丧失了华北，便会没有了中国。

我坚决相信，有了华北抗战将近三年所奠定的基础，有了全国抗战的配合，特别是有了我们党中央坚强的正确的领导，不管敌人如何三番四复，十次八次进行“扫荡”，不管敌人如何施展其政治阴谋，只要大家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在长期拉锯式的“扫荡”与反“扫荡”的严重的斗争上，最后以反“扫荡”的姿态，参加全国的反攻，而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去，收复一切失地，建立新中国！

【附】

朱总司令在太行山时的一些情况^①

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时，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总司令、任弼时、彭德怀、左权等同志共同商量的。总部发出的指示、电报，大多数是由左权、彭德怀同志起草，总司令批示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们从云阳镇出发，过黄河，在河津上岸，到了侯马。任弼时同志在侯马刮了胡子，显得年轻、精神。总司令从来不开玩笑，这时也和弼时同志开了玩笑。在侯马上火车，总司令还同我们讲话。那时吴传宝同志是测绘员，在火车站测绘。他没见过火车，听说火车要吃人，一看到火车开过来，就赶紧跑了。他回来说起这件事情时，总司令、弼时同志都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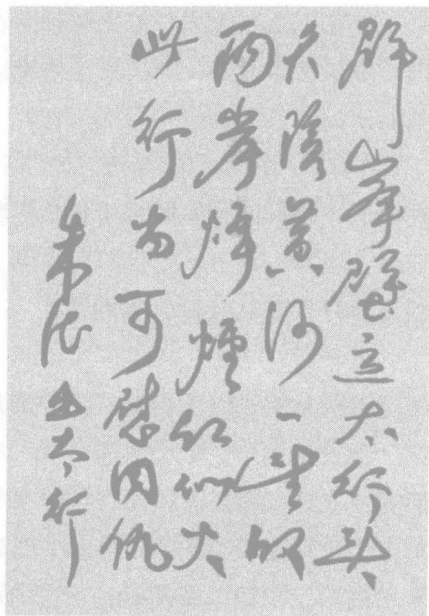
我们每过一站，当地群众都热烈地迎送。当时正是中秋节，一路上群众送了许多月饼、橘子，火车行李架上和座位下面都堆满了群众送来的月饼、橘子。总司令和我们一起坐硬席，在他的座位上下也堆满了月饼、橘子。

从侯马到太原，火车走了一天两夜，因经常遇到敌机骚扰，夜间和清晨走，白天停。到太原时天刚亮，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来接我们，我们住在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也住在那里，他早就到太原来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了。我们正准备休息，铺盖还没打开，敌机就来了。国民党飞机起飞应战。周恩来同志、总司令都不进防空洞，在外边看空战。这次空战，国民党的飞机被敌机打了下来。当天下午，阎锡山派个高级参议来接总司令到他的指挥部雁门关，周恩来同志也一

① 这是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的回忆。节选自《话说朱德》。

起去。周恩来同志、总司令和高级参议三人坐在汽车后座，司机和我坐在前面，周恩来同志他们都在车上睡着了。我对首长的安全很担心，但在火车上一天两夜都没有睡，实在支持不住，也睡着了，有时摇晃一下就碰到玻璃挡板上。周恩来同志醒来，推了我一下，我就打起精神，看到车灯灯光前面的兔子奔跑，精神又上来了。还看到前面有辆卡车抢行，被火车撞着。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到了雁门关。阎锡山的指挥部设在山脚



朱德手迹《出太行》

下的民房里，房子倒不错。略事休息，吃过饭后，总司令、周恩来同志同阎锡山谈判，我独自一个在房子里躺下就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他们当天就谈完，太阳还没下山，那高级参议用原车把周恩来同志、总司令和我三人送到阎锡山的家河边村，半夜一两点钟到达那里。在阎锡山家南房吃饭，有一桌人，其他的人名记不清了。阎锡山家是个四合院，宫殿式的，有一个连看守。院子里站了一帮人观看，说什么“大土匪头头来了！”真把我气坏了。饭后，休息了一会儿，那高级参议又用原车把我们送到五台县。那时天刚亮，县长和学生们出城五里来欢迎我们。我们在县府休息后，总部来马接总司令到离五台县东南二十里的南茹村，周恩来同志和阎锡山、那个高级参议回太原去了。

总司令和司令部在南茹村，住在一个地主的房子里。我看到地主用麻袋一袋袋地把阎锡山发的铁路银行票子用毛驴驮走，坚壁起来。不久，平型关战斗结束，总司令到前面去总结经验，是坐大卡车去的，上五台山，又下山，在山下一个村庄里开了会，总司令讲了话。回来时带了战利品，经五台山原路，在豆村碰到阎锡山，他垫着羊皮骑毛驴。总司令和他席羊皮而坐谈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卫立煌部队在忻口，被日寇包围，我们替他解围，他很感激我们。这次战斗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彭总到忻口会见了他们。

不久，八路军总部离开五台。在途中，过寿阳时碰到敌机轰炸，看到败退下来的四川军队乘机抢老百姓的东西。太原失守后，卫立煌到临汾，阎锡山到土门。我们在洪洞、赵城之间的高公村过年，以后搬到马牧村。在马牧村，我们住在一个大地主的房子里。

过年后，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军队是军长以上参加，我们则是师长以上参加。总司令、彭总和三个师长参加了，黄天祥（前总保卫部科长）和我当保卫也跟着去。我们同卫立煌、阎锡山和国民党的军官们同坐一列专用列车去的。在火车上，我们两人怕花钱，从下午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有吃饭（其实在那专用列车上吃饭不要花钱）。到洛阳时，白崇禧等人来接。总司令带着一把缴获日寇的指挥剑和一头军犬（徐海东同志送的战利品）。白崇禧上火车来接总司令时，彭总就把总司令带的指挥剑送给他。黄天祥同志不了解情况，说他为什么把总司令的指挥剑拿走了。彭总马上转过脸来看黄一下，黄也就明白过来了。总司令的军犬很忠实，能够完成许多任务，后来也把这头军犬送给了何应钦。

在洛阳，蒋介石的驻处有几重卫兵把守，只放总司令等首长进去，却把黄和我两人送到俱乐部去。国民党的副官、秘书等也都送到俱乐部。他们也说怪话：“蒋委员长把我们当汉奸，不让进去。”我们两人很着急，担心总司令他们的安全。黄天祥同志说：“我们去了解了解情况。”了解以后，知道要通过四重卫兵才能见到蒋介石的卫侍长。我们不管那些，就闯进去要见蒋介石的卫侍长，我们通过四重卫兵找到了他。他看见我们进来，就给我们打招呼，把我们送到休息室，并说你们的总司令正在和蒋委员长谈话。我们没有见到总司令很不放心，黄就一直往里走，看到房子里挂着总司令的大衣，就问：“总司令在哪？”蒋的卫侍长说：“你们的总司令正在吃饭，坐第一席。”黄走进去看，总司令在那里吃饭，蒋介石也在那里，这才放了心。

洛阳会议后，我们回到马牧村以后几次到过临汾，住在办事处，总

司令在临汾会见过卫立煌。后来又上土门看过阎锡山。以后，我们回到马牧村。

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敌人分几路进犯临汾。我们从马牧村出发到屯留，本来打算在安泽宿营。但一到安泽，前面就碰上敌人，打响了，来个遭遇战。我们的警卫营刘鹏同志只带着一个连，而敌人却有一两千人。总司令叫我们立刻转到安泽东边的山沟里，叫左权、魏国英同志和我等几个人去侦察敌人。那里是一层层梯田，有的梯田漏水成为洞穴，我们就蹲在洞里用望远镜观察，总司令则在山后头。我们看到敌人离安泽街口只有三四里路，我们少数部队在山头上，敌人在公路上，但不进城，只用炮轰，先打安泽城，后打我们对面山头的游击队，最后打我们的山头，打完后就搜索前进。敌人一进安泽就放火烧房子，火光冲天，照得我们满脸通红。

这时，左权同志说：“我们回司令部吧。”说罢，他就带着我们回司令部。总司令正在司令部看电报、文件，我们向总司令汇报后，总司令说：“还要打一仗！”他就叫左权同志去指挥在安泽南边的新军决死队的几个旅去抗击敌人。那天上午八九点钟，左权同志带着我、魏国英和一个骑兵班不到二十人从山上下来。我们刚下到右侧的小山坡下一块麦地，碰到一个老百姓，正问了几句话时，就发现敌人向我们来了。那个老百姓喊一声：“敌人！”左权同志就马上说：“打，冲上去！”敌人很多，整条公路都是。我们就卧倒打他们。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就往后退。后来他们发现我们只几条枪打，就反扑过来追击。我们骑上受惊的马就走，刚跑上一座小山，敌机就飞到我们的上空侦察，因为敌人的通讯联络比我们好，敌人发现我们后就马上派飞机来侦察。敌人判断我们不是大部队，没有理会我们，就继续前进。

左权同志和我们商量，决定从山间小路去找那几个旅，和山下公路的敌人平行着走。我们走了二三十里路以后，在山头上找到那几个旅的指挥部。我们喊话：“我们是八路军。”他们看到我们有的穿着日本大衣，就说我们是假八路。左权同志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他们不接，还开枪打穿了送信人的马鞍，好在没有伤人。后来和一个旅接上

了头，但另一个旅仍未接上，他们又打我们。最后还是接上了头，但决死队是支新军，不能打，只往后撤，指挥员也指挥不动，兵都散了。我们到达山的最南边，住了一夜，敌人在我们住的山脚下的一个大村子宿营，又是放火烧房子又是打炮，搞了一整夜。第二天晚上，我们回到司令部向总司令汇报，总司令决定第二天出发，经沁县到小东岭，到小东岭住了多久，记不得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临汾失守后，阎锡山过了黄河，卫立煌经延安到西安。

卫立煌走后，他把七个师（包括朱怀冰师）交给总司令指挥。敌占风陵渡后，总司令把他们师长以上的军官找来开会，对他们做工作，讲形势，讲敌后抗战意义，拉住他们，不让他们跑掉。名为开会，实则做政治工作。开了十来天会，总司令、彭总和左权同志轮流讲，这次会议对坚定他们的信心，留下来抵抗敌人，搞好统战关系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在第一次闹磨擦之前，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彼此来往的电报很密切。

后来，朱怀冰去见蒋介石，路过八路军总部。可能是在一九四〇年春，他回来后，又到总部里来，就向我们要地盘了。总司令严肃地对他说：“你不顾民族大义，我们就消灭你！”他回去后调动军队来打我们，总司令也就调动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八路军进行反击，把他们打得全军覆灭。但为了统战抗日，总司令决定让出一条路来，放他走了。我们打败朱怀冰后，胡公勉来见总司令，名为拜访，实为威胁。他带着手枪来，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为什么打朱怀冰，总司令坚决予以驳斥。

那时，卫立煌同我们的关系比较好。总司令很重视统战工作，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夏秋或一九三九年初曾三次会见过卫立煌。一次在临汾，一次在黄河北边的核桃庄，在卫立煌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另一次是在洛阳。那时卫立煌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总司令则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给他讲抗战形势，讲八路军的战略思想，讲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扩大游击战，扩大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总司令还对阎锡山和国民党其他将领做统战工作。

我们住在北庄和龙泉山时，和鹿钟麟进行过斗争。原来总司令决定由彭总去和鹿钟麟谈判，那时我们从程潜的高级参谋刘古风和他的秘书那里了解到程潜（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给鹿钟麟写过密信，还有密码，但搞不到手。我去离司令部二三十里路的地方接刘古风等人，他们下了马，把皮包挂在马鞍上。马是我们的，我们把马拉去喂了，我把皮包立刻送到作战室，将密信、密码抄下来后又挂回马鞍上。这样，我们就知道鹿钟麟的底细了。我们要建立根据地，而他却要抢地盘，还说什么地区原来是他们的。我们就不和他谈判。彭总转了几圈，借口找不到他，不和他谈。后来他老告我们的状，说我们占了他哪些哪些地方。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敌人对我们进行九路围攻，形势很紧张。那时八路军总部身边没有部队，只有一个排。我们行军到漳河边时，敌人已经占领沁县。漳河正在猛涨，过不去，部队联络不上。河边是孤零零的一座山，山的周围三面三十里外都是敌人，一面临水，我们过不了河就很危险。这时总司令披着雨衣，多次在河边亲自察看水势，便决定让会游泳的孙泱同志先游过去。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孙泱同志把信装在水壶里游过去后，正对岸拉了一根大绳。总司令一手抓住绳子，一手抓住马尾巴，才过了河。过河后，我们同部队联系上了。

以上是我想起的总司令在太行山时的一些情况。

第九章

延安岁月



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①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七一八团陈、熊^②两同志转七一七团陈、晏^③及生产委员会：

你们两团的生产有成绩，有了基础，望你们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你们要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但解决了目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也为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来即是国家一部分优良的产业。

目前你们的农业生产将告结束（指开荒），你们应当乘此机会，建立起下边这些事业来：

一、畜牧业——养鸡、养鸭、养猪、养犬、养鹅、养兔、养牛、养马、养驴等，这些东西可由少到多，由无到有，不可忽视。

二、运输业——将牲口集中起来，组织大规模的运输队，到定边驮盐下来，或驮土货到上边去卖。要多做大车，利用临镇至延安的大车路贩运货物，能做到每天都有到延安的大车就好了。大路两边应多修骡马大店，堆粮、堆草，运草、运菜来延安。

三、手工业——建设手工厂、木厂、铁厂、农具厂、编物厂、食品厂、酱菜厂等。多做多开，不可大开，惟大车厂要大大的开。今年要做大车五百辆至一千辆，卖给边区军、政、民，以发展运输。如铁

① 一九四〇年五月，朱德从华北前线回延安后，为了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支持抗日战争，竭力提倡“军垦屯田”，并亲自到南泥湾踏勘，组织指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这是他写给南泥湾开垦部队的一封信。

② 陈、熊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和代政治委员熊晃。

③ 陈、晏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代团长陈外欧和政治委员晏福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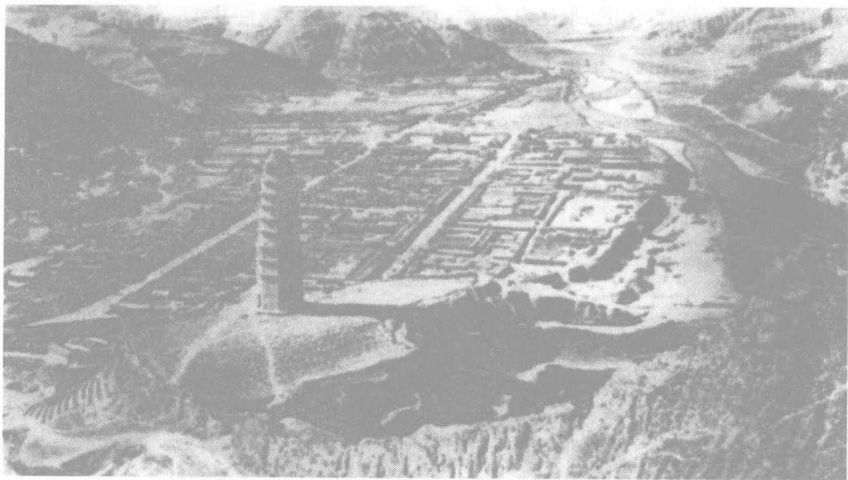
不够，可到山西招贤镇大大的订购，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大车工人，大车要做得很好，将来全边区都要用你们的大车。如你们能做，延安可来订购，先订合同，先交一部分款子。

四、商业——商业要做，但不可大做，能和你们的农业、工业、运输业配合起来就行了。不可投机取巧，把资本放到不可靠的方面去。最好运土货到延安换取必需品，以物易物最为适宜。土货以药材为主，可发动军队和老百姓去开采。盐店是主要的，但不可看利太重。饭店、酒店、豆腐店可附带的去开。运输生意可大做，没有运输即没有生意可做。做生意你们七、八两团要配合一致；不可互相冲突，与军委系统也要配合起来。对边区，整个商业要有政策，不可看小利而失大利，眼光要大，组织要严密、统一。

以上四项，是目前农闲时要抓紧的工作。目前边区军事一时尚不吃紧（但毋松劲），望你们在生产运动中建立起永久的基础，这是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

你们每月应有生产总结，除向旅部做报告外，并应直接向我们做书面的或口头的系统报告。我们最近设有财政经济部，有系统地来指导你们，要与它密切联系，对你们是很有帮助的。

纪律问题要严格遵守，办事人不准贪污腐化，不准在法律外去求赚钱。



革命圣地延安



朱德与农民兄弟亲切交谈

你们建立的家务，虽然是你们经营的，同时也是国家经营的。我们是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这样才能“共产”啊！不要忘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只求自给自足，结果就会走到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去，那是走不通的。望你们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这才是正确的，才有前途。望你们正确地执行。

此信应在生产小组中讨论。

此致布礼并祝你们胜利！

朱 德
于延安

给女儿朱敏的信^①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好。朱琦^②已在做事。高洁^③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 德

康克清^④

1943，28/10 于延安

① 一九四一年三月，朱德的女儿朱敏入苏联国际儿童院。苏德战争爆发后，一九四三年八月朱敏同国际儿童院的部分儿童被纳粹德国送到法西斯集中营做苦工。德国投降后，一九四五年七月他们回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当时朱德不知道朱敏的行踪。这封信在国际邮路上遭受战火的阻拦，在边境线停留了一个多月，最后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退回到朱德手里，由康克清默默地收起来。直到一九五一年夏天，朱敏从莫斯科放假回到朱德身边，才看见这封被封存了八年的信。此信根据朱德手稿刊印。

② 朱德的儿子。

③ 即贺高洁，朱敏的表姐。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学习。

④ 朱德的夫人。

回忆母亲^①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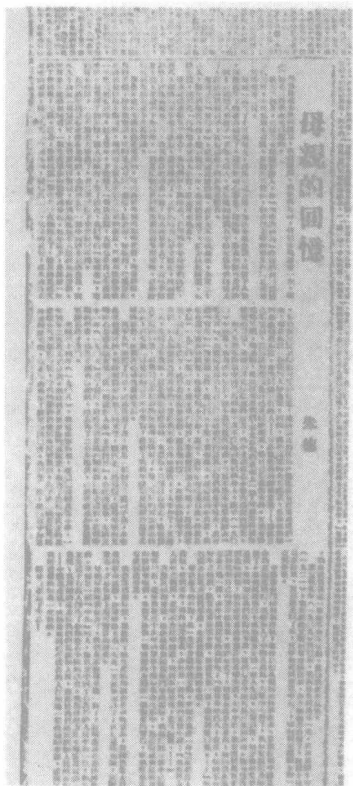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

① 这是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由朱德撰写的《母亲的回忆》一文的节选。

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朱德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母亲的回忆》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年）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

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①和同盟会^②。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

① 新军，指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

② 同盟会，指一九〇五年八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一九一二年八月改组为国民党。

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关于建设迫击炮 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①

八月一日，炮校^②开学典礼，我们^③看了迫炮实弹射击与赵章成^④同志所提意见，我们均有此感想写在下面：

一、现在与敌、伪、顽战斗时，经常遇到碉堡及运动战中的临时土工作业，我军往往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二、现时，近一年内的阶段，应做到在每团配属一迫炮连、小团一迫炮排之编制，以便应付当前之敌。

三、各级首长，应组织炮队，作为组织现阶段的军队的初步条件，将来以迫炮作基础，转到各种炮的组成。

四、要组织炮队，必先决定我们前后方的兵工厂的性质。我意，目前兵工厂其实是修械厂、子弹厂，应以修理各种炮及机枪步枪等并多造迫炮弹为宜。如能多造，可解决打碉堡问题。

以上意见及赵同志的意见，请你们阅，提供意见，以便讨论一次，做一决定执行。

①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朱德同志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

② 延安炮兵学校。

③ 参加炮校开学典礼的朱德、叶剑英、萧劲光等。

④ 当时任延安联防司令部炮兵主任并在炮校迫击炮科工作。

【附】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两次发言^①

一、一九四三年九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朱老总总结了在党领导下革命近二十年来的经历，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的错误，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老总还比较了新旧陈独秀主义的异同，指出：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相同点是，（1）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2）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4）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5）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两者的不同点，朱老总认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

① 摘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二、一九四三年十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朱老总发言主要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通过学习，客观地看那些文件，有些问题也容易搞通。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在上次九月九日的发言中，朱老总回顾自己的历史曾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这次发言，朱老总又继续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附】

周恩来为朱德六十寿辰的贺词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亲爱的总司令，你六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在朱德六十寿辰的庆祝会上

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人民祝你长寿！全党祝你永康！

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①

亲爱的艾·史沫特莱女士：

你一九四五年十月由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的代表团的成员）同志转来的信，已于去年年底收到。周扬（一九〇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六年邀请他赴美讲学，因国民党政府阻挠未能成行）同志将去美国，所以我借此机会给你去信。

首先，对你和所有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寄予的关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须表示深切的感谢。自今年一月以来，中国在一个短时期内赢得了普遍的和平并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的美国朋友的努力。美国的民主活动大大地加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使他们坚决相信这一友谊的无限发展。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虽然遭到了中国反动派（在美国反动派的怂恿和合作下）的破坏，然而我和所有同志都坚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反动派的阴谋，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终将为中国人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所击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从各方面巩固力量，以便粉碎反动集团的阴谋，而反动集团的困难和危机却在日益增加。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你重返

① 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朱德给美国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艾·史沫特莱的回信。

中国的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看到中国某些地方的暂时的黑暗而感到失望。请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同样，我也相信美国人民。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正注视着美国的民主党派的团结和发展。美国的反动势力诚然比中国的反动势力强大，它们企图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它们既不能为美国也不能为其他国家带来任何光明的前景。因此，它们阻止中国 and 所有国家人民的反抗是徒劳的。这是它们的致命点。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的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一九一六年生，北京人。当时是《新华日报》记者）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我们在延安均好。周恩来同志及其夫人、董必武同志和章汉夫（一九〇六—一九七二，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工委书记，编辑《群众》周刊，并筹备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同志仍在南京。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一九一〇年生，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一九三三年来到中国上海从事医疗工作。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一九五〇年加入中国国籍）博士现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①。请向美国朋友伊·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美国军事观察员身份到过延安）上尉、埃·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

① 是根据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停战协定建立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英国代表各一人组成，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以实现停战协定。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美方仍供给国民党军队大量军火、作战物资，继续运送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让国民党放手发动内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随之结束。

访问。一九七二年在瑞士病逝。遵照他的遗嘱，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著有《西行漫记》等书）先生、冈·斯坦（是一九四四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先生、哈·福尔曼（是一九四四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先生及伊·爱泼斯坦（一九一五年生，曾是美国记者。一九四四年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过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一九七九年起任该刊总编辑。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国籍。著有《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等书）先生转达我的最良好的问候。请转达我对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英国职业军人，曾任美国驻华武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一九四四年被美国政府召回。后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军军长等职）将军的最良好的祝愿，中国人民都会记住史迪威将军所作的正义努力。我对你的朋友阿内斯女士表示非常感谢。丁玲（一九〇四—一九八六，湖南临澧人，作家。当时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史沫特莱曾邀请她去美国写作）准备出国参加巴黎国际妇女会议^①，不能应邀去美国。不过，丁玲和邓颖超（一九〇四—一九九二，原籍河南，生于广西南宁。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志都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因此在目前也不会有访问美国的机会。周扬同志对延安和我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他将同你当面详谈，尽管他这次不是直接从延安动身出国旅行。

朱 德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① 指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解放区妇女组织派邓颖超赴会，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

我相信可以亲自 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❶

中国人民很早就干革命，前仆后继，但屡次遇见的革命伙伴就往往不大靠得住，比如那些假装革命而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人们，每次在获得革命果实后，却反转来镇压革命，致屡次失败，人民屡次上当。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时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虽然已六十岁，但帝国主义的年纪却比我大得多哩！他们还能活多久？反动派一定失败，中国人民一定胜利。中国一般人活到六十岁就算够本了，以后我就是赚的了。我相信可以亲自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❶ 这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延安干部祝贺他六十寿辰晚上讲话的节录。

第十章

走向胜利



关于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报告^①

中央：

我们到此已经一个月零七天，尚未向你们作系统的报告，现将军事方面的初步处理向你们报告，土地改革及财经另报。

我们于五月三号到平山属的封城与聂、萧、罗（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指萧克，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会面，商定由聂召集纵队一级的会议一次，旅级的会议一次，团级的会议一次，均以此此次南线战役^②为中心，作了较有自我批评的检讨。最后也召集了中央局的几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与个别谈话中，我们认识的状况如下：

（一）纵队与旅一级干部全是长征干部，各方面军都有，一军团^③的较多，政治干部有少数是抗战时期的，惟负担过重；团级营级老干部少，抗战时期的干部多；连排级因战斗频繁损失过重，战士中提升的战术指挥较差。战士中成分好，俘虏只占十分之一二，技术已提高，能打村落城市堡垒战，能使用炸药、手榴弹及炮，均很勇敢。

① 这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朱德就晋察冀解放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写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② 这里所说的南线战役指正太战役。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晋察冀野战军向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正太线）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正定、栾城、井陉、娘子关、阳泉、平定、寿阳、孟县等地，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守军。

③ 这里所说的一军团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二) 野战军^①组织头重, 尚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地方军范围, 后方庞大, 出征人员少, 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这种组织不适合于野战军。

(三) 上级指挥不好, 自张家口退出^②后, 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对敌人只是应付的, 军区工作未建立, 野战军也是临时凑成, 也未形成便于作战的主力。

(四) 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 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 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 各自为政, 团以上的各级机关, 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 战时有发洋财的, 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 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 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我们分析以上的状况, 得出这样概念: 部队成分是很好的, 干部也是好的, 有红军传统, 战斗经验多, 技术也相当的好, 惟战术一般的差, 上级指挥, 各级都不满意。我们的处理, 在这几次会议中, 即刻对以上的毛病, 从组织上改变了指挥系统: (1) 改组野战军。(2) 建立军区后勤部。萧克回军区统一指挥军区工作。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兼后勤部长, 黄敬(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委, 统一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 使野战军脱去后方勤务工作, 割去大尾巴, 不做生产, 商店归公。改组野战军, 杨得志(杨得志, 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为野战军司令员, 罗瑞卿为政委, 杨成武(杨成武, 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为第二政委, 统率野战军之三个纵队。已请中央批示。

如此改变, 部队轻快有力, 能灵活使用, 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

① 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于一九四六年九月, 归晋察冀军区领导, 司令员为萧克, 政治委员为罗瑞卿。同年十二月, 野战军司令部与军区机关合并。一九四七年五月重新组建野战军指挥机关。

② 一九四六年九月, 驻北平(今北京)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部队沿平绥路(今京包线)西犯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被晋察冀军区部队阻止于怀来一线。十月七日, 集结于大同、集宁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部队, 乘张家口西北方向我军兵力空虚之际, 以主力由集宁向张家口西北迂回, 并于八日袭占了张北。十一日, 敌军突入张家口, 我军主力回援不及, 遂于当日撤出该城。

增加战斗人员，各级干部均拥护，认为这一改变，一定可以搞好。也经过中央局会议通过，这些组织已分别着手进行改变。罗、杨、杨三个同志是此间优秀的干部，能担负此责任的，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愉快。军区后勤工作的建立，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恐难一时做得好，因为过去军区太庞大、复杂，小家务、各自为政是普遍的现象。虽已决定改组，一定还有许多阻碍，当设法推动进行，以期收得速效。

朱 德

关于军工生产等问题的报告^①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毛主席：

我冬日^②回到阜平军区^③，布置军工生产，主要是炸药。各种炮弹，在技术上能解决，在组织上很差，分散在各军区，现决定统一起来做，原料也多，在半年内，可能大规模出产，七月份迫击炮弹可出五千发，山炮弹可出一百发，以后可多出。过去技术有缺点，炸坏炮，现在纠正了。炸药七月份准备造十万斤，用肥田粉与硝配合而成。此两种原料，救济物资中已得到肥田粉三十多万斤，硝是冀中硷地产品，出产最多，可配这种炸药。将来炸药前途有大希望。炮弹材料现能就地采取，尽可能地扩大，不仅专为晋察冀够用，还应帮助供给各方。又人员补充也布置了一年的计划，约七万人，按月、分地区动员送野战军。现在将中心地区的县大队、游击支队等等，送野战军补充，可以救急。野战军经过青沧^④及徐固^⑤两个战役后，减员很大，员额

① 这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朱德就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人员补充等问题写给毛泽东的报告。

②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

③ 当时军区机关驻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④ 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冀中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青县、沧县（今沧州市）、永清三座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余人，控制了津浦线捷地至陈官屯段七十余公里铁路，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⑤ 又称保北战役，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在保定以北地区进行的一次进攻战役。此役攻克徐水、固城（属定兴），共歼灭国民党八千二百余人。

也不足，每次运动，逃亡也大，过去又怕多补俘虏兵。七月休整中，每团要补足二千以上，俘虏也好。原九个旅中尚缺一个团，现已调一个地方团，共为二十七个团。每在一个军区作战，配上地方军都在十个旅以上。炮兵现已成旅，各种炮都很多，野炮弹还多，其他也不缺。配合炸药，火力是很强的。我提出十个旅在运动战中，争取消灭敌人十个团的兵力，当然是各个击破，但在一个战役中，应敢于与敌人十个团决战，他们向此方向去争取。下次战役，他们拟打石家庄。据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估计，石家庄有条件打下，无城墙，先打下飞机场，援兵不易来，时间较久，可以逐次打开。他们正在准备，如补充顺利，八月可打。我已告他们要充分准备后再进行。如敌人由保定来援，正是雨季，要过几次河。此地群众好，打援更为有利。此间军事工作，经少奇同志两月指导，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尚非易事。财政经济及土地改革更是难解决的事，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军事进行仍是会遇到许多阻碍的。专此向你们报告并问你们好。我鱼日^①回到工委^②，参加土地会议^③，候毕后，再去看野战军打石家庄。

朱 德

① 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

②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村以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

③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的信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

毛主席、恩来、弼时^①、定一^②、德怀^③诸同志：

土地会议后，在今年十一、十二月间，最好召集几个会议：第一是兵工会议；其次是参谋会议，二局、三局^④的会议；再其次是交通运输会议，就是大车会议亦必须开。因将来大军反攻时，最重要的补充是炮弹、炸药的大批补充，同时也是运输的重要。现在各地交通被破坏，已很难修复，虽中央下了命令停止破坏铁路的行动^⑤，但战术上的要求仍须破坏。组织运输工具，仅太行有一小型运输公司，除东北有铁道五千公里尚在行驶外，其他地方全靠人力与大车，运粮、运弹与伤兵的后送是越来越困难。我们应该早注意组织及召集这样会议。兵工会议，是迫切必须的。各地均有大小规模的工厂，技术问题许多地方尚不能解决，有些地方条件很好应多办，有些地方可少办。交流经验教训，技术的解决，均须从速，应召集此会议。参谋会议能交流战术、技术上之新发现，及将来反攻所遇到的新情况，应加以考虑，早为准备。二局、三局系统较专，现发展很多，各自为政，如不及早统

① 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直属支队司令员。

②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直属支队政治委员。

③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负责指挥西北野战兵团。

④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二局、第三局。

⑤ 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共中央局和战略区领导人的电报。这个电报指示各地：“除局部性的战术性破坏外，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

一，将来有被泄密之各种危险。我意在华北及东北交通便利条件下，可召集这些会议。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会后可不回三交^①。在工委指导下召集这些会议，对反攻是有大帮助的，请你们批准。

晋察冀工作，这三月来已有转变，前已电呈。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约可得一万补充兵，大部是俘虏。地方动员因土改不彻底，难动员来，来了也跑得快，因



解放战争时期的朱德

此充实兵员是一大困难。已注意将后方向前线挤，后勤已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有大进步，并有大希望，机器、原料及人工均不缺乏，本月整理后生产力增加一倍以上，前说迫击炮弹能产五千，现整理后七月能产一万八千颗。野炮弹、山炮弹均能生产，技术上已解决。如大规模生产，经济感觉困难，现预算十八万石小米^②，将来如加大，须增加一倍至二倍时，预算亦必增加。我与董老（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商量，决心将此兵工厂现有机器及人力物力，尽量使用，多余炮弹、炸药可供各根据地前线使用。经济不够，可由董老设法调剂。除炮弹、炸药外，各种子弹、棉花、药亦能造。

最近，野战军进行青沧战役及徐固战役后，引起敌人大集中。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即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部开来两师：一〇一师、骑四师，十六军全部到冀，十三军的第四师也来北平。敌在平、津、保三角地带^③“扫荡”，并来冀中。野战军正在休息补充中，

① 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当时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驻于此地。叶剑英任后委书记。

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市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

③ 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城市之间的地区。

有很好的运动战的机会，也不能打，只得补充足、整理好。以十个旅打击敌人十个团的计划来进行教育为目的。好好打一次十个团的歼灭战，此间敌人就能大转变，转到只能守，成为被动。这是很有可能的。野战军技术是提高了，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整顿队伍还好，惟组织队伍、巩固部队尚差。因此，两个战役中间不能不要求休息。但是锐气很好，将来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队伍。将来可以再编成一个纵队，加入野战军。现已整编七个地方独立旅，均有老底子的，可抽三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四个纵队就更好使用了。

我往冀中月余。该地人力、物力尚富，如将土改搞好，农民大翻身，将来可为支援各解放区的策源地，如东北出军，当以冀东、冀中为供给地。在冀东、冀中两地打好好几个大仗，消灭蒋、傅（蒋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傅指傅作义部察绥军队）主力于此地，比消灭其于察热^①地带为有利，因是在主要根据地中，群众条件好，供给容易，我之交通运输容易，各种重炮均能使用。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可能寻求机动战，应在结冰时，在北宁路^②秦皇岛、唐山等地，攻其所必救。如在此打好了仗，对傅之察热的进攻容易。那时将配合内蒙、热河的骑兵，袭扰傅之绥远^③五原的大后方，作不断的袭扰，截断平绥路^④成为数段，再用大兵各个歼灭之。据杨得志（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说，不要轻视傅作义，他有两手，能进能退，能攻能守，能空、骑、步、炮配合使用，就是他的长处。如分散他，他的战斗力并不很强。这个话是对的，我们应注意。如进行战役，当在明年春后为宜。

各解放区野战军反攻时，应特别注意组织后方运输补给，尽管是些微小的补充（大部由前线解决），也是必须的。现时敌人处处有碉堡，

① 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② 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辽宁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③ 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④ 北平（今北京）至绥远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应有炮随行，自然成为重兵，才能顺利克服碉堡的困难。

此间将来能为前线补充的，一是大批干部，拟抽调一万个干部，训练一时期，逐次应各方之请求，给予之；二是炸药、炮弹，将来也能供给。我们向这两方面努力，帮助前线。现邮政各区都办得不坏，一般的通信及书报可经过邮线通邮。

朱 德

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 等地后的信^①

土地会议后，我到野司、冀中，再由石家庄回到工委^②。兹将经过及所见报告你们。

野司所属二、三、四纵队，经整理后，内部团结，朝气蓬勃。大清河北战役^③时想打一个大仗，遇着“啃”堡垒，围敌太多，结果只一二处打下，其余只得撤离。徐水未打下，敌第三军来援，给我们造成了打运动战的机会。此时我军一面支持徐水作战，使北来敌人不能南援，我大部南下，围歼三军军部及第七师于清风店^④，此战开创了晋察冀部队打歼灭战的好例。接着再打石家庄，又得胜利，士气更旺。我军前后虽然也有一定伤亡，但士气未损。

① 这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朱德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

②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由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它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③ 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平津保三角地区大清河以北进行的一次战役。

④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以围城打援的方法，在河北定县清风店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向保定以北出击，围攻徐水，诱敌增援，接着该军主力一部与北面南下的援敌在徐水、容城之间形成对峙。蒋介石急令驻守石家庄的第三军主力北进，妄图夹击晋察冀野战军于徐水地区。十八日，晋察冀野战军以四个旅继续阻击北线援敌，集中主力六个旅兼程南下，二十日凌晨，将南线的援敌一举包围在清风店地区。二十二日，全歼该敌，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等。此役南北两线共歼敌二万一千余人，是晋察冀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这几个战役中，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但一般干部仍不爱学习战术，只凭老习惯去打，乃是一大缺点。此次攻石家庄以前，在安国曾号召以学习攻城战为主，上下级干部均先开学习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在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是战士群策群力，人自为战，取得了胜利。

我在石家庄战役胜利后，又到野司，总结了经验教训，另纸附上，惜未完全写好。我已托杨得志（湖南株洲人，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同志将我收集的材料加以补充，写成一小册子，以作我军将来攻城之用。虽不完全通用，只要具备相同或类似条件，是可以攻坚城的。最近野战军更为发展，新编了一个第六纵队。野司指挥部亦形成有力的指挥。

关于攻城战，非一朝一夕所能准备好的，但只要准备充分，则没有打不下的。在中国说来，敌人的城防工事设备，仍是无法做得极坚固的。

兵员补充，土改后已不感缺乏。解放战士经过诉苦运动，阶级觉悟易提高，大多数很顶用。

兵工会议正开，山东、太行、晋绥及本地代表均到齐。尽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议好怎样使明年作战能有更多更好的兵工产品，作为野战军攻坚之用。最近石家庄、元氏攻坚之经验，以手榴弹为主，炸药及炮弹助之，三者充分配合，充分准备，数量很多，足用，则坚可下。明年兵工生产可望进一步发展。

我到冀中军区、区党委驻地约半月余，同张云逸（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广东文昌人。解放战争开始后，曾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同志会面，了解山东情形，那边情形由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解放战争开始后，曾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志来你处谈，不另报。现将冀中情形报告于下：

我军解放张家口^❶后，工人运动走错了路，工人发双薪，工人工

❶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冀察部队收复被日伪占领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市。

资以养活四口人为准，因此遗祸于现在。工资过高，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又坏，成本又高。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河间有一面粉厂，新式的，每一昼夜能磨九百袋面粉。熟练工人吃小灶，一般工人吃中灶，办事人员吃大灶，工人工资最高的是一月六七百斤小米，形成工人同管理人员对立。我当面与职工会负责人谈，这是自杀政策。我对他们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大家只要能勉强生活，就要拼命做事。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只顾自己改善生活，不顾战争，不顾大局，以致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这是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问此种现象能否迅速转变，他们说是可以转变的。我到石家庄后，发现我们工会同志又来了一套，立即纠正过来。现在暂定工人每人每日发救济米五斤，最高工资每月每人不超过二百斤。这样将来工业才有发展余地，工人才不致失业。我建议中央派得力的人做工人运动，好好地领导工人群众参加战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家务，真正实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

我把功劳往下面推^①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

搞好团结,要依靠批评与自我批评,过去有些同志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批评,就受不了,这是要不得的。要知道,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不叫错误了。如果有错误不承认,不去改正,乃是错上加错。另外,有些同志还有个人英雄主义,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很了不起,要党迁就他。其实,你的功劳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靠党和群众的力量?仗是战士们打的,他们英勇牺牲,你就把功劳挂在你一个人账上,这怎么要得?比如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这是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去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我们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革命英雄主义。全军二百几十万人里面,真正的英雄是很多的。在群众中广泛地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个人英雄主义就少了,内部就可以团结起来。能够做到这一步,什么“老资格”、“英雄”的包袱就可以丢掉,受不起批评、怏气等毛病就可以克服。每个同志都要加强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养成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品德。希望大家努力这样去做。

① 本篇节选自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八月版《朱德选集》中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一文,是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①

我看了李、黄两纵队^②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

(一) 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

(二) 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

(三) 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

(四) 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的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

(五) 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

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可能有投诚的。

(六) 李纵攻过四平^③，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

① 这是一九四八年六月三日朱德写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信。当日，毛泽东就长春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请他们回答朱德提出的问题。

② 李、黄两纵队指李天佑、黄永胜分任司令员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

③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在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统一指挥下包围四平，十二日发起总攻，十三日全歼守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二万余人。

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但损失代价须大。

（七）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

（八）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它，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

（九）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❶。

❶ 一九四八年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打击下，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同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军对长春调整部署，决定改强攻为久困长围。当年十月十五日，我军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队全线动摇。十七日，驻守长春的敌第一兵团所部第六十军宣布起义。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敌新编第七军和第一兵团等部先后放下武器向我投诚，长春宣告解放。

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 会上的四次讲话

(一九四八年八月至十一月)

一、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一) 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汉楚相争^① 刘邦与项羽的决战即在中原。韩信将兵所以能“多多益善”，就是因为那里人口众多，地区广大。

(二) 今年(解放战争第三年)战争的第一个月(七月)已取得很大胜利。八月快要完了，还剩下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能解决傅作义^②，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实行毛主席的指示，将战争继续引向蒋管区。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

① 刘邦和项羽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战争。公元前二〇六年，秦王朝灭亡。汉王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之间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部下将领韩信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之战中彻底击败项羽，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

②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匪”总司令。

(三)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①、开封、兖州等城市。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这点,美蒋对我们都估计不足。太原、济南是可以打下来的。

(四)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五)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得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方面的问题也都解决得差不多了。今后就要着重解决“把生产提高一寸”的问题。这点每一个人都有份,都要努力去做,争取成功。

二、十月一日的讲话

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它们消灭。长春敌人可能逃跑,但我们有八个机动师能够消灭它们。

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还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

胡宗南^②有二十多万人,比我西北野战军大,一时消灭不了他,时间要放慢些。

^① 旧县名,今山东省潍坊市。

^② 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打下济南^①，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吴化文^②的起义，我们不能过低估计，对我们打下济南起了相当作用。今后的作战，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起义。当然吴化文即使不起义，我们同样可以打下济南。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

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因为中原粮食富足，地势平坦，便于大兵团的作战。在该区我之有利条件为：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敌人的兵工生产不如我们，它们主要靠美国帮助。

这次打下济南缴获炸药很多，对我们有很大用处。冀中每年可产一千多万斤硝，可做炸药。炸药，敌人不敢使用，怕炸死自己，而对我们却能起很大作用，它比炮厉害得多。

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浪费，现在仍然组织得不够理想。这在内线作战时还没有多大关系，而在外线作战时则关系很大。所以今后要把我们的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现在是六个人抬一副担架，如果组织得好，两个人即可，可以节省运输力。

现在打仗，人的思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是那样坚决，所以需要思想上进行教育。当然，除了靠我们的机动部队外，还是需要

①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经八昼夜连续作战，于二十四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十万余人（内有一个军二万余人起义），生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② 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九月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③ 指由此三人分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第七、第十三兵团。

各地方的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另外，解放战士占我军的比例很大，以后对解放战士要加强教育，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①，这是美国人替它们制定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

三、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关于东北问题，美国人曾叫蒋介石撤出东北，不要孤守待毙。蒋介石虽然也看到了这个形势，但反动统治阶级临死也还要做最后挣扎，不愿撤出。现在打下锦州^②，他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敌人曾尽了最大的力量来守，但还是失败了。现在我们有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长春敌人也想趁这时撤退，但锦州我们很快就打下来了，力量即可以抽出，因此敌人不容易撤退。蒋介石的战略现在有所改变，他放弃若干孤立据点，这是在我们攻下济南以后才改变的。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傅作义主要还是靠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十六军等^③，而他自己的则不行。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他最怕的是我们搞他的张家口。绥远也是他重要的后方，而北宁线则不是他所需的。所以现在他的力量放在西面。但蒋介石的战略是要保住北平、天津，不愿傅作义的主力继续往西进。

① 对国民党军一九四八年秋制定的一个作战计划的概括。当时国民党军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在华中、华东、豫陕战场集结六十五个整编师（军）上百万兵力，企图保持住徐州、汉口、西安之间的三角地区；陇海路全线、津浦路兖州至清口段、平汉线郑州至汉口段、宝鸡至成都公路四条边；以及开封、郑州、济南、商丘、南阳、襄樊、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十三个重要据点。

②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十月十五日，攻克了锦州，彻底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退往关内的通路。

③ 当时驻守在北平、天津一带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即使一下打不开，长期围困，饿也把敌人饿死^①。我们打太原的部队，除了太岳军区的八纵以外，其他都是刚编成的新部队，所以在战术上、攻坚技术上不那么熟练。但这样的部队，能打这么大的城市也不简单。

彭总（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那里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对他那边目前不能多增兵，因为多了也没有饭吃。如果太原打下，彭绍辉（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纵队可以调过去。

山东问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青岛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所注意的战略要点。我们现在不去打它^②，因为有美国军队在那里，等到将来再集中力量去打它。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许、谭〔许指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二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谭指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

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他撤出孤立城市对我们也有利，这样我们的后方可以更加巩固。美国叫他撤到长江以南，如果他照办，将二百万部队放在一块，对我们也比较麻烦。

① 一九四八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发起太原战役，将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压缩包围于太原城内。在经过长达半年的围困和不断打击之后，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整个战役歼灭了敌太原绥靖公署及所属第十、第十五兵团等部共计十三万五千余人。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青岛登陆。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四海军第七舰队移泊于青岛，六月宣布与驻青岛的国民党军队实行联防。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关于青岛海军基地的秘密协定，承认美军长久占据青岛的既成事实。一九四九年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军撤离了青岛。六月二日，青岛解放。

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好好学习，把书本上的与实际的对照一下，看一看对不对。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今年补充的人员经过训练，比过去强。打下一些城市后，也补充一些人员。现在有十万俘虏补充到我们的部队，所以这几个月的工作要着力把俘虏教育好。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再一方面加强政治工作，反对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各自为政等现象。

过去对接收城市无经验，现在则不同了，能掌握政策，有经验了。过去石家庄解放了两个月，商店还不敢开门，而济南解放后，一个星期即开业。敌人现在丢一处地方即无法恢复。我们要加紧准备工作，迎接突变——敌人垮台。

四、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讲话

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①，平津决战^②也即将开始。

徐州从历史上就是进行决战的古战场，地势宽阔，人口稠密，大军有饭吃，有房住。现在我集中华东野战军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纵队，加上两广、特种兵、鲁中南、渤海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共十七个纵队，再加中原刘邓（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兼中原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中原

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多万人参加，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属连云港市），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开城区），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即淮海战役）。此役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下的五十六个师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

② 即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等部参加，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今北京）、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此役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军区政治委员)的六个纵队,在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①,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弹药我准备了八个基数^②。这些就是我们同敌人进行决战的物质基础。刘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的指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不像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剿匪”总司令)那样狡猾会逃跑。刘峙原估计我们从徐州西面打他,结果我们从东面打,他发觉后已经迟了,慌忙改变原来的部署。冯治安部的起义^③,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对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把部署调整好的。所以冯部起义正适合时机,是我们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在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原想能把邱清泉兵团引出徐州来,所以我阻援部队有意后撤了一点。刘峙以为我们要跑,叫下面追,但下面不敢追。中央社也催。但邱部的后尾始终不离徐州,尽管眼看着黄兵团被歼。不过邱、李兵团在我预定的阻击下损失也不小。现徐州集中了邱、李、孙三个兵团^④不易打。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⑤。黄维资格老,但指挥并不怎样高明。比较高明的是白崇禧,他看到要打败仗不肯来。黄维兵团来路远,走得急,过河多,受我游击队袭扰,辎重掉在后面路上,汽车没有油,机械化反成灾害。他情况不明,根本不晓得我刘邓部队在哪里,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有群众基础。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他没有强固阵地依托(黄百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点亏)。他原来的前进方向是徐州,我们从侧翼打他,他向东与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当时任国民

① 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共计六十多万人。战役初期,国民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所辖部队约六十万人,数量上略少于人民解放军。后来,蒋介石为挽救徐州危局又从其他地区调集部队增援淮海战场,前后共动用兵约八十余万人。

② 弹药基数。它是计算各种武器装备弹药数量的一种单位。

③ 冯治安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冯部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率领第三绥靖区部队在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

④ 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分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团。

⑤ 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党政府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官)靠不上,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李延年、刘汝明是否北上?我们希望他们来,不过他们的劲头不大,其中从东北撤回来的部队情绪



朱德在石家庄战役前视察炮兵旅

不高。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他们没有粮吃,没有援兵。

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如果逃跑,塘沽是个冻港,海上的路走不通;如从陆上顺平汉、津浦铁路^①南撤,那样时间既长,而且我解放区的群众都是有组织的,虽然不能全部消灭他的部队,至少也要使他受到很大的损失。到那时我东北大军势必跟踪猛追,我南面的部队还可以截击。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傅作义过去守涿州^②出过名,东北军没有把它打开。他又看到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暂时守住了太原,于是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也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消灭了徐州的敌人及傅作义、阎锡山部后,留下的还有马鸿逵(西北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省政府主席)、马步芳(西北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青海省政府主席)和胡宗南部。我西北野战军力量较小,今后

① 平汉铁路指北平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铁路指天津至浦口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② 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的涿州之战。当时阎锡山的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阎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指挥所部出击京汉(北京至汉口)、京绥(北京至包头)铁路沿线的奉系军队。阎部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部袭占涿州,截断了奉军的京汉线交通,并在奉军优势兵力的猛烈围攻下孤军坚守达三个月之久。

西北方面再增加一点兵力，求得把胡宗南部消灭在陕西，如他退到四川就比较费事。我大军入川必须有良好的供应线。不去不行，扫帚不到的地方灰尘不掉。另外，白崇禧的桂系军队缩回广西也比较麻烦。至于蒋介石的部队倒无须顾虑，顶多只能再到广东去重建家务。

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不要因胜利冲昏头脑而看不到困难。

【附】

亲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①

一九四七年，正太战役胜利结束不久，一天，我在阳泉接到中央工委的电报，叫我去行唐县上碑镇。

那时，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同志组成的中央工委来到了晋察冀，他们住在上碑镇。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部址也在那一带。

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登程，前往上碑。

上碑，是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镇子。自从我们部队撤离张家口之后，晋察冀领导机关转移到涞源、完县之后不久也移到这里。聂荣臻司令员在这里部署了许多战役，在这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我到上碑后，首先看到的是聂司令员。聂司令员一见我就说：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找你来，有事和你商量。

随后，我来到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的住处。他们住前后院，朱总司令住在前院，少奇同志住在后院，全是平房。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枝头缀满绿茵茵的嫩叶。前后院很是对称，院子的正中间都铺着一条石子甬道。古朴幽静的深院里散发着农家的气息。

上午，朱总司令找我谈话。当我走到前院，朱总司令的秘书已经为我通报了。不一会儿，朱总司令从室内迎出来，老远就伸出了手。

我向朱总司令敬了个礼，庄重地说：“总司令，您好，好久没见总司令了。”

他笑呵呵地说：“成武同志，你从阳泉前线回来了。”

① 这是杨成武的一篇回忆文章，摘自《回忆朱德》。

“刚刚到。”我说着，跟随朱总司令进到屋里。

他指着靠墙的一张硬木靠背椅，示意我坐下，又叫秘书给我倒水。

朱总司令总是那样，你一见到他，立即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亲切感。他是全军的总司令，是全军的首长，也是全军的长者。对部下，他非常关心，对我们不仅是使用，而且注重培养。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教育和帮助我们，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军政素质。他身教胜于言教，处处以身作则，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

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是一九二九年在长汀。从那时起，他经常和毛泽东同志一起给我们讲革命形势，讲中国革命的胜利，红军要发展壮大，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后来，在中央苏区的各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中，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多次见到过朱总司令，并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他那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统帅气概；他那面容和蔼亲切的长者风度；他那临危不惧，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革命精神；他那事事顾全大局，时时讲团结的大海般的气度；他那平易近人，对官兵一律平等的优良作风；他那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的高尚品德，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如今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朱总司令来到晋察冀，这对我们今后的作战，尤其是从战略的高度如何正确地理解、自觉地执行中央的部署，一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朱总司令开宗明义地说：“中央军委考虑当前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重新建立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

接着，他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国大内战，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当了大总统。他派兵侵占延安，侵占张家口，下令逮捕和暗杀民主人士，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叫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军刽子手参加指挥作战。还在太原、大同、阳泉起用日本部队同我们作战，实行卖国政策、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造成了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但没有消灭人民解放军，没有削弱人民解放军，反而大大地锻炼和加强了人民解放军，使人民解放军日益强大。不到一年，蒋介石就被我们消灭了一大批正规部队，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标

志就是我们的解放战争转入了全国性的大反攻，即主力打到外线去了，正在展开全国规模的较量。眼下，敌人正在和我们抢占东北，正在向我们解放区进攻，重点是山东、延安。华北地区，中央非常重视。你们晋察冀部队的任务很重，不仅要牵制敌人在华北的部队和解放全华北，而且北面要支援东北，西面要支援西北，东面要支援华东。这是进行战略大反攻啊！

朱总司令强调说：在这种形势面前，需要加强战争机构。根据战局的发展，现在我们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还需要加强，需要组成一个更强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野战军要完全适应打运动战和打大歼灭战的要求。目前军区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后方庞大，战斗人员少，头重脚轻，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从战略上考虑，决定恢复晋察冀野战军，重新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以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

他握了握拳头，说：中央工委已向毛主席建议并得到批准，杨得志同志任野战军司令员，你任政治委员，耿飏同志任参谋长，潘自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晋察冀野战军。

听了朱总司令的一席话，我一方面为成立野战军领导机构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决定将会使野战军从此摆脱繁重的负担，可以集中力量，大大地加强野战军的组织与指挥，增加灵活性，便于更广泛的实施机动。这个决策对于今后的战略反攻，打大的歼灭战、运动战，是非常需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自己能力不够，惟恐不能胜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这个职务。

朱总司令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和我促膝谈心，谈了很久，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我深深感到，朱总司令的话，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是对部属的殷切希望。我生怕忘记，很快地拿出笔来，把朱总司令的指示，一条一条地记录在本子上：

一、要团结。

二、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

三、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

四、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

五、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

六、注意巩固部队。

七、注意纪律，保证物资交公，即为筹款立功劳。

八、威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要把工作做好。工作交给你两杨（即杨得志、杨成武）负责。

九、处事待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

十、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

十一、静坐当思己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惕，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

十二、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

十三、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

朱总司令头一条就强调“要团结”。团结，这是朱总司令的一贯思想。朱总司令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条真理：只有团结，我们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刚刚成立起来的野战军领导机关，要牢记团结一致的原则，以此去战胜敌人。

朱总司令和我谈过话之后，我感到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这是个英明的战略决策。就在组建野战军领导机关之前，我们进行了两个战役：一个是青沧战役，一个是保北战役。青沧战役从六月十二日打响，我们集中了三个纵队和地方武装一部，在津浦铁路北段的陈官屯至沧县间发起攻势，战至十五日，连克青县、沧县、永清三城和陈官屯、唐官屯、兴济镇等十几个车站、据点，控制铁路约八十公里，歼灭国民党军九千五百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打通了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的联系。出击保北，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为了打好这一仗，朱总司令于六月下旬，随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移驻白洋淀，亲自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组织保北战役。战斗于六月二十五

日晚打响,仅用一昼夜时间,我第二纵队即攻克徐水,全歼守敌三二五团。不几天,我第三纵队攻克固城,全歼美械化三六二团,并在打援中又歼敌二千多人。

保北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干部全部到职,领导机关也在定县的一个村庄里正式成立。这时,朱总司令很关心部队的补充、训练。八月十六日,他和刘少奇、聂荣臻同

志来电:如暂时各方不好打,可多整训十至十五天,将部队补充完整,好好训练,待秋高时大举进攻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和平汉、津浦、北宁三条铁路线,或攻击石家庄。

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成立后的头一仗是大清河北战斗。战斗之前,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曾来电指示:“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敌地堡坚固应研究对策,筹备技术与材料后再设法攻破。”“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数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使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大清河北战斗从九月二日打到二十四日,演化成清风店战役,即于十月十一日以一个纵队围攻徐水,主力集中在徐水以北地区打援。十四日,在徐水、容城之间,与北平出援的国民党政府军五个师打成对峙。就在这敌我双方对峙不下时,蒋介石到了北平。他对此相峙局面发生错觉,以为我军兵力不足,又不易脱身,觉得这是与我们决战的一个大好时机,便亲自督战,命令其嫡系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部北上。梦想罗历戎部从石家庄北上,与保定刘化南的两个师会师,然后再和其北面的部队配合,形成南北夹击,在徐水、定兴地区消灭我们的主力。罗历



晋察冀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后《晋察冀画报》刊载的朱总司令嘉奖电

戎第三军原属胡宗南系统，后由兰州、西安经晋南转到石家庄驻守，正太战役后已是坐守孤城，如今接到北上的命令非常害怕。罗历戎不敢贸然行动，因为他知道，离开了石家庄，他就失去了依托，从石家庄到保定，要经过大片解放区，是非常危险的。他不愿冒被歼灭的风险。但老蒋坐镇北平，逼得甚紧，他又不肯违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领着第三军军部和一个师及第十六军一个团从石家庄出发，渡过滹沱河、唐河，胆战心惊地向北推进。这时，我们正在调整部署，原打算主力由东向西。接到此情报后，我和杨得志、耿飚当即决定，抓住罗历戎第三军主力孤军北进的有利时机，以一部兵力在徐水以北阻敌南下，我主力六个旅不再向西，改为向南，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歼灭。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待军区首长的批准，我们向军区发了个电报，就开始行动了。部队以一昼夜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南下，于二十日拂晓，将北进之敌罗历戎第三军主力及第十六军一个团包围在清风店地区。激战到二十二日，将其全歼，生俘中将军长罗历戎。此役，连同保北阻击战，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军一万七千多人，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

战役刚结束，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和罗瑞卿同志就赶到了野战军司令部。

朱总司令祝贺我们取得的重大胜利，即兴步杜甫《秋兴》韵赋《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诗一首：

南合村中晓日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战役消灭敌第三军的主力后，石家庄守敌减半，其正规部队仅剩下一个师，敌人也感到岌岌可危，挖肉补疮，匆忙空运一个团加强守备。眼下，敌人北面就剩下一个保定，再往北就是北平了。我们认为，石家庄已经成为熟透了的果子，我军唾手可得，于是提出了打石家庄的建议。当即得到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支持。

众所周知，石家庄又名石门，地处平汉、正太、石德铁路的交叉点，是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是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敌第三军自抢占石家庄后，就苦心经营，企图使这座城市成为向我冀中、冀南、冀晋、太行各解放区进攻的中心。

敌人在石家庄筑起三道防线：头一道防线是外市沟，上面有密集的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外市沟后面是环形铁路，铁甲列车可以随时机动和巡逻；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这里是重点设防；第三道防线是由建筑物组成的核心工事。在这三道防线里筑起的碉堡达六千多个，加之石家庄周围是一望无垠的平川，要靠近城垣是极其困难的。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晋察冀野战军党的前线委员会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解放石家庄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朱总司令在会上就攻城的部署问题作最重要指示，并针对敌人已把石家庄变成一个筑城要塞，自称“固若金汤”的情况，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要求指战员认真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强调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把朱总司令提出的“勇敢加技术”的口号向部队作了传达。会议决定：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冀中军区、冀晋军区的部队攻打石家庄；第二纵队和独立第九旅、第三军分区、第九军分区的部队集结在定县南北地区，阻敌援兵。针对石家庄的防御体系，会议决定先占四郊，改造地形，通过挖壕接敌，突破两道市沟，猛插核心工事，歼灭守敌。其具体部署是：三纵队在西南面，四纵队在东北面，担负主攻任务。冀中军区部队由东南面、冀晋军区部队由西北面，协助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向石家庄发起进攻。

这次会议还决定释放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近千名敌军官兵，让其回石家庄市，以瓦解敌人军心，动摇敌军士气。

会后，部队进行战前准备。我下到部队帮助基层做攻城的准备和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工作。开展了一个“提困难，想办法”的群众运动，大家共同研究接近和通过市沟、破坏电网、穿过马路、爆破地堡以及对付敌坦克、铁甲车的办法。然后，进行攻坚作战的演习，演练挖地道、爆破外壕、对付装甲车、攻打核心工事、进行巷战；再次审讯俘虏，了解敌情，发挥从清风店战役中补充的解放战士的积极性，让他们介绍石家庄的敌情，并结合实地叫罗历戎介绍了敌人在石家庄的设防情况，如哪里容易突破，哪里是敌人的防御重点等。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进行了总动员，十几天中组织起一万一千多民兵、八万二千多民工、一万多副担架、四千多辆大车。部队开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锣鼓喧天，送猪送羊，鼓励指战员杀敌立功。

十一月五日夜，各纵队渡过滹沱河，向石家庄开进。六日拂晓，打响了石家庄战役的枪声。

当先头部队打到市中心时，我接到朱总司令的电话，这个电话是从冀中军区打来的。在石家庄战役前，旅以上干部会议后，我们对朱总司令说，部队向石家庄推进时，敌机必然来轰炸，在前线不太安全，请总司令到冀中军区驻地河间县去，我们及时向你报告、请示。朱总司令理解我们的意思，说：那好，我不加重你们的负担，就不到前面去了。我去冀中，有什么事，用电话联系吧。所以石家庄战斗打响以后，他一直在冀中军区。

朱总司令在电话上问：战况怎么样？

我说：“第一道防线突破后，第二道防线也突破了，正进入市区作战。”

朱总司令指示：你们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几个大工厂，那是民族资本家办的。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你是政治委员要抓一抓，详细情况你会明白的。

接着我们收到中央电报，说石家庄大兴纱厂、机械厂、汽车修配厂等四大厂，是民族资本家办的，要保护好，特别是对大兴纱厂要严加保护。指示我们占领头一个大城市，一定要做好城市工作，防止敌

人破坏，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厂，防止损坏设备，丢失东西，各级政治委员要亲自检查，要把党的城市政策落到实处。

接到中央电报的时候是半夜，第三纵队已经推进到大兴纱厂地区，正在进行巷战，枪声响成一片。敌人的坦克掩护着步兵反冲锋。我们部队与敌逐屋争夺，逐街争夺，不少地方打上了白刃战。为了贯彻中央和总司令的指示，我带着几个同志进入市内正在进行巷战的街头，召来八旅旅长宋玉琳、政治委员黄文明和九旅旅长陈坊仁、政治委员蔡顺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电报精神，强调指出：不能出问题，必须保护这些工厂，按中央和总司令指示办事。四位旅首长听完传达，马上回到各自指挥位置，迅速向前沿各团传达。两个旅的政治干部纷纷深入到先头连队，检查落实。对于中央和总司令指示要保护的四个工厂，他们专门制订了防护措施，一经占领就立即派部队守卫。

这天夜里，我一直跟着一线部队，落实中央和总司令的指示，直到天亮才返回“野司”。

整个战役过程，我们都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城市政策，保护了工厂、仓库、医院、车站等建筑及其各类物资、器材。不少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从烟火中抢救物资。战斗中，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石家庄市人民群众的赞扬。中央指定的重点保护单位均完好无损，随时可以投入生产。

朱总司令拍电报指示全体指战员说：入城后，遵守纪律，迅速恢复秩序极重要。军队应如此，其他方面亦须如此，要切实办好这件事。

我们对朱总司令的指示，做了及时的传达贯彻。

战斗到第六天早晨，残敌进行着最后的抵抗。这时，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像复仇似的狂轰滥炸。

突然间，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轰轰地震动着整个城市，地面在微微颤抖。战斗临近尾声，怎么会有这样强烈的火力呢？这简直像是步兵发起冲锋前的炮火急袭。

杨得志和我、耿飚、黄敬同志赶去察看，原来敌机把弹药库、油库炸着了，一叠连声地爆炸，持续不断地闪烁，致使半边天乌云弥漫。

这场大爆炸成了我们祝捷的礼炮。当响声停息下来，战斗也跟着

结束了。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硝烟正在消散的空中迎风飘扬！

至此，石家庄守敌第三十二师、第三军炮兵营、保安第九团、第十团、保警队和还乡团，总计两万四千多人，被我们歼灭掉。敌人驻守石家庄两年多的历史结束了。

这时，我们决定，派三纵队八旅担任城市卫戍部队，我到八旅进行了动员。

三纵队八旅执行任务，认真负责，使石家庄秩序井然。特别是战斗结束后，敌机临空轰炸，他们一面组织防空，一面参加救护。有家银行中弹起火，他们组织人员从大火中抢救出银行的全部现钞，致使这家银行免遭火劫。

指战员们的无畏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称赞，就连民族资本家也很受教育、很受感动。

石家庄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对发展经济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个重点设防的城市，我们仅用六天时间就拿了下来，这充分说明了我军越战越强。为此，党中央特电嘉奖。朱总司令作诗庆贺：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并称赞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我们“野司”移驻晋县一村，后又转移到周家庄村。不几天，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战斗经验，布置新的作战任务。朱总司令、聂司令员和彭真同志都来了，并

讲了话。会上，朱总司令反复强调，这次石家庄胜利来得很快，并不是偶然的，不要骄傲。你们要把这些经验好好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学习和发展。这次比大清河北战役、清风店战役，有很大进步。以后还要提高战术，发扬优点，改进缺点。现在我们学会了打大城市，土改后又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但中国这样大，走到南方也要半年一年，我们军队不到，蒋介石在南方的统治是不会垮的。我们准备打几年，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

的确，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当时朱总司令的话真是高瞻远瞩，我们的事业是成功的，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新的胜利。

【附】

军事工业的奠基人^①

一九四〇年四月，我从抗日军政大学调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有幸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使得我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十分困难的局面。为此，朱德同志曾多次找我交谈有关军工生产的问题。在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军工生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还鼓励我要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智慧，多造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有力地支援前方将士。在朱德同志等总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没有钢铁，就用铁路道轨，没有炸药，就从敌占区套购硝酸铵。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太行山根据地的军工队伍在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建立起一支包括技术人员、机械工人，以及铁匠、锡匠、石匠等三千多人的军工队伍，生产出大量的步枪、迫击炮、炮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支援了前方部队、民兵的抗日作战。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挑起内战。我奉中央军委的指示，原准备带一部分人赴东北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因情况发生变化，我们撤离张家口，转入晋察冀根据地。一九四七年春，朱德同志来到西柏坡。一天，他派人通知我去商量军工生产问题。这时，我已调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兵工部副部长，部长是姚依林同志，我负责改制炮弹技术的工作。当我来到朱德同志的住处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

① 这是刘鼎的一篇回忆文章，摘自《回忆朱德》。

待。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自然要说的话很多。在谈话中，他对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在谈到军工生产的问题时，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我们就要开始战略大反攻，前线需要炮兵，需要炮弹，兵工生产要抓紧，多生产一些炮弹。”同时，他鼓励我说：“你是我军专制炮弹的老兵工，要用最大的努力为前方多提供炮弹，越多越好。”从朱德同志的言谈话语中，我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我当即向朱德同志表示，根据以往在晋冀鲁豫时的实践经验，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生产炮弹的能力，并且有能力研制出更安全、更有威力的炮弹。同时，我也请求朱德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制造炮弹所必需的火硝和化肥。他对我的要求表示完全支持。

回到驻地，我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按照我所设计的图纸制造出新弹尾，经过炮兵多次试用、论证，证明这种炮弹性能可靠安全，爆炸力也很强。此后不久，我们在进行炮弹定型试验射击时，朱德同志来到靶场，他拿起炮弹，向在场的同志询问炮弹的射程、爆炸力和准确性。当他看到试射的各种科目准确无误时，十分高兴，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正适合战争的需要。要尽快投入大量生产，准备打大仗。”嗣后，他命令军区把收存的迫击炮全部启封使用。同时，命令炮兵加紧训练，把炮兵的建制尽快恢复起来。

随着我军作战规模的逐渐扩大，军工生产的任务也就愈加紧迫、愈加重要。我记得，在石家庄战役前，朱德同志曾致信姚依林、刘再生和我，指出：晋察冀的兵工厂两三月来整顿得大有进步，军区兵工厂统一指挥领导后，更加有利于大发展。我要求你们以确实可靠为准，任务是能做到支援全国性的反攻部队所用的炮弹。特别是山、野炮



朱德在华东野战军视察士兵练兵情况

弹以及炸药、绵药为重要。其次是迫击炮八二、五〇、六〇的为适用，还有机枪弹。以上这些任务你们是否有可能做到？并要争取时间尽先完成，又要能适用，取得各战地的赞美，那时自然不愁款项无着。朱德同志在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提出一九四八年军工生产的详细计划，并要求今后每月直接向他汇报一次生产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上旬进行的石家庄战役，仅用了七天时间，就全歼守敌二万余人，开创了我军攻克大城市的范例。在这次攻坚战中，我军使用了大量的炮弹和炸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炮兵和工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以后进行的邯郸、临汾等战役中，我军也采用了石家庄战役的经验，取得了同样令人满意的效果。

石家庄战役之后，为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朱德同志在日理万机、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曾多次找我们研究军工生产的问题。他指示我们把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军工部合并为华北军工部，并且专门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发挥正太路一线工矿的生产能力，扩大军工生产的规模。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和姚依林同志商定，扩大阳泉炼铁厂的生产能力，使之达到日产三十吨的水平（原日产二十吨）。同时成立硝磺局，专门生产炮弹所需的炸药。

回顾朱德同志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后就有预见性地亲自抓军工生产，使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提高军工生产的能力，为在解放战争中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极其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又一功勋。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朱德同志分管军工生产。我们进入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傅作义部的军械所。按照朱德同志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在抗美援朝期间，我们集中全国各地的兵工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朱德同志曾针对当时生产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告诫我们要特别注意产品的质量，避免生产废品，我们还要把钱用于建设新的兵工厂。

一九五一年六月，受党中央委派，以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军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与苏方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建设等问题。在谈判期间，朱德同志曾亲自指示我们处理谈判中

的棘手问题，使谈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新式兵工厂，使我国走上了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新台阶。

追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成就，其中无不包含着朱德同志的关怀与支持，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第十一章

心系祖国振兴



对美帝侵朝战争的对策^①

我的病已好了，在病中想了几件事要向你报告。

一、美帝的战略战术，已在它进攻朝鲜^②中，完全表露出来。它只能以现有之兵力，六个单位（约六个师）紧缩在一小角狭长地布置，两面临海。数量约六万到八万，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的伪军不在内，敌之海空军亦不在此数内。

这样布置，是准备长期作战，适合敌之战略需要。

1. 美帝须在战争中发动国内征兵。

2. 动员与国，特别是日本，资料上说，已暗中准备了三十万，以警察为名^③。

3. 以大量使用空军、海军，破坏我后方及水陆交通的战略，进行长期的消耗战。

以上敌人的企图如确，以海空军作掩护，还可能缩小狭长阵地，作为长期对垒，以达它战略目的。敌人目前也不愿急求反攻。与国增援几个师到十个师登陆，大举反攻，我军亦难彻底消灭。现有敌军于狭长阵地中，不能进行围歼战。何时敌反攻大举登陆？待与国军队之建立，牺

① 这是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②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南北方之间爆发内战，美帝国主义随即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武装干涉，并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境，朝鲜的国内战争演变为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大举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侵入朝鲜北方，并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③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胜利后，美国改变了使日本非军事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重新武装日本，以组建警察预备队为名建立了新的日本军队。这支军队即现在日本自卫队的前身。



朱德在建军节集会上讲话

牲他人的时机到来，美帝立于帮助地位，那时是大举反攻时。以上判断是否正确请指示。

二、我们的对策，也应该长期打算，除准备应急外，应对美帝如发动三次大战时，有消灭它的准备，除整顿我们大量陆军外，应以空军对空军，空军对

海军，作为自卫战争中的最好的军种。

1. 大量赶造飞机师，三年以内至少要练成一万以上的飞行人员，从我陆军中选拔勇敢战士及指挥员，容易练成。大量地办飞机预备学校，选拔万余人作预备生，以完成此任务。

2. 海军以尽可能作防卫的进攻的小艇及潜艇，另外拨一部分陆军作海防基地的陆战队，所有海防均要有人固定地防守起来，修起简单工事，安上海岸炮是目前必要的。

3. 坦克计划已办，我意以训练干部为主，到作战时，临时配备新式坦克为好。

4. 炮兵及高射炮过去有底子，但是准备新的战争，必须有一部基准炮及弹，需准备。

5. 工兵是新战争的重要兵种，一时不易练成，技术很高深，有学识、有技术，要专练一部分工兵师，约十个师。

6. 铁道兵团^①，原有一部，在新战争中起大作用，平时亦可修铁道，平时只需百分之三十的军费，可以养活它，这个兵种，可再拨两个军作为铁道兵团。

7. 现有陆军除整编必需外，大部分转为新式兵种，如将来作战需要大量步兵时，临时编练亦较他兵种容易。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指示。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由原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组成。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建制。

关于新疆工作几个问题的答复^①

你的报告已收到。胡鉴^②同志已谈过话，知道你们一年来的辛苦工作是有伟大成绩的。你提出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清匪是有成绩的。将乌斯满^③股愤匪平息，哈族^④招抚，转变他们的生活，由畜牧业转为农业，安定下来，才不能再为匪利用，望加大力改造；乌斯满本人未就擒，他是有美、英帝国主义及蒋匪的后方支持的政治土匪，望注意肃清他，以免后患。至于新、青、藏边之胡赛音，哈力伯克等部落匪首，应清抚兼施，既加以威力，又加以扶助其生产事业，使其生活改善，以通有无，才能彼此友善相处，才不致再为匪，也不致为美、英、蒋匪有机可利用。

你们要知道，新疆地大人少，土匪易产难清，除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外，还须要控制交通工具（坦克、装甲车、汽车等），朝发夕至，使匪有所畏惧而不敢横行。最基本的还是要民族团结友爱，文化提高，生活大家都改善，工、农、畜牧业向前发展，交通运输业每日有改善，才能彻底肃清土匪。

（二）部队生产有很大成绩，生活已大改善，这是好的。但是，你

① 这是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四日朱德给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第一兵团兼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的复信。

② 一九四九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装甲团团长，受朱德总司令委派率该团随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一九五〇年率部参加剿匪斗争，后任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同年九月调离新疆，任装甲兵第一坦克编练基地司令员。

③ 哈萨克族人，曾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阿勒泰地区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匪帮进行武装叛乱。一九五一年三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

④ 当时在乌斯满匪帮欺骗、裹胁下参加叛乱的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

们过于劳苦，虽建立了历史上的开创功绩，把身体弄坏了也是不对的。以后要善于使用机器为人类服务，地广人稀的优越条件，可以利用。你们生产的物资除供自己再生产使用外，应以与苏联交换机器为主。要以农业作先导转为工业化才能建立起大家务。生产虽多，不能浪费，如运输业发展，各种物资均可变为资本基金，可转为再生产的工具。你们今年工具不好，也凭劳力做出一些成绩。如明年增加可用的、很好的工具，将中国内地的农具或苏联农具加以改善，明年再生产就费力少而成功大。以今年的经验教训作出明年的更好的计划，特别是多做能出口的商品，如麻、棉或有色金属的开采或做本地工业原料产品，比较种粮食更有利益，更能换取外汇。修建工程及建筑材料的制造，是建立家务的重要事业，建立房屋也要长期打算，每所房屋要能管几十年、一百年。

（三）进兵西藏是你处一个长期工作^①，不可过急，公路修到何处，就进到何处，不可冒进，要步步为营地稳进，对西藏内部生活习惯熟悉后再进去。

（四）你们明年生产要有计划，能在今年做出为好。

我们都好，请勿念。望你们大家一致努力，建设新的新疆即是建设新中国。

① 一九五〇年五月，新疆军区组建独立骑兵师，承担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解放阿里的任务。同年八月，派出先遣连先行进入阿里地区开展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新疆独立骑兵师一部进入阿里地区与先遣连汇合。八月三日，人民解放军到达当时的阿里首府噶大克（今名噶尔雅沙，在西藏噶尔县境内）。

加快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①

毛主席：

第一信谅达。我们在此看了海军，上了一只八百吨的小舰，并上了鱼雷快艇，在海上转看青岛的形势，是很险要的。在岸上的设备，也看了两个国防工事，炮台，是钢骨水泥建筑的，能充分发扬火力，但不能隐蔽本身，只靠伪装掩饰，是不够的，必须以陆海上飞机掩护及本身高射，并配合高射炮，就可以抵制任何敌人的海空军的攻击。如对进口各航线加以布雷，再设有潜水艇一部，加上鱼雷快艇的放射，是可能有在敌人进攻时击败它的力量的，这是在国防前线应该重视的。

海军目前因为经济条件及国内工业条件不够，不能足用地去建设它，也不可能，但是在海防第一线上，是海军接触敌人，我们应尽可能地去建设海军的防卫力。

海军同志们的要求，我国建设空军的比例，应有百分之二十是海军的空军。海军空军可有两用，陆上海上都是一样的，可以航海、布雷、侦察、战斗。陆上空军到海上去多迷失方向，不熟悉海上情况，这个请求是可以允许的。另外，海军的军事工业似应开始，我国上海、青岛、汉口的造船厂，均可造小艇，鱼雷快艇、扫雷艇、潜水艇、巡逻艇，亦均可制造。苏联海军顾问说苏海军部已答应给我们四种小艇的图纸，并派工程师来帮助完成。这一计划因我们没有钱而暂停，能在明年计划中添设。造小艇花钱不多，开始办是必需的。

① 这是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日朱德给毛泽东的信。

他们这两个要求都是合理的，我们也能办到，也是急需的，请你指示。专此，祝你健康。

兵工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①

这次看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兵工生产如何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重庆、成都、云南、广州等地存在着，而且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一般说来，兵工厂的特点是投资大、厂房好、职工多、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这些厂去年就吃不饱，今年情况较去年将更加严重。现在有些厂就到处揽活自寻门路，有些厂还没有想到办法，只得让一部分设备和人员闲着。长此下去，损失很大。看来兵工生产在和平时兼产一些民用物品或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当然，这个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广，比较复杂，需要作通盘的考虑和筹划。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拖延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先原则上确定下来，比如是否可以先考虑以下两个方案：一个是把二机部^②同一机部^③、电机部^④合并，设备和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今后一机部应尽量少建新厂，

① 这是朱德视察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地后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的一部分。

② 第二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主管国防工业。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今并入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再次设立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今核工业总公司），主管核工业。

③ 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主管民用机械工业。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今并入机械工业部）。

④ 电机制造工业部，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今并入机械工业部）。



朱德在浙江考察新安江水库

外贸系统也应尽量少进口机电设备，由二机部所属厂的多余力量担负新厂和机电设备的生产，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一个是把二机部的范围划小，把剩余的生产能力分出来转向民用生产，

二机今后专搞原子武器等特种兵工生产。这两个方案不一定可行，顶好请计委、经委、建委同有关部门从速共同研究一个合理而又可行的方案，报中央讨论确定。总之，要想办法做到能够把二机部所属各厂的设备充分利用起来，使其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议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①

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

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人名单一份，我同意。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 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①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接受毛泽东提出的他不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之后，因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征求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候选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没有提到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只列举了人大常委会候选人人选，上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又作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选列入。朱德看了中央书记处送来的名单后，写了这封信给邓小平转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①

一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
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
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

① 本篇摘自朱德一九五九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五月的几次谈话记录和一封信。

三

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风，不知能出口多少东西！

（一九五九年七月九日同中共广东省委
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谈话）

四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为原则。把粮食分到户和节约粮食结合起来。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约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好是消灭私有制。现在保留一点私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你不这么搞，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一日同中共湖南省委
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的谈话）

五

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饭，有自留地，吃菜、吃薯、吃粮食的保险系数比公社包起来还大。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起来。回家吃饭，让农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们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台。在家吃饭还可以发展副业生产，烧炕取暖也方便。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

少肉、蛋、鸡会有得吃。今年农业还是跃进，但要过穷日子，慢慢积点东西下来。我担心仍然吃大锅饭，就难搞好。成立食堂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同中共河南省委
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的谈话）

六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七

关于食堂问题，我在成都时，因四川省委尚未接到主席批转乔木同志的报告^①，所以他们对食堂问题还没有深入地了解。就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说来，那里的社员吃饭也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工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一到西安，陕西省委对食堂的反映就十分强烈了。据他们汇报，多数群众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少数群众愿意留在食堂吃饭。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把树

①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送给毛泽东主席一份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转发了这个报告。

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

河南省委在荥阳县贾峪公社大塃滩生产队进行了调查。大塃滩食堂是一个较好的食堂，曾得过县委的锦旗，公社还在这里开过几次现场会议。这次经过群众深入讨论，全村三十六户中，除两户五保户和两户单身汉愿在食堂吃饭外，其他三十二户都要求回家吃饭。他们认为



朱德在水库工地劳动

食堂的缺点是：1.分散领导力量，大量占用劳动力，浪费工分。仅食堂所费工分即占生产队包产总工分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三。这样一来，劳动工分价值就要降低，社员收入就要减少。2.对病人、老幼和来客照顾不到。贫农朱遂山说：“在食堂吃饭确实有许多不方便，像我们老年人，有的就吃不下，越想越伤心。有时候有点病或来了客人就没办法。小孩子不到晌，饿得光哭，看着心里也怪不好受。”3.对群众不方便。这个生产队在山区，居住分散，道路高低不平，一到刮风下雨，吃饭就更加困难。禹县干部反映：在食堂问题上，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干，群众有意见。现在河南省委对食堂问题，是坚决按照群众的意见办。即群众要办的坚决办好，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则将粮食发给群众，让群众回家做饭。对五保户和单身汉适当安置。对锅碗瓢盆等炊具，积极安排生产。先做好准备工作，然后有计划地分散。据豫东地区调查，允许群众回家做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在七千人大会中的讲话^①

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山东的党组织有光荣的历史。山东的党员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山东的干部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勇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搞运动就不至于发生很大偏差。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做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要把自我批评精神带回去，一个一个地改，一级一级地改。把有不同意

①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是朱德在这次会议的小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见的问题先搞清楚，有错误的来个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经常讲，党内要发扬民主，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自己犯了错误，怕人家揭穿，就压制群众，哪个还敢讲话呀？反之，下面见你做了自我批评，他也做自我批评。有了错误不要怕，不要掩盖起来。

大家对老红军为什么那样亲热？因为老红军讲阶级团结，讲阶级友爱嘛！只有团结自己，才能打倒敌人。对群众我们起码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对干部就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而是要争取团结百分之百。培养一个干部，要十年、几十年，不容易啊！要使他到老、到死始终是个好干部。我们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就要从这个目的出发。王明“左”倾路线^①对干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是开除就是处分。那个坏作风，使革命遭受很大损失。延安整风^②得出结论：和风细雨，治病救人。这样就把作风转过来了。我们要靠党的团结，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如果他没有经验，就把他教育好；如果他有错误，就帮助他改正。那么斗争还要不要？还要。不斗争就不能团结。争论一番，也叫斗争。但斗争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党章上有规定，按党章办事。做了决定就执行。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经过这次会，大家总结了经验，又有了切实可行的条例，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群众去执行。

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也应订一个条例，怎样搞法由他们自己做主。这么搞，他们就努力，出勤率就高。把生产队搞好了，县的工作就好

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②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运动，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搞了，就有饭吃了。吃饭是个大问题，搞得人们吃不饱饭是不行的。当然会有灾情，就是有灾，也要想法使他们吃饱，抗旱救灾是个好办法。把生产队搞好，自留地分配好。其余如大队企业如何办好，这些问题都要有个规定。只要按这些办法办，今年就会是个好年成。是否可以改变形势？我想，今年如果搞好，形势就能改变。积极性要提高。要有信心。机关也动手，开一点荒，搞一点水利，见缝插针。不吃食堂了，农民家里可以节省点，有啥吃啥，使农民有点家底，能够养老养小。这几年把家底搞掉了，要恢复起来，这不是开倒车，因为我们的基础还是建筑在生产队上面。把生产队搞好，又把农民的家底搞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搞农业还要看自然条件，因地制宜。有山地，有碱地，各种情况都要弄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打主意。要总结历史经验，做好工作。不能割断历史，不然要吃亏的。

工业方面，山东的条件是好的，是比较先进的。青岛原来就有基础。淄博也是工业区。这两年想越快越好，搞多了一些，是有错误的。有些事情缺乏经验，开始看不出来，以后搞不下去了才觉悟过来。

目前，小手工业恢复得比较快。去年五月、六月、七月才开始认真抓，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有些产品就可以敞开供应了，不用排队了，有的还可以销到外省、外国。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主要是靠农业、手工业生产维持。今后手工业生产还要发展。办手工业可以使老小有事做，有收入。有些东西销到国外可以换粮食、钢材。现在工业产品还不多，手工业产品还很需要。

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农、工、商、学各界都要订出几十条规定作保证。只要大家有了饭吃，而且逐步得到改善，怨气也就消了。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民主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地、县到支部都这样，工作就好做了。党委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你何必管那么宽？工作布置好以后，及时检查就行了。许

多事务由人民政府出面来搞，搞不好由它负责。你都管，管得完呀？今年的事要办好。看来轻工业、手工业可能有发展，原料比去年多一些。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



朱德与毛泽东、宋庆龄在一起

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

总起来讲，山东土地多，海岸线长，发展前途大。只要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执行正确的方针，毛病就可以少出一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当然，敌人还有，一点警惕性没有也不行。但是警惕得分了，不符合客观实际，就会出问题。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对山东的形势也很乐观。希望你们带着愉快的精神回去，统一思想，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团结起来，同自然作斗争，把生产搞好，把各项工作做好。

给儿子朱琦的信

朱琦：

你的来信收到。你这次蹲点的经验，是正确的，作为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有很大益处。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向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是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同群众看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你们铁道部门是接管的企业，过去的旧框框没有打烂，又学苏联的新框框，就是迷失社会主义创造性的一条。现在在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敢于创造出社会主义新类型，来改正铁道交通，是成功的。三结合^①的方法，主要的还是群众。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均有很大进步，望你再去蹲点。今后工作要求在现场工作，使你更进步才不会掉队。

朱 德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

^① 三结合，这里指在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工作中实行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揭发林彪的问题^①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人，调枪支，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个人主义。我军在井冈山建红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也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上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① 节选自朱德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封信。

【附】

最后十年^①

缅怀朱老总，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一生的最后十年。那十年，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都处在忧患之中。朱老总正是怀着难以言喻的深重忧虑，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而又正处在劫难中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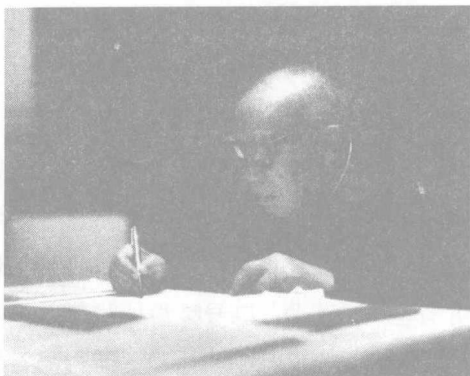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总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提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一伙人闯进了朱老总的住地。正巧朱老总不在家，那伙人就在门前、墙上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等标语。同时，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大有乌云压城之势。当我向朱老总谈起这些情况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我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批判我是“走资

① 这是康克清的回忆文章《朱总风范永存我心》的节选。

派”，“十七年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有口难辩，思想上很难接受。回到家里，我忧心忡忡地对朱老总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要成什么呢。”朱老总却充满信心地回答我说：“只要主席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



朱德在办公

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在京举行。当时，朱老总正患气管炎，喘得厉害，但他仍抱病参加会议。林彪、江青一伙心怀叵测，在会上多次对朱老总进行围攻，逼他检讨。有一次他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不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不再说话。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意思。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啦。”

这时，朱老总要被“疏散”。他对我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我为难地说：“按理说我应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全国妇联的军代表若不点头，我要走也走不了。”朱老总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请他去跟他们说说。”就是这样，我随朱老总到了广东。我们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机场。接待我们的人，不许我们进广州市，要我们直接去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可是我们哪里有心情欣赏？他们还规定我俩不得访问附近的工厂、农村，散步也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我对这样的规定很反感，我说我在北京是自由民，想到哪里都可以随便去，困在这里算什么。逆境中，朱老总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宽慰我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

时刻萦绕在朱老总心头的，是工农业生产。有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破坏了生产，这如何得了！”

一九七〇年夏天，朱老总因人大常委会开会回到北京，行动上略有了一些自由，他不顾年迈，抓紧时间到首钢和农村去视察。针对“四人帮”一伙批“惟生产力论”的谬论，他对生产第一线的干部说：“别听有些人‘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可是实际上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劳动，不生产，能行吗？粮食、钢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一九七四年，我参加了首都体育馆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同志的名，矛头对着周总理。更令人忧虑的是她把手直接伸向了部队。回到家，我赶紧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告诉了朱老总。他听完后没有马上说话，似乎在思考什么。我着急地看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半晌，他才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着急。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革’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有少数人被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是不会跟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经他这么一分析，我如释重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朱老总万分悲痛，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嘴里不断念叨：“恩来，你在哪里？”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焦虑，拄着手杖，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行庄严的军礼，久久不忍离去。

那时，他的健康情况继续下降。可是他总说：“总理不在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带病开会，看文件，会见外宾，找人谈话。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个班子很好，不能变动。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朱老总已经有病，但他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的时间有变动，朱老总在有空调的房间等得太久，他的病情加重了。经医生会诊后，立即住院治疗。七月初，当先念同志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一再强调要抓好工农业生产，并说：“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

朱老总怀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了人世，因为他未能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未及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现。

当我坐在他最后十年生活和工作的房间里，缅怀这些往事时，每每感到朱老总依然在世。他每天用的砚台和毛笔仍在书桌上摆着，继续为我使用；他读过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都留下了他阅读时的记号和眉批；还有那把用布沿了边的芭蕉扇……每件他使用过的物品，似乎都散发着他的气质和精神，当我目睹或接触到它们时，总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感到无限的亲切和充实。尤其当我抬头凝眸端详挂在左侧墙上的条幅——“革命到底”时，真是思绪万千。那是朱老总一九七五年三月六日书写的，四个苍劲、浑厚的大字，显示了他的坚强意志，倾注了他对我及后来人的希望。他的真诚、善良、坚毅、博大、宽容等一切美好的思想情操，仿佛都融在字中，跃然纸上，令人回思无穷，令人感奋不已。

【附】

永记父亲的教诲^①

我敬爱的父亲朱德，生前非常关怀我们后辈的成长，经常以老一代革命家的思想和实践教育他的儿女子孙们：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要革命到底，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始终铭记在我们后辈的心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今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将牢记父亲的教诲，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父亲的革命意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永记父亲的教诲，勤奋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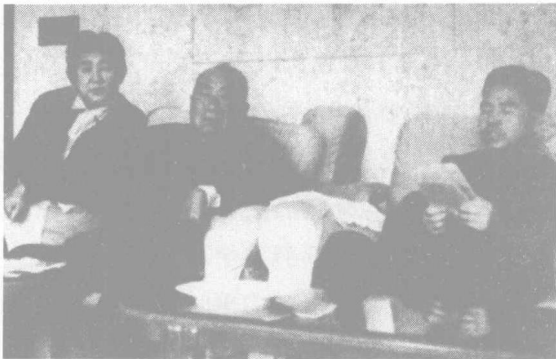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父亲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无论工作多么繁重、紧张，学习从不间断。他常对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一定要好好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父亲言教又身教，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榜样。

一九六〇年，党中央号召全党的领导干部学习三十本马恩列斯的著作，父亲立即带头响应。尽管这些书籍他早已钻研过了，有的还读过多次，但他还是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有时甚至在散步时也要带上书，走一会儿就坐下来读一段。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

① 这是朱敏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摘自《回忆朱德》。

他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记下了十多本读书笔记。

对毛主席的著作，父亲的学习兴趣更浓。他常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而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路明灯。”“毛



朱德在“文革”期间与家人在一起

主席著作里写的事，许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他以前通读了九遍，最后一次通读时，已是八十八岁高龄。如父亲读一篇文章，在题目下用红笔写下“×月×日读完第十遍”的字样。打开他读过的毛主席著作，就会看到他用红笔画下的许多标记。

父亲不仅勤奋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议、指示、号召，总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党中央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并作出了中央委员一年应有三分之一时间在下方的具体规定。父亲尽管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他对中央的这一规定带头执行，每年抽出许多时间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去调查研究，视察工作。他的足迹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骄阳似火的海南岛，到寒风凛冽的北大荒，从风沙扑面的茫茫草原，到山清水秀的锦绣江南，到处都是他调查访问的场所。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认真地向党中央写出调查报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父亲不仅自己认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循循善诱地教育我们子女努力学习。一九五〇年前后，我还在苏联学习，每次回国度假，父亲总要问我是不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由于我从小生活在国外，中文水平较差，学习毛主席著作有比较大的困难，父亲就戴上老花镜，让我坐在他身边，教我一字一句地读。他一边读，一边讲解，每讲完一段就问我懂了没有，如发现我哪些地方还未理解，就

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讲解，直到我真正弄懂为止。有一次，父亲给我讲解《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讲到文章中一段论述中国人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时，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少人都经历过寻找革命真理这段历史，多少革命先驱者甚至为此牺牲了性命，你们现在学习马列主义条件这样好，多幸福啊！你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一九四八年，父亲第一次见到嫂子赵力平时，送给她的礼物就是一本毛主席著作。一九五二年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爱人的第一件礼物也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

后来，我们兄妹都有了孩子，并且渐渐地长大了，父亲又开始教他们读毛主席的书。他不但给孩子们划出学习的篇目，提出思考的问题，而且还指导孩子们写读书笔记。他说：写笔记可以帮助记住文章的中心和重点，还可以锻炼思考、分析和概括问题的能力，也是既学政治又学文化的一个好方法。有时，他还检查孩子们写的笔记，哪个孩子没有写，他就严肃地批评说：“不写，一是怕写不好，丢面子；二是怕艰苦，贪玩。”在他老人家的引导督促下，后来，孩子们逐步养成了认真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记读书笔记的习惯。

星期日或节假日，一般是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在我们家里，通常成了学习日。父亲说：“你们平时都有革命工作，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要利用这个机会交流学习体会。”只要父亲在家，都是他亲自主持学习，从不间断。父亲还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他面前，让他们轮流领读毛主席著作，并让孩子们讲书里的意思，谈自己的体会。谁讲得好，理解得准确，就受到表扬；谁读错了字，他就马上纠正；谁讲得不对，他就提出问题，进行启发。在他老人家的引导下，孩子们的这种学习会每次都开得很认真，很活跃。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围着我父亲聚精会神学习的时候，我就油然想起当年父亲手把手教我读毛主席著作的往事。父亲言教身教，勉励我们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诲，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并世代传下去。

永记父亲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公仆

父亲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真心实意做人民公仆的一生。他一生没有任何嗜好，只知道工作、学习，学习、工作。永远是那样兢兢业业，永远是那样不知疲倦。特别是到了晚年，他更加珍惜时间，力争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他每天睡觉很少，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到吃饭时也要再三催促才离开办公室。有的伯伯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能做的事就应该努力去做，这样可以分担毛主席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借着吃饭的时候劝他：“您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这样工作会吃不消的。”他说：“人活着是为什么？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候，孩子们也说：“爷爷，您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共产主义我是看不见了，你们要不为名、不为利，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啊！”

周总理逝世后，他强忍着内心的极度悲痛，更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仅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中，他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父亲是要用加倍工作来弥补我们党由于周总理逝世所受到的无法估量的损失，寄托自己对亲密战友的哀思！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父亲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直到这时，他还向医生提出下午要按预先的安排接见外宾，接受外国驻华官员递交国书，虽被医生坚决阻止了，但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已经另作安排，他才放下心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父亲一生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对我们后辈的基本要求。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十分耐心地教育他们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父亲和周总理也分别为雷锋同志题词，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父亲告诉孩子们：“雷锋同志在平凡的工作中培养了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意志，我们大家都要向雷锋学习。”这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父

亲委托妈妈送给孩子们每人一本印有毛主席题词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妈妈还代表父亲给孩子们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题词。在送日记本时，妈妈对孩子们说：“爷爷希望你们要像毛主席要求的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兢兢业业，学好文化知识，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要求你们把学习雷锋的收获体会写在本子上。”以后，父亲还不时地对孩子们的日记本进行检查批改。

孩子们长大后，父亲又教育他们“干工作不要挑挑拣拣，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不管干什么都要安心工作，干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干好”。我的二孩子刘康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父亲知道后很高兴，对他说：“当工人好，就是要当工人、农民，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有饭吃”，“不要想当官，要当普通劳动者”。说着，他又回过头亲切地问我的小儿子刘武：“你长大了去当农民，好不好？农业重要啊！你会做饭吗？现在就应该学会自己做饭，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我的大孩子刘建参军了。当他穿着新军装去看望爷爷时，老人家严肃地对他说：“到部队后，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让你去养猪喂马你干不干？养猪喂马也是为人民服务，也要干好。”“不要在别人面前摆架子，不要当‘兵油子’。”有一次，父亲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这样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林彪、“四人帮”掀起篡党夺权的妖风恶浪之际，父亲的锋芒所向是很清楚的，真是字字重千斤。

父亲还常常教育我们：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早在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我正在苏联学习并准备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服务工作。那时，父亲就很关心我的学习和工作，希望我能学好本领回国参加建设。他在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百忙中，给我写了一封信，教诲我：“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

业为是。”当时，这封信我没有收到，是后来才读到的。当我读了这封信后，深深感到，父亲希望我能学到真本领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心情是多么深切啊！一九四八年，当我的哥哥朱琦转业到铁道部门工作时，父亲就嘱咐他：“你对部队工作比较熟悉，到地方就不同了。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遵照父亲的教导，哥哥分配到了石家庄铁路局后，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司炉、司机。有一次，父亲坐的专列，正好是哥哥当司机，父亲便在车厢中接见了。当父亲见哥哥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污，便十分高兴地紧握他的手说：“好！好！你学会了开火车，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又说：“我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政治，技术上也要精益求精，不要满足现状，要谦虚谨慎，工作要更塌实认真。”

对于我们的孩子，父亲则要求他们从小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他不但教育孩子们要端正学习态度，而且经常询问他们学校里的教学、生活情况，有时还抽出时间亲自检查他们的作业。发现他们做错了或态度不认真，就叫他们重做一遍，找出错误的原因；看到他们的学习进步了，就加以勉励，提醒他们不要骄傲。

我的大孩子刘建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贪玩，学习成绩下降。一次考算术，得了五十九分。下课后，老师要留下他谈话，他又偷偷地溜走了。教师为了教育他，便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反映了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并且表示没有把孩子教好是自己的失职，实在对不起革命老前辈。父亲收到这封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把孩子叫来谈话。父亲严厉地对他说：“光想着玩，不学好文化知识，将来就不能为人民服务。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什么也不会干。当工人不会做工，当农民不会种地，怎么能生产出机器和粮食？你喜欢体育、美术是好的，但是别的功课也要学好，更不能上课画小人，坐在教室里还想着攀双杠。”孩子不大服气地说：“老师出的题我全会，这回是粗心了。”还说五十九分跟及格只差一分，老师为什么还要告诉爷爷？父亲耐心地对他说，讲明道理，说清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差一分也是不及格。再说，难道及格就满足了吗？应

该争取好成绩，老师批评得对，是对你负责，怎么能不听老师的话呢？一定要尊重老师。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多幸福啊，一到年龄就能上学，学革命道理，学科学知识，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困难。在旧中国哪有这样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全家整年辛苦劳动，没有一个人读过书，后来东借西借，才供我一人上学。那时上的是私塾，读的是古书。你们的老师多耐心，哪一个学生没有学好就着急。我小时候的老师对学生一不顺眼就打板子。”父亲的这番话，不但使孩子们明白了许多道理，逐步克服了缺点，就是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一定牢记父亲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永远做人民的公仆。

永记父亲的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父亲对我们子孙后代的要求十分严格，经常进行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教育，绝不允许我们有一点比别人特殊的想法和表现。在他老人家看来，搞特殊化是“万万要不得”的。

一九五三年，我从苏联回国参加工作，父亲就让我住到学校去，并一再嘱咐我：“要住到学校宿舍，不要老回家，要好好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学校家属宿舍还没盖起来，我便遵照父亲的要求，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四年。一九五七年才搬进学校分配给我的房子，至今我还住在这里。

一九六〇年，我的大孩子刘建要上学了。开学那天，他背上小书包，换上干净的衣服，笑啊！跳啊！高兴得不得了。他知道学校离家很远，走出门就嚷嚷要坐小汽车上学。但出乎他的意料，等着他的并不是爷爷平时坐的小汽车，而是一辆三轮儿童车。孩子一见就嚷起来：“这不是四个轮子的呀！我要坐四个轮子的车！”父亲听到了，大步走出来，严肃而又和蔼地对孩子说：“你问一问王伯伯，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坐过汽车吗？”拉车的老王同志说：“别说汽车，就连三轮车也没有坐过呀！旧社会我给有钱人家拉黄包车，光着脚跑遍北京城，可是还吃不饱肚子。”这时，父亲又亲切地对孩子说：“你要坐小汽车，别

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那要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你今天坐，明天坐，以后还能和没有汽车坐的小朋友在一起吗？你今天想坐汽车，明天想穿新衣服，你能爱学习吗？你坐了汽车就高兴，吃了糖果就舒服，你还能爱劳动吗？”孩子听了低下头来，一句话也说不出。父亲拍拍孩子的头说：“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下地干活儿，帮助妈妈做事了，你们多幸福啊，可不能变成小泥鳅！”孩子一听就笑了，周围的人也都笑了。以后，孩子们上到小学二年级，父亲就要他们坐公共汽车上学；念到小学高年级，又提出周末回家时不坐公共汽车，要求他们锻炼从学校走回家，并对孩子们说：“我当初刚到德国时，听不懂话，坐车没法子买票，问路也没法问，我干脆出门就走路，口袋里放一本柏林地图，按地图去找，不到一个月，就熟悉了柏林的街道，以后办事也就方便了。”听了父亲的话，孩子们就坚持每周步行回家，星期日下午再步行回到学校去。我的两个堂弟当时上中学，学校离家二三十里路，也一直坚持着步行往返。

在生活其他方面父亲对孩子们要求也很严格。孩子们的鞋通常是从军队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孩子穿了后再留给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孩子从九岁起就自己锻炼洗内衣内裤。逐步做到生活自理。星期天，我们回到家里，父亲不仅要我们接替服务人员的工作，让他们休息，还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地里劳动，学习创地、下种、施肥、管理。父亲经常对孩子们说：“你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热爱劳动，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够为人民服务呢？现在不热爱劳动，将来就要厌恶劳动，就要脱离人民，你们可要从思想上重视劳动，向工人、农民伯伯们很好地学习啊！”

父亲和母亲多年来还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每年在春暖花开大地吐绿的时候，经常挖一些野菜给全家人吃。一九六二年，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一个晴朗的早晨，父亲和母亲散步回来时，又带回来许多野菜。两位老人的衣袖和裤脚都被露水沾湿了，满手泥土。但是，父亲却高兴地说要请孩子们会餐。吃晚饭时，桌上摆了几碟野菜。孩子们刚吃到嘴里就吐着舌头说：“这叫什么菜，多难吃啊！”妈妈指着桌上的野菜告诉他们：这是野苋菜，这是苦苦

菜……然后说：“现在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很艰苦……”这时，父亲接过话，深沉地说：“这菜苦吗？这在野菜里还是最好吃的哩！长征的时候，我们连这样的野菜也没得吃，多少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而牺牲了。现在毛主席领导人民克服困难，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最后他要求孩子们：“以后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孩子们住校后，只在星期六回去看望爷爷奶奶。父亲又给他们规定：买饭时要排队，不能超过个人定量，不准超过一般人的伙食标准。

一九六九年，我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只有十六岁，第一次离开家。到兵团以后，组织上分配他去养猪。一次在他喂猪的时候，猪食撒了他一身。他一气之下，把桶一扔，跑回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家。父亲收到信后，很快亲笔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严肃地指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关系到青年人能否接好班的大问题，应该很好地在农村锻炼，虚心向群众学习，才能有丰富的知识，宽阔的胸怀，坚强的革命意志，才能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父亲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克服了怕苦、怕累、怕脏和想家的思想，工作积极了，热爱本职工作了，思想、工作、学习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我有一个侄儿原在海军某部工作。我哥哥去世后，有关组织考虑到父亲身边一个孙子也没有，就把他调到北京。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海军的负责同志时，提出把孩子调到基层连队去，并严肃地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坚决要求下，一九七五年侄儿被调到南京部队海军某部服役。调令下来后，正是农历除夕，孩子想在北京过春节，和他久未见面的妈妈团聚几天再去报到。父亲听了他的想法后，既严肃又慈祥地对他说：“不行，一个解放军战士，必须模范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必须提高革命纪律性，还是到部队去过春节吧，那里更有意思。”听了爷爷的话，他给在天津工作的妈妈打电话，希望她大年三十上午能到北京，母子俩能见上一面。不巧，他妈妈因为开会不能脱身，等她乘夜间火车赶到北京时，孩子

已经离开北京到部队报到去了。

我的另一个侄子也在外地部队服役。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回京探亲，看到爷爷的身体不如以前健壮，面容也消瘦了许多，心里不由得一阵发酸。他亲眼看到爷爷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带着病去的，回来以后一连几天病情仍不见好转。这时他的假期已经满了，他多想在爷爷身边再住几天照看他老人家啊！但是一想到爷爷平时抓紧每一分钟为党工作的情景，就好像又听到了爷爷要他们严格遵守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谆谆教导。他知道，如果这时他提出留下来，爷爷是会生气的，这只会给他老人家的病情加重。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按时归队。当他去向爷爷告别时，父亲很高兴，对他说：“我年纪大了，为党工作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工作。我的生活组织上会照顾好的。你回去后，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你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料，就在他归队途中，父亲住院了，等他赶回到爷爷身边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

敬爱的父亲就是这样时时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用党的纪律约束我们。而他老人家自己，事无巨细，处处为我们做出了艰苦奋斗，永远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建国二十多年来，父亲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俭朴作风。他每顿饭差不多都是一碗米饭、一小盘素菜、一小盘自己家里腌的泡菜，另一盘菜里几片肉，一小碗汤。他的衣着也很简单，几件较好的衣服只有接见外宾或外出时才穿，一回到家里就换上旧衣服。他的内衣、毛巾都破到不能再补、无法再用时才换新的。他床上铺的褥子、床单，盖的被子也都用了二三十年，上面打了不少补丁。他对我们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补补能穿能盖就行，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

父亲不肯要任何特殊照顾，不愿让国家为他多花一分钱。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亏了五十多斤。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坚持和全家人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办法把所亏粮食补了回来。他用的澡盆比较高，组织上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了，身体不灵便，澡盆又滑，容易出危险，几次要把澡

盆放低一点，再安一个喷头，便于他坐着淋浴。但他始终不同意。他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再修又要浪费钱财。”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住进医院，工作人员才悄悄地把澡盆改装了，准备他出院后再接受他的批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父亲这次再也没有回家。

父亲曾经说过：“我是无产阶级一员。我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只有我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我只有两万元存款，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确实，我的父亲生前虽没有留下更多的财物，但他却给我们后代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私、德高不自显这样高尚的革命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德，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永记父亲的教诲，革命到底， 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敬爱的父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直到病魔缠身卧床不起时，他心里想的也仍然是党的工作，国家的大事。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父亲极大的义愤！虽然父亲从来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在儿女面前提及不该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焦虑。一九七五年，他曾写下了“真心搞马列，地覆又天翻”这一意味深长的诗句。同年三月六日，又用他那浑厚苍劲不减当年的笔触，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这不但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更是对日益猖獗的“四人帮”的有力批判。可以想象，在他挥笔写下这些铿锵有力的字句时，他的胸中正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澜啊！他曾坚定地对妈妈说：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军队是好的，是稳定的，谁要想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是必然要失败的。历史已经证明，谁违背人民的意志，必然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四人帮”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时候，父亲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这是何等高深的马列主义洞察力啊！

父亲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以后，病情发展很快，但他还一直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焦急。他对每一位前去探视的领导同志反复叮咛：一定要大胆抓工作，一定要迎着困难，排除干扰，搞好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七月一日，他的病情变得十分严重，连说话都感到很困难了，医生要他绝对安静。但是，一清早他就把秘书叫去，说：“今天是‘七一’，报纸发表社论了吧？拿来读读吧。”以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地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他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使每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齐发出哽咽的声音。

七月二日，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突然间，病情又稍有好转，恰好我一个正在上大学的侄女赶来看望他。父亲见到侄女，示意要她靠近些，然后对她说道：“我们的大学生来了……要做无产阶级……”

“革命到底！”“要做无产阶级！”至今，我的耳畔还时时回荡着父亲轻微而有力的声音！这简短而闪耀着人类最崇高思想光辉的语句，是他老人家自己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是对我们后代的最宝贵遗嘱，也是对我们全体共产党员、革命人民的殷切鼓励和期望。我将永记父亲的教诲，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勇往直前！

大事年表

1886年 诞生

12月1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丙戌年十一月初六）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李家箐（今马鞍镇琳琅村）一个贫苦佃农家里。

1888年 两岁

过继给伯父朱世连，称过继的父母为父亲、母亲。

1891年 五岁

开始跟哥哥一起上山拾柴、割草，帮助家里干一些杂活。

1892年 六岁

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被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

1895年 九岁

1月25日（农历腊月三十日）朱家因无力满足地主的加租要求，被迫在除夕退佃、搬家。全家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和祖父母、三叔、四叔迁居大湾，借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老屋和祖业田地。

1896年 十岁

在距离大湾约四公里的席家砭私塾就读。塾师席聘三为他取学名“玉阶”。

1900年 十四岁

夏，天旱。与小伙伴们在琳琅山下老屋东边不远处一山坡下找到一股水源，挖了一口小土井，后经乡亲们扩建，取名为“琳琅井”。

1905年 十九岁

2月，带了一吊钱，步行三十多公里，到仪陇县城参加科举考试，改名朱建德。在县试一千余名考生中考入前二十名。

7月，清朝廷宣布自丙午年（1906年）始，废止科举制度。朱德还未经过成都的院试，便失去了考上秀才的机会。

1906年 二十岁

先后就读于南充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和顺庆府官立中学堂。

1907年 二十一岁

春，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入学时仍用名朱建德，编入甲班。年末，以总平均分数八十二点三分的优良成绩从体育学堂毕业。

1908年 二十二岁

春，应聘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1909年 二十三岁

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入丙班步兵科。进讲武堂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秘密加入同盟会。

1910年 二十四岁

滇军军官缺乏，亟待补充，从讲武堂丙班中挑选学习较优的学生一百名组成特别班。朱德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

1911年 二十五岁

随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所部第七十四标（相当于团）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没几天又当司务长。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参加云南革命党人响应武昌新军起义的昆明起义（又名“重九起义”）。云南起义后，云南军政府组织援川军共两个梯团八个营入川作战，援助四川同志军起义。朱德随左路在第二梯团当排长。第二梯团占领四川省叙府（今宜宾市），下旬占领自流井（今属自贡市）后，朱德升任连长。

1912年 二十六岁

5月，返回昆明。调任云南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学生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

1913年 二十七岁

夏，从云南讲武学校调出，被任命为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率部驻防云南边境蒙自、开远。此后的两年里，率部与云南陆军第一师另一个营在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环境恶劣的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进行游击战，屡建战功，先后升任副团长、团长。

1915年 二十九岁

年底，在蒙自率部宣布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随即开往昆明。被任命为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

1916年 三十岁

1月初，任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不久，所部改编为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相当于团），任支队长。2月，护国军开始向征滇军占领的泸州进攻。朱德率部参加泸州、纳溪战役。战斗中奉命接替第三支队长职务。6月，护国军改编。朱德所部改编为云南陆军第七师第十三旅步兵第二十五团，任团长，先后驻防泸州、南溪。

1917年 三十一岁

7月中旬，为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滇军改称靖国军。驻军四川南溪的朱德所部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朱德任旅长。之后，奉命率部进驻泸州，卷入川、滇、黔各军之间以及川军内部的混战。

1918年 三十二岁

所部改称靖国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

1920年 三十四岁

11月，率部移驻云南省昭通县。

1921年 三十五岁

2月，率部与其他滇军一起返回昆明。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4月4日，兼任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是年，公余时间到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女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做出国学习准备。

1922年 三十六岁

1月初，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2月，兼任云南省禁烟局会办。夏，在上海拜访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没有同意。9月初，去德国。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 三十七岁

5月，住在文德路八十八号一个曾在德国皇家军队里担任旅长的男爵家里，常请男爵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并买来许多德文军事书籍，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有一二十本，潜心研究西方军事历史。10月1日，迁居住以克斯·普

朗克街三号。参加中共留德组哥廷根小组每周三的学习会或座谈会。

1924年 三十八岁

3月，在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注册入学。在哲学系专修社会学。是年，离开哥廷根之前，一直参加中共留德组哥廷根小组的学习和活动，曾担任过宣传干事。

1925年 三十九岁

4月20日，在一次声援被保加利亚首相察科夫迫害的人们的秘密集会上被德国警察局逮捕。经中国留德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二十八小时后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6月18日，朱德带领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广场上组织的演讲会集会。集会要结束时，朱德等三十五名外国与会者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随后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在德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下，朱德等人由中共留德组织请律师辩护获释。事后，德国政府吊销了朱德的护照，要把他驱逐出境。

7月4日，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参加由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组织的旅欧党团员第一批归国团，从柏林去苏联。7月至9月下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0月，入在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学员队长。

1926年 四十岁

7月，从苏联回国。7月26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国民党员和滇军同僚的身份前往四川万县杨森部工作，以阻止杨森投靠孙中山的北洋军阀吴佩孚。11月，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军委书记杨闇公、军委委员刘伯承确定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方案，以策应北伐，推动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7年 四十一岁

1月中旬或下旬，脱离第二十军，返回武汉。按照中共中央军委

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工作。被朱培德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并着手筹办实际上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的军官教育团。6月下旬，被朱培德“礼送”出境，离南昌去武汉。7月31日，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为消灭驻南昌的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创造条件，朱德利用和滇军的关系，在佳宾楼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晚九时许，在得知第二十军一个云南籍营副告密的情况下，朱德立即赶到第二十军指挥部，把起义消息已泄露的情况告诉贺龙，贺龙即报告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不久改任第九军军长，还被任命为南下先遣司令。10月上旬，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为了保存实力，率领起义军余部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11月，与驻防广东省韶关市、湖南省汝城县一带的国民革命军范石生部合作，使部队得到补充和休整。

1928年 四十二岁

1月13日，与陈毅和中共湘南特委共同组织发动湘南起义。起义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4月下旬，与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湘南起义农军万余人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 四十三岁

1月，与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

1930年 四十四岁

6月中旬下旬，红四、红六、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朱德未出席会议，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2月底至1931年1月初，与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彻底粉碎国民

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 四十五岁

5月16日至31日，与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8月上旬至9月中旬，与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1月，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

1932年 四十六岁

2月14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为日军进攻上海告十九路军士兵书》。5月下旬，在长汀举办的东路军军事教导队讲话、授课。春，常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举办的情报侦察干部集训队上课。

1933年 四十七岁

2月至3月，与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4月15日，以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表《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5月8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1934年 四十八岁

1月15日至18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22日至2月1日，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代表全国红军致词。28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3日，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又经选举继续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8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并致开幕词。7月1日，在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词。9月，为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致函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10月上旬，派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等五项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10日，随中革军委第一纵队（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开始长征。

1935年 四十九岁

1月15日至1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1月28日至29日，在土城战斗最危急时刻，赶到前沿阵地，在前线指挥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四团作战。5月12日，出席在会理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在发言中赞成毛泽东的军事指挥。5月22日，在彝族地区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5月底，接到川军杨森派人送来关于与红军互不侵犯的信函后复信嘉许并派人与杨森部队取得联系，致使红军顺利通过其防地。6月17日，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达维镇。8月11日，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由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混合编成）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前进。之后，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1936年 五十岁

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向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转移。朱德率红军总部与四方面军总部从宝兴出发，随第一纵队行动，途中，朱德第三次翻越夹金山。6月6日，在朱德、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宣布取消他自立的“中央”。10月9日，率红军总部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起抵会宁。10月

10日，出席在会宁召开的庆祝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大会。12月6日，出席在保安（今志丹县）红军大学举行的欢迎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大会。

1937年 五十一岁

1月10日，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13日到达延安，住城西凤凰山麓。1月28日，会见于当天到达延安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4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祭黄帝陵文》。7月23日至27日，抵达云阳镇，与彭德怀、任弼时主持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8月22日至24日，出席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副书记）。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8月25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9月6日，与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21日，于太原举行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9月23日，在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外侧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10月28日，在娘子关失守、晋东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率八路军总部与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地区南下。11月9日，在辽县石拐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决定：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进行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一二九师在晋东南依托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一二〇师仍留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11月18日，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邓小平并报毛泽东：总部将到隰县地区，我们24日到洪洞；晋西北游击部队已超过一万；晋东北（蔚县在内）游击部队六千余；晋东南游击队共二千余；一一五师抽出千

部二百余，由杨勇率领在黎县、武乡、襄垣、涉县地区工作；我们拟定于最近二三个月内每旅成立一个新团，杨成武部扩大成三个团的独立师，总部以特务团一个连为基础，扩大成一个充实团。12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讨论华北抗战形势和部署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 五十二岁

1月3日至5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会议精神，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1月10日，在八路军总部，主持研究组建炮兵团和培训干部等问题。1月13日，与彭德怀、任弼时向全军发出关于广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指示。1月15日，与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在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会议。1月17日，与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在洛阳面见蒋介石。1月25日，与彭德怀发布《对日军作战的战术原则》。2月5日，与彭德怀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应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声援徐州友军作战。2月20日，离开洪洞县马牧村，与左权率八路军总部经苏堡、铁沟，向府城（今安泽县）转移，向太行山挺进。2月下旬，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3月24日至28日，在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4月1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告以：二、三两月中，八路军各部共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战斗残酷，伤兵激增，消耗弹药甚多，要求蒋介石设法接济医药和补充弹药。4月，指挥部队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6月28日，与彭德怀、左权、傅钟向所属各部通报八路军战绩：自1937年9月20日至1938年6月20日，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六百三十八次，毙伤日伪三万四千七百三十四人，俘日军二百五十四人、伪军一千九百八十八人。伪军反正三千三百人。毙敌马一千三百匹。缴获马、步枪六千四百九十支，轻、重机枪二百四十九挺。缴获无线电台、望远镜、电话机、脚踏车、军毯以及子弹等大量军用品。炸毁大小铁桥八十六次、大小桥梁九十五座，破坏铁道总共二百零五公里。炸毁敌火车三十列、

装甲车三十八辆、坦克十辆、飞机二十二架。炸毁井陘煤矿全部机器，砍断电杆三千零八十七根，收回电线一万八千九百七十斤。二十九日，又通报各部队：一年来八路军共伤亡二万五千九百八十六人，其中伤一万七千三百六十六名，阵亡八千六百二十名。8月13日，与卫立煌在垣曲辛庄会谈。8月25日，抵延安。8月29日，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一年余以来的华北抗战》报告。9月29日至10月21日，出席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2日、3日，在会上作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10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乘飞机赴汉口，了解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11月9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11月下旬，抵吉县面见阎锡山。

1939年 五十三岁

1月1日，出席山西省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的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并发表讲话，严厉斥责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1月24日，与左权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以及山东纵队等首长通报蒋介石颁布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2月4日，与彭德怀将八路军战功特著之军政人员名单报阎锡山。3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4月11日，为粉碎日军从晋察冀、晋西、冀南、鲁西北分五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进攻，主持召开八路军总部会议，研究对策。4月13日，为了给友军培训青年军官，八路军总部举办了东路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在训练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4月30日，致电蒋介石，报告：贺龙率三五八旅主力及第三纵队一部在齐会（河间东北）与敌军苦战两昼夜，毙、伤敌七百余，缴获军用品甚多；因敌军使用毒气，贺龙师长及以下官兵五百余人中毒，伤亡七百余。5月11日，给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人员讲课。讲述应当怎样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联系中国的实际来学习苏联的步兵战斗条例。6月5日，致电程潜、阎锡山、卫立煌，呈报八路军五月份战斗统计。9月，在太行山区接见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毕业学员。10月10日，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作《纪念“双十节”二十八周年》讲演。10月，自本月开始，每周一、三、五，

从总部驻地王家峪骑马到近百里路远的沁县西林村，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训练班讲授游击战术。11月2日，在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11月28日，出席在武乡县下北漳村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大会并讲话。12月8日，与彭德怀致电程潜、阎锡山、卫立煌、叶剑英转蒋介石等，呈报八路军执行其冬季作战计划情况。12月7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于武乡县北庄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12月12日、18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于武乡县北漳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先后作《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和《如何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报告。12月21日，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三位大夫。12月24日，在八路军总部追悼白求恩大夫的大会上致词。12月25日，与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向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和全国各界发出通电，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枪口对内，制造磨擦。

1940年 五十四岁

1月15日，与彭德怀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以八路军艰苦抗战的事实，驳斥陈诚等九日在广东省韶关发表的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3月上旬，与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打垮国民党军对抗日根据地军事进攻。5月26日，抵达延安。5月29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上报告国共磨擦问题时，强调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性。6月6日，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并讲话。6月9日，与毛泽东等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6月20日，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并作题为《华北抗战的总结》报告。7月24日，由毛泽东、朱德等发起，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成吉思汗公祭大会及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典礼，出席典礼并讲话。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讲演。9月2日，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一些地方视察。在视

察后撰写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朱德的意见，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9月20日，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并讲话。冬，为了打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部队供应的困难，提出军垦屯田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

1941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与毛泽东出席八路军军政学院在延安举行的开学典礼晚会。1月13日，与彭德怀、叶挺、项英发表《抗议皖南包围通电》。1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恩来、彭德怀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张闻天还提议由朱德、任弼时召集高岗、高自立、萧劲光等开会，研究军民防卫国民党军队可能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准备工作。2月25日，出席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并讲话。春，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对南泥湾的开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3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朱德、叶剑英、叶季壮、谭政、萧劲光组成财政委员会，以加强财政经济的领导。朱德任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叶季壮为秘书长。还决定由朱德直接领导后方勤务工作。4月9日，对即将赴山东工作的干部作《现在局势与将来展望》报告。4月，在《共产党人》第十七期上发表《党员军事化》一文。7月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一文。7月7日，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在《解放日报》“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特辑”上发表《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朱德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海外研究组组长兼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书记等决议。10月27日，出席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作《建立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报告。11月29日，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抗日军政大学改为军事学院，以朱德为院长。

1942年 五十六岁

1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后勤部经济建设部干部会议并讲话。1月25日，任延安新体育会会长。2月18日，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节，撰写《纪念红军二十四周年》一文。3月23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并讲话。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中央直属系统、军委直属系统、边区系统等几个委员会军事系统（留守兵团在内）的检查工作，可采用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进行。5月1日，出席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克服困难，向前迈进》一文。6月23日，出席在延安举行的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致贺词。7月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7月7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胜利在望，团结向前——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一文和《抗战五周年挽八路军阵亡将士》诗一首。8月1日，出席南泥湾的中心南阳府市场开幕会并讲话。8月28日，出席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会议并讲话。10月19日，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开幕式并讲话。11月7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

1943年 五十七岁

1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为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而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1月14日，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并讲话。1月，在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讲话。在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检查后方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讲话。2月26日，出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并讲话，号召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务。4月23日，出席延安各界一万五千多人举行的公祭刘志丹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八

路军致词。6月28日，致函任弼时，指出：“边区财经问题成为我党目前最中心工作。”“延安的生产运动不能满足于本身的丰衣足食，还必须支援各方。”7月6日，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8月，先后在中共西北局干部会、西北公学作《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报告，在中共中央党校作《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军队与反革命军队的历史》报告。10月16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并作《论军队的管理问题》报告。11月8日，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

1944年 五十八岁

1月1日，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延安干部新年晚会，在会上作关于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讲话。1月中旬，应邀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并讲话。4月8日，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并作《生产运动与财经问题》讲话。4月10日，延安各界一千余人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朱德母亲逝世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致答词。5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由朱德、彭德怀等组成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朱德负责召集。5月19日，出席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朱德为军事报告负责人。6月5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7月初，《解放日报》社印行出版朱德像，这是由新华书店总销售的第二种领导人挂像。7月21日，接受美国记者爱泼斯坦采访。8月7日，与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招待美军观察组。9月10日，致电于9月6日到达重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少将，邀请他访问延安。10月6日，出席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并讲话。11月7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在延安以八路军延安总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名义举行庆祝宴会。

1945年 五十九岁

2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

的追悼彭雪枫大会，任主祭并讲话。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介绍军事报告的起草情况。4月23日，出席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大会开幕式并讲话。4月24日，出席中共七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任执行主席。4月25日，出席中共七大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5月27日，出席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在会上发言。5月30日，出席中共七大第十七次全体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6月10日，在中共七大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以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11日，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在毛泽东致闭幕词后讲话。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10日至11日，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8月15日，针对蒋介石11日的三道命令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电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8月，从王家坪搬到延安城西七公里处的枣园。9月5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上讲话。11月27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塞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惠勒、美联社记者罗约翰和法国通讯社记者柔尔生的采访。

1946年 六十岁

2月3日，出席延安各界两万余人举行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并发表演说。2月24日，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的生产、供给、经济工作干部大会上讲话。3月12日，在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会员大会上讲话。4月2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上讲话。4月15日，参加中共中央举行的干部大会，悼念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四八”遇难烈士，并在大会上讲话。7月23日，出席关向应遗体安葬仪式，并致词。8月27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时事报告。8月下旬，对美国《纽约

先锋论坛报》记者阿蒂·斯蒂尔发表谈话。11月1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动员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干部大会上讲话。11月27日，为祝贺朱德六十寿辰，《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一八八六——一九四六》。

1947年 六十一岁

1月1日，发表元旦广播词。3月12日，与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由延安枣园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附近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撤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3月29日至30日，出席在清涧县枣林子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月31日，与刘少奇率工委东奔黄河。5月3日，与刘少奇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封城村，随后中共中央工委机关设在平山县西柏坡村。7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及罗瑞卿、李涛，介绍和推荐冀热辽和冀中发明使用炸药的两种经验。致电毛泽东，报告晋察冀军区军工生产、人员补充等问题。7月17日，出席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并在会议开幕时讲话。9月4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9月7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9月13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致闭幕词。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0月23日，起草与刘少奇联名致中央军委电，建议批准聂荣臻等关于攻打石家庄的报告。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乘胜夺取石家庄的建议。10月31日，参加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作战部署。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北侯城村听取杨得志和攻打石家庄的部分连、排干部以及战士的汇报，和他们一起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教训。12月20日至翌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交

通会议。12月21日，朱德在会上讲话。

1948年 六十二岁

1月2日，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上讲话。1月27日，在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敌军工作会议上讲话。2月14日，与刘少奇向晋察冀野战军发出关于新的作战方针的指示。4月12日，鉴于临汾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初次进行较大城市的攻坚战，与刘少奇致电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等，建议攻临汾采用攻石家庄的经验，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4月23日，与刘少奇、董必武迎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会合。5月14日，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就部队建设和作战问题作报告。6月3日，致函毛泽东，就东北野战军围攻长春提出建议。7月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共华北中央局扩大会议上讲话。8月23日、10月1日、10月16日，先后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讲话。9月8日至13日，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九月会议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每晚到毛泽东处集体办公，指挥全国解放战争。9月1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主席金真凤、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金日成，祝贺朝鲜政府成立。12月13日，在第二次兵工及军械会议开幕大会上讲话。

1949年 六十三岁

1月7日，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和华东、中原、东北、华北的负责人共同讨论渡江作战和财经等问题。1月28日，在铁道工作会议上讲话。1月31日至2月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同苏共代表米高扬进行三次正式会谈。3月5日至13日，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月中旬，到石家庄面粉厂、玻璃厂、卷烟厂等工厂，向工人宣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3月23日，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离开西柏坡乘汽车前往北平。3月25

日，下午五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仪式，检阅人民解放军部队。当晚，进驻香山来清轩。4月11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致贺词。4月中旬，在华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领导、天津市领导陪同下，到天津部署海防作战。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6月15日至19日，出席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颁布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9月21日至29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4日，在会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发言。9月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式，在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致闭幕词。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三时，出席首都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担任阅兵司令员，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10月19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1月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于12月初访问苏联期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由朱德代理。

1950年 六十四岁

1月9日，致函毛泽东，简要报告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上旬的战况。1月14日，在解放军后勤财务会议上讲话。1月18日，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讲话。1月24日，在铁道部一九五〇

年全国工程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2月8日，在解放军全军机要工作会议上讲话。2月22日，为庆祝苏联武装部队建立三十二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学习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一文。2月，就解放军进兵西藏粮食接济等问题，致函贺龙，提出解决办法。3月9日，致函毛泽东，报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组织状况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情况。3月10日，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3月，对出席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干部讲《目前军事形势和任务》。4月10日，在解放军空军参谋工作会议上讲话。4月12日，在全国石油工业会议上讲话。5月6日，在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讲话。5月16日至31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和同时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实行精简整编的决定。在开幕典礼上讲话。6月6日至9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9日，朱德就土改问题发言。7月1日，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大会上，作题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报告。7月17日，致函毛泽东，概述三个月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情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8月14日，致函毛泽东，就建立和训练坦克部队的问题提出建议。9月5日，致函毛泽东，分析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并提出对策。9月14日，致函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答复新疆工作几个问题。9月25日，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讲话。10月20日，在全国人民武装干部会议上讲话。10月29日，在泰安县曲阜向即将入朝参战的第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抗美援朝形势与任务报告。11月30日，到东北某机场检阅即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空军部队。12月5日，致函周恩来，提出组建工程兵和修建国防工事的意见。12月19日，抵达山东省兖州县，向即将参加抗美援朝的第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动员报告。

1951年 六十五岁

2月7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致电金日成将军，祝贺朝鲜人民军建军节。4月18日，听取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汇报

各军区教育计划审批情况和高级步校、步校开学情况以及通信、防化、炮兵、工兵、坦克、后勤、航空等学校的筹建和开办情况。5月5日，听取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汇报装甲兵部队情况。5月8日，听取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汇报支援朝鲜战争军队后勤工作情况。5月9日，观看防空演习，并听取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装甲部队司令员许光达汇报空军、炮兵、装甲兵部队的组建情况。5月10日，对军工生产作指示，要求订出军工发展五年计划，作到武器装备全部自给。5月15日，听取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汇报部队进藏情况。5月23日，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举行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并讲话。5月25日，为进藏的解放军部队写了八条意见。6月30日，出席全国军工会议，提出要建设坦克、飞机、大炮、枪、光学、化学、子弹工厂以及炼油厂、造船厂等，以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7月4日，听取解放军装甲兵部队组建情况汇报。7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纪检工作情况。9月11日，在海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9月24日，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召开的各兵种司令员、参谋长及各军区参谋长、军训处长集训会议上讲话。

1952年 六十六岁

1月2日，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讲话。1月6日，致函毛泽东，报告自中央1951年12月1日发布进行“三反”以来，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1月23日，与周恩来接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全体代表并讲话。1月26日，致函毛泽东，就如何加强党的纪律检察工作提出建议。3月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特别是种果树。3月8日，出席首都各界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并讲话。到南苑机场出席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三八”起飞典礼并讲话。3月14日，就精简政府机构等问题致函毛泽东，建议简化组织，减少层次，坚决取消不必要的机构，合并重叠的机构。6月22日，将《中共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6月24日，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该会名誉主席。6月，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中央财经委员会，建议把组织群众和部队移民垦荒列入五年计划之内。7月10日，致函毛泽东，对正在拟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意见。10月24日，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发展木材生产问题提出建议。10月30日，致函周恩来，建议扩大军工生产。

1953年 六十七岁

2月25日，在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讲话。3月9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追悼斯大林大会，并致悼词。4月18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农业银行。6月4日，就改进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6月11日，在全国人民武装工作会议上讲话。6月16日，致函毛泽东，就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文件中的条款提出建议。8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各级纪委与地方党委的关系问题和编制问题，以及今后工作。在会上发言指出今后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的总任务。8月17日，致函毛泽东并中央，报告几年来中纪委工作，并将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干部编制、机构和领导设置问题，工作范围问题，处分界限、批准权限和处分手续问题等提请中央审定。11月4日，主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农村乡村政权及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在讲话时强调反对无组织、无纪律。11月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汇报会上讲话。11月11日，主持第二次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作《过渡时期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11月17日，和军队系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谈话。11月20日，主持第二次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讨论工矿企业纪律检查工作和基层纪检机构设置问题。11月23日，在全国军工会议上讲话。11月24日、25日，出席第二次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听取各大行政区纪律检查部门负责人发言。11月28日，在第二次全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12月4日，在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作《把

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

1954年 六十八岁

1月13日，致函刘少奇转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去年九月上旬去大连时，对大连市一些工厂情况的调查。1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列宁主义是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旗帜——纪念列宁逝世三十周年（为苏联〈真理报〉而作）》一文。1月26日，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2月6日至10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2月20日，出席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举行的慰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会，并代表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致答词。2月25日，离京去湖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视察。3月4日，就发展养猪及解决猪饲料问题，致函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3月24日，就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致函刘少奇转毛泽东并中共中央。4月25日，在解放军军事学院监督进行国家考试。4月26日，离开南京回北京。5月3日，在首都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大会上讲话。5月28日，致函刘少奇转毛泽东并中央，将年三月到广州进行调查研究的有关出工、农和外贸材料三件送上以供参考。6月26日，会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金应基、副团长李永镐。6月，就目前小学教育问题的意见，致函刘少奇转毛泽东、周恩来等。8月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9月15日至28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9月29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31日，在全国工矿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1955年 六十九岁

1月4日，离京去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地视察。2月28日回到北京。3月9日，会见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3月18日，在听取中共中央召开的农村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上讲话。3月21日至3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3月28日，接见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全体代表。4月12日，致函刘少奇并转陈云、李富春，将在武汉、广州、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与各地负责人谈话了解的情况整理成材料后，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5月6日，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6月5日，离京去河北、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视察。6月22日，回到北京。7月13日，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7月25日，致函中共中央，汇报视察内蒙古等地的情况。8月12日至23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八·一五”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9月23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决定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9月27日，出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0月4日至11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并在会上发言。10月15日，出席解放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开幕式。10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建议号召财经干部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七章至三十九章，并联系实际加以对照，以解决我国过渡时期的某些经济政策问题。11月8日，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等谈一五计划发展速度问题、工业产品价格问题。12月10日，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团长朱德，团员聂荣臻、刘澜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朱德，团员聂荣臻、刘澜涛、曾涌泉），应邀前往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和蒙古等国进行友好访问。

1956年 七十岁

2月4日，上午，率代表团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2月10日，中共中央宣布：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

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为首的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即将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月14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2月15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继续出席苏共二十大，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和宣读贺词。与聂荣臻、刘澜涛向中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详细报告对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五国和苏联的访问情况。2月20日，与邓小平等三次联名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苏共二十大情况，并请示有关问题。2月21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继续出席苏共二十大。与邓小平等联名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赫鲁晓夫同朱德谈话情况。3月31日，晚十一点，中国代表团结束了对蒙古的友好访问，离乌兰巴托回国。4月25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关于访问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蒙古七国的报告。4月27日，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在提倡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字。5月16日至23日，离京乘飞机到山西省视察。5月29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到山西省视察的情况，并提出建议。6月6日至13日，离京乘飞机前往辽宁省视察工作。6月19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到辽宁省视察的情况，并提出建议。9月15日至2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9月28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1月10日至15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11月11日，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一文。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率中央谒陵代表团乘火车离北京赴南京。11月12日，率领中央谒陵代表团参加在中山陵举行的隆重的谒陵仪式。

1957年 七十一岁

1月7日，上午，乘飞机离京赴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和陕西等省、自治区视察。1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视

察广西省的情况。1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视察海南的情况。在报告中建议应积极组织力量在海南岛从速进行开发工作。2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在海南岛的视察情况。2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云南省的农业、财贸和矿藏等情况。3月24日，乘飞机离西安市回到北京。4月18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省、自治区视察的情况。4月19日，离京前往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视察。4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在黑龙江省的视察情况。4月28日，乘飞机离沈阳市回到北京。5月9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到东北三省视察的情况。5月13日，给周恩来和陈云写信，对东北林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5月24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对制订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建议。6月11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工作和整风两不误。7月31日，出席首都军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光荣伟大的三十年》的讲话。9月9日，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和全国妇女致祝词。9月15日，会见以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并进行友好的谈话。9月20日至10月9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大会上作书面发言。9月24日，到首都机场为印度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送行，并致欢送词。11月15日，致信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指出要重视发展山区经济。11月18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作《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讲话。11月19日，致信中共中央，对建立大、中、小型玻璃纤维厂问题提出建议。12月3日，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召集的各省市区计委负责人讨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会议上讲话。12月6日，在全国对外贸易局长会议上讲话。12月7日，在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讲话。12月10日，在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及国家经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现在战争打不起来，因此，要把军工生产转向和平生产。12月16日，出席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发展手工业

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

1958年 七十二岁

1月4日，上午，主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的报告会，并致词。1月6日，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建筑工业改革的意见。1月上旬，毛泽东在起草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时，在写了应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名单后，对留守北京的领导人分工写道：“谭震林管中共中央，总司令（朱德）挂帅。陈毅管国务院。”1月12日，就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致信周恩来。2月4日，上午，在农业水利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2月12日，在对外贸易部召开的全国桑蚕、榨蚕生产会议上讲话。2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分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2月21日，就如何处理农村集资中发生的问题致函毛泽东。2月24日，在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关于如何处理该处已存三年之久的史沫特莱遗留稿费九万五千零八马克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2月26日，就发展蚕丝、茶叶生产问题致函毛泽东。3月5日，上午，在食品工业和轻工业规划会议上讲话。下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冶金工业部的工作问题。3月1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王震汇报访问日本的情况。3月25日、2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汇报。4月4日，离京去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视察。飞抵浙江省杭州市。4月10日，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反映浙江省工业生产情况。4月16日，致电刘少奇转中共中央，对推广上海斯美玻璃纤维厂和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的生产经验提出意见。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视察上海的情况。4月23日，致信刘少奇转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视察江苏省的情况。5月1日，上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揭幕仪式。5月2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视察时了解的安徽省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情况，提议把改革农具作为农业生产的中心工作抓起来。5月5日至23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

大二次会议，在大会上发言中指出：当前农村中和工矿企业中最大的需要就是技术革新。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检查和总结建国八年来军队的建设工作，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朱德多次参加会议，6月28日，在会上讲话。6月20日，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视察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四省市的情况。6月30日至7月21日，离京前往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视察。7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在西安视察的情况。7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在甘肃省的视察情况。晚，就甘肃、青海平息叛乱问题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7月23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玉门油矿的情况并就发展石油工业问题提出建议。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内蒙古自治区及包头市的情况。8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一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一文。9月3日，离京前往新疆、甘肃、山西视察。9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视察乌鲁木齐市和新疆北部工农业生产等情况。9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视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情况。9月22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视察南疆地区的情况。10月6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甘肃省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应视察山西省太原市的情况。11月21日，与周恩来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四级干部会议、炮兵党委扩大会议、北京空军部队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同一部分代表谈话。11月22日，会见金日成和由他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11月28日至12月10日，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2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转中央书记处，提议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

1959年 七十三岁

1月18日至3月2日，离京去湖南、广东等省视察工作。1月21日，致函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湖南、广东两省的情况。3月6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团员王稼祥、伍修权、王

炳南)离京前往波兰,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11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3月20日,率代表团出席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典,在会上讲话,并宣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和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的贺电。3月25日,与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联名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与习仲勋离开布达佩斯回国。4月2日至5日,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4月4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赴波兰、匈牙利以及途经苏联的情况。4月7日至8日,出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4月10日至14日,离杭州市飞抵山东省济南市视察。4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4月18日至28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3日,朱德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提名方案。27日,朱德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5月3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的全权代表。5月12日,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4月10日至14日视察山东省的情况。5月22日,致函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反映石景山钢铁厂扩建问题。5月27日,上午,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派两个代表团分别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等一起,离京去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视察。6月6日,致函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反映在本溪的视察情况。6月16日,致信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视察吉

林省的情况。6月20日，与董必武、林枫联名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省的情况。6月24日，离哈尔滨回到北京。6月25日，与董必武、林枫联名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长春市场供应情况和吉林省的生产情况。6月29日，与董必武、林枫联名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情况。7月2日至8月1日，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出席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3日，致信周恩来，建议抓紧原材料的生产，活跃商品市场，以促进工农业以及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9月1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

8月26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调整问题。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10月24日，出席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又称全国群英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11月2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林伯渠关于访问蒙古的汇报，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事条约以及我国的八个民族自治条例。12月23日，复信给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表示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提出的要求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建议。

1960年 七十四岁

1月7日至17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2日，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应注意发展养蜂事业。1月20日，离上海市前往广东、湖北视察。2月11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十四次会议，听取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葆华作关于一九五九年水利电力建设成就和一九六〇年工作任务的报告。2月1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

轻工业部副部长邓洁作关于一九五九年轻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2月1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会议还听取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关于一九六〇年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问题的报告。2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听取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人俊作关于石油工业的成就和今后任务的报告。2月2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商业部副部长王磊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商业工作情况和一九六〇年工作任务的报告。2月2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听取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作关于一九五九年教育建设成就和一九六〇年教育工作任务的报告。2月23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冶金工业工作情况和一九六〇年工作任务的报告。2月28日,离京前往陕西、贵州、四川、河南视察。3月21日,下午,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的说明,并决定派周恩来为签订这一协定的全权代表。下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会议,讨论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事宜。3月2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等事项。3月30日至4月10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并先后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4月2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贵州、四川、河南三省的情况。4月12日,主持全国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5月1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会议,听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报告南朝鲜问题。5月26日,上午,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和平友好条约》,并决定追认周恩来为签订这一条约的全权代

表，决定派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的全权代表。6月11日，致信刘少奇，对解决当前全国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8月15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派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全权代表；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领事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8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八次会议，讨论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9月13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9月27日，接见并宴请到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庆祝活动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宴会上致词。9月3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友好条约》；决定派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的全权代表。10月2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申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11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通过《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决定》。12月1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决定派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全权代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关于一年来西藏工作的报告。12月2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作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工作情况的报告。

1961年 七十五岁

1月14日至18日,出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月20日,离京赴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河南、陕西、四川、河北等地视察。5月5日,回到北京。5月9日,致函毛泽东,汇报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的情况与建议。6月1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听取轻工业部有关负责人汇报工艺美术品生产情况。6月2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同日共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会谈并签订联合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举行联席会议,座谈农村人民公社条例问题。6月23日,致函周恩来、陈云并转有关部门,反映视察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保定化学纤维厂情况和建议。7月5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朱德同志对青年谈学习》一文。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8月1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派遣周恩来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8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致函周恩来,通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8月26日,致函邓小平转中央有关部门,建议把秦皇岛耀华玻璃厂作为重点生产单位予以扶持。9月25日,迎接并宴请来京参加国庆十二周年活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等。10月5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决定派刘少奇签订这一条约;批准设立中央手工业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0月1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作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报告。10月1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关于西藏自治区工作情况的报告。11月21日，致函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并毛泽东，报送《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和建议。12月16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12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12月25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全国人大代表下乡或在城市进行参观访问的问题，并决定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北京召开。

1962年 七十六岁

1月11日至2月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2月9日，离京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省、市视察。3月3日，致函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反映到浙江、江西两省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当前农村中存在的重要问题。3月20日、2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五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议程，主席团、秘书长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人选；通过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3月2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会议选举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通过会议议程；通过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名单。3月26日，致函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反映视察江西的情况和意见。3月27日至4月16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并先后主持开幕式、闭幕式。大会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工作报告的决议》等。4月4日，审阅《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4月13日，主持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会议批准将原隶属国家交通部的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并改名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5月1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真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告和决定人事任免事项。5月15日,乘飞机离京赴陕西、四川、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视察。5月20日,致函邓小平转中共中央,报告视察陕西、四川两省情况;致函邓小平转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四川省手工业部门以部分产品换购原料的情况。5月26日,致函邓小平转中共中央,汇报视察四川西昌地区时发现的问题。6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哲及其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6月2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四川、云南的情况和建议。7月6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为迫使美军撤出南朝鲜、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给世界各国议会的信的决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北戴河会议”),在会上发言,说: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尤其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

8月28日,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作国际情况报告和通过人事任免事项。9月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张致祥作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情况的报告。9月6日,致函李先念、陈伯达:基本同意《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谈四点具体意见。9月1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名单和听取中央气象局关于气象工作情况的汇报等。9月24日至27日,出席在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提出要使生产队增加收入,使生产队致富,使农民致富。10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化学工业部的工作汇报。11月2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会议批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1月24

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并批准周恩来所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商航海条约》的全权代表。11月3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副主任邓洁作《关于手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2月3日，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及夫人和移民、合作部部长阿赫马迪及秘书。12月4日、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二次、第七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苏作关于化学工业工作情况的报告。12月11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林海云作《关于三年来的对外贸易工作》的报告。12月1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五次会议。会议继续听取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李苏作关于化学工业工作情况的报告。12月1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决定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一九六三年第二季度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延期至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进行；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商航海条约》。12月19日，离京去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市、自治区视察。

1963年 七十七岁

2月10日，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汇报视察南方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并提出建议。2月19日，致函邓小平，反映视察广东、广西的有关情况。2月25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噶尼喀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3月2日，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反映视察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省了解到的情况和建
议。3月16日，离京去陕西、四川等省视察。5月1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五次会议，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关于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5月13日，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报告视察四川、陕西、河南等省的情况。5月1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继续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的报告。5月1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23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七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批准国务院设立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国家编制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6月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改于一九六三年第四季度召开。7月3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7月4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的报告》。7月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内外形势问题的报告；批准国务院《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的决议的报告》。9月2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二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第五机械工业部和第六机械工业部；修正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10月10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四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10月15日，为转送北京市对外贸易局的调查材料《北京市工艺品历年出口完成情况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致函周恩来，建议将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利用传统的技术，为外贸部门生产有价值的东西出口。致函周恩来、邓小平，对目前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问题提出建议。10月16日，离京乘汽车去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灾区视察。10月23日，到首都机场欢迎尼泊尔全国评议会议长比什瓦·班杜·塔帕和由他率领的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并致词。10月29日，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反映视察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并对今后水利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提出几点意见。11月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

零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关于刘少奇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告。11月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六次会议。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并决定派陈毅为签订条约的全权代表；批准设立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1月12日，致函周恩来，转达视察北京焦化厂、石景山钢铁厂后整理的有关建议。11月13日、14日、15日，先后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七次、第一百零八次和第一百零九次会议。会议讨论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议程，主席团、秘书长人选，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人选；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时间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通过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议程，主席团、秘书长名单，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11月17日至12月3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先后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大会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and 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预算委员会的预算审查报告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12月1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关于第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

1964年 七十八岁

1月4日，离京去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市、自治区视察。2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当前浙江和福建两省在对侨属的物资供应方面还有些不足，主要是高档用品和食品不足，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帮助解决。3月1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建议在江南各省凡可以种木薯的地方，推广广东省的经验，饲养木薯蚕，这不仅可

以作为集体副业,而且还可以作为社员的家庭副业来发展。3月22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去年广西旱灾严重,粮食减产,从长远来看,对这些地区少调粮食,多调经济作物出来是最合算的。4月14日,接见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成员。4月23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外出视察的情况。4月25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百四十四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十四国的报告。5月11日,到机场迎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元泽、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副委员长康良煜和由他们率领的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6月6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八次会议,听取中国驻老挝大使刘春报告老挝问题。6月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友好条约》,并决定由刘少奇签订这一条约;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批准国务院撤销对外经济联络总局。6月12日,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次会议,听取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报告马里情况。6月18日,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一次会议,听取离任回国的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报告波兰形势。6月25日,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二次会议,听取离任回国的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王国权报告东西柏林形势和东德情况。6月28日,与董必武等离京去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视察。7月2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一九六三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说明,审查国务院提出的一九六三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草案,并通过相应的决议;批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百多名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设立国家海洋局、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9月19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

五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介绍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情况。10月15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关于访问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达荷美、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以及参加刚果(布)八月革命节庆祝活动情况的报告。10月1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11月3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为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11月1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三十二次会议,听取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报告日本情况。11月1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一百三十三次会议,听取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孟用潜关于美国情况的报告。11月28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四次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的联席会议,决定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12月12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的公告;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友好条约》;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行实行特赦。12月17日,主持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讨论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议程等事项。12月21日至翌年1月4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在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65年 七十九岁

1月19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军士和兵的现役期限的决定》。1月21日,与董必武等离京去广东、四川、陕西等省视察。4月19日,离京飞抵云南省昆明市。4月

21日,到昆明机场迎、送和宴请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4月22日,到昆明机场迎接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苏发努冯是在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途经昆明的。4月23日,到昆明机场迎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出席云南省负责人为欢迎范文同总理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讲话。4月25日到昆明机场为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回国送行,同时为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赴河内访问送行。4月27日,飞回北京。5月5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几内亚、马里、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加纳等五国的报告。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视察广东、四川、云南三省的情况。5月15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会议听取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关于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情况的报告。5月17日,到机场迎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5月18日,陪同胡志明主席参观新式武器展览馆。5月22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5月30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百五十六次会议扩大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6月1日,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一起出席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庆祝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的集会。6月18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刘宁一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7月1日,出席北京市地下铁道开工典礼,并为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工程动工破土。10月4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并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联合声明上签字。10月28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前往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张经武关于西藏自治区情况的报告。10月30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会议听取前往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刘春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情况的报告。11月4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情况的两个报告。11月20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农业部副部长吴振关于今年全国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会议还通过决议,批准撤销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11月27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梁膺庸关于化学工业情况的报告。12月4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教育部部长何伟关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情况的报告。12月8日至15日,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2月28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梁耀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报告。12月30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第一工业部副部长曹鲁关于轻工业产品面向农村情况的报告。在讲话中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1966年 八十岁

1月10日,离京去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1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周恩来,反映山东、江苏两省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和两省农村社教情况。2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反映浙江、江西两省的情况。3月18日至20日,出席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3月29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4月14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三十次会议。会议听取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朱德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三十二本书。4月21日,主持第三届全

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林业部副部长荀昌五关于林业工作情况的报告。4月26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对外贸易部代部长林海云关于对外贸易工作情况的报告。7月7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改期召开。8月1日至12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比原来七名常委增加了四人，林彪名列第二位，朱德降到第九位。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此后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9月8日，会见和宴请索马里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和由他率领的国民议会友好代表团。

1968年 八十二岁

12月10日、11日，在谢富治把持下的公安部，通过诱逼“五一六”专案审查对象，诬陷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和地方负责干部，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苏修”，“要搞政变”。诬陷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

1969年 八十三岁

4月1日至24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4月28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1日，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联欢。10月20日，被下放到广东从化。从此时起，直到1970年7月，行动上受到限制，不能离开住地，不能到工厂、农村视察。

1970年 八十四岁

7月，接中央通知，离广东从化回到北京。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等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要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

1971年 八十五岁

10月22日，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

1972年 八十六岁

9月12日，与董必武、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德生、张才千等到第七机械工业部的科研部门视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装配，并勉励七机部负责人要早点把尖端武器搞出来。

1973年 八十七岁

6月4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党政代表团。8月24日至28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8月30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4年 八十八岁

3月10日，会见科威特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萨利赫·吉奈姆和夫人。4月29日，与徐向前等会见也门协商会议议长阿卜杜拉·本·侯赛因·阿赫马尔和由他率领的协商会议代表团。8月19日，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副司令员刘导生陪同下，视察驻秦皇岛海军舰艇部队。10月14日，会见德意志联邦议院副议长里夏德·耶格尔和由他率领的议会代表团。

1975年 八十九岁

1月13日至1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主持开幕式。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月20日，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3月6日，奋笔书写“革命到底”四个大字。3月17日、18日，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18日，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4月1日，会见突尼斯总理赫迪·努伊拉和夫人以及随同来访的全体人员。4月2日，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夫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和夫人。4月20日，会见比利时政府首脑莱奥·廷德曼斯和夫人。6月11日，会见冈比亚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和夫人。6月16日，会见泰国众议院议长巴实·干乍那越和由他率领的国会议院访华团。6月27日，会见加蓬总统、政府首脑哈吉·奥马尔·邦戈和夫人。6月30日，会见泰国王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莫。9月6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和副首相、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9月21日，会见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副议长奥斯瓦尔多·阿尔瓦雷斯·帕斯和夫人。9月22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政府副总理黎清毅和由他们率领的党政代表团。10月6日，会见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和夫人。10月23日，会见尼泊尔王国贾伦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迪伦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亲王和夫人。11月11日，会见缅甸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奈温。12月1日，会见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12月，当“四人帮”通过报纸、广播不点名地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时，朱德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

1976年 九十岁

1月8日，周恩来因病在北京逝世。朱德知道后异常悲痛，眼泪夺眶而出。在周恩来患病期间，曾到医院看望，并经常询问他的病情。1月11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举手行军礼致敬。1月15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朱德因身体原因，未参加追悼会，送了花圈。3月15日，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奔·西巴色和由他们率领的党政代表团。6月12日，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6月21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朱德最后一次出席外事活动。6月25日，因病入北京医院治疗。7月初，对到医院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7月6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医院逝世。

编后记

朱德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英勇奋斗并建树了丰功伟绩的人民领袖之一。他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的云南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出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对开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大业的时期。他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周恩来语）。

这本自述，集纳了朱德一九三七年春在延安先后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时关于他个人生平的口述记录，以及他所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生平经历或心境的文章、通信，也附录了几篇能够帮助读者加深了解或理解的文章，除“开篇自述”外，大体是按作者生平经历的历史顺序编就的。

从这本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路历程，他的人生轨迹，他的充满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暴风骤雨的斗争道路，和在火与血洗礼中铸就的伟大人格。朱德诞生在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的年代，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度过的，而同时他也和整个民族一起在危机中开始觉醒，在黑暗中开始探索。他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找到中国共产党后，更不屈不挠地投身到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朱德关于早年经历直到长征胜利到陕北这段自述，语言淳朴，细节真实而生动，是了解朱德前半生经历、研究辛亥革命前后情况、土地革命和红军战史的宝贵资料。朱德后半生没有专篇的关于生平的自述，但我们仍可以从他的一些回忆性文章中、通信中，连缀起对他生平和部分思想的了解。

有时，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从朱德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已经走过的脚步，看到祖国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悟到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熔铸在一起所焕发出的生命之光是多么绚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自述的目的。

编 者

二〇〇二年六月